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03-14

# 精神追求——人的幸福之路的正确出口

刘西琳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人类是在进入理性文明期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幸福与不幸这类问题的,并逐步认识到,幸福的追求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由于现实中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同时也由于人的趋利之本性,人生的幸福之路扑朔迷离、歧路横生、误区重重,唯欲望、唯目的、唯物质、唯享乐以及机会主义的幸福观数千年来导出了一幕幕悲剧。与动物不同,人是有心理、有意识、有精神的“万物之灵长”,是地球上唯一既拥有自然世界又拥有精神世界、既生活在物理空间又生活在思想空间、既需要物质享受又需要精神享受的生物。食物等物质的东西是动物需要的全部,但它只是人的需求的基本,人与动物之区别不在于维持其生命的物质,而在于决定其本质的精神。精神的有无拉开了人与动物的距离,精神的富有或贫困又进一步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人的情趣之高雅、品德之高尚和人格之高贵与否,不是由其出身、地位、权力、财富决定的,而是由其精神品位决定的。所以,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正确出口。追求幸福无捷径可走,要奔正道。正确的幸福之路是一条以意义为指向、讲贡献的通衢大道,是一条以知识为力量、讲理性的康庄大道,是一条以智情德为追求、讲品位的金光大道,是一条以德性为操守、讲节制的绿色通道。幸福无法继承、无法给予,更不能用非理性的手段去攫取,只能靠自己创造。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建党100周年前夕的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设想,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关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幸福工程”。在这一工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它的受益者,这是我们的权利;又是它的建设者,这是我们的责任。将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才能在实现全面小康、全社会幸福的前提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幸福。

**[关键词]**幸福之路;精神追求;全面小康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1

公元2012年,“幸福”作为一个强烈的信号,受到世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关注,这一年注定将作为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头被世人记住并载入史册:先是6月28日,在上半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快乐日”,敦促世界各国关注其国民的幸福问题;后是11月18日,在本年度即将结束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前夕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段——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有

着同一个背景——世界深陷经济危机且短期内复苏无望,关心的是同一个问题——人的快乐和幸福。然而,它们传达出来的信息却不一样:联合国试图通过“国际快乐日”,使深陷危机、眉头紧锁的各国人民勿忘快乐,从而提振信心、度过危机;中共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为了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对母亲曾经作出的承诺。一边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边是,“不尽长江滚滚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唐人刘禹锡的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收稿日期] 2012-11-16

[作者简介] 刘西琳(1942—),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哲学。

联合国在其决议中阐释了设立“国际快乐日”的动因——这是考虑到“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基本的人类目标”。由此可见,快乐是幸福的表现,惟其幸福,所以快乐。而国人心仪的“小康”,则素来是殷实、太平、安康、和谐的代名词,它表达的是生活的一种境界、一种水准,是一定程度上的幸福与快乐。

人类关注幸福问题不自今日始,差不多已有3 000的历史了——是人类进入文明期以后,由私有制导致的阶级对立、贫富分化,使人们开始思考幸福问题。然而,在长达3 000年的阶级社会中,由于受到幸福的既得利益集团——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影响,幸福概念曾长期被误读、被曲解,乃至被玷污,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幸福观,其中不少幸福观只会将人导入误区、导入歧途,甚至导入不归之路,这已为历史和现实中已经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悲剧所证明。所幸3 000年来人类的许多进步思想家一直将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其认识成果的积累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主流幸福观,这种主流幸福观不谋一己之私利,也不为阶级偏见所左右,因而具有真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属性。本文拟在简述先哲幸福学说的基础上,分析幸福追求中的种种误区,探讨幸福的真谛及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以期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国际快乐日”、科学认识“小康社会”有所助益。

## 一、幸福的追求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这是毛泽东词《贺新郎·读史》的上阕,用寥寥56字概括了人类的历史:先是人猿分家、作揖而别,这距今至少已有10万年;接着又经过了数万年的“磨石头”时期,从旧石器磨到新石器,终于磨进了青铜时代;等到人类掌握了炼铁技术、建立了氏族公社,它所带来的竟是甘苦参半的两个后果:一方面,铁器的广泛应用和有分工的组织管理,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林牧渔业相继出现,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财富逐渐丰富,人类结束了与猿“揖别”后长达数万年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有了剩余,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形成了,少数人开始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果实,劳而无获者与不劳而获者尖锐对立、激烈斗争,

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由此开始,而“流遍了,郊原血”则是阶级斗争惨烈状况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在其词中概括的人类历史,与19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勾画的人类历史完全一致。由此看来,幸福问题在人类“磨石头”那几万年并不存在,而且最初并不是由享有幸福的人提出来的,而是由不幸的人首先察觉到的——它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阶级觉悟了。这一过程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其间虽然社会形态有变,但私有制度未变,而正是私有制度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使少数人得以享受幸福,使多数人陷于不幸。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一切不幸并非由于贫乏,而是由于过剩。”此乃一位思想家对私有制的本质一针见血的论断。

由私有制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无疑是造成少数人幸福、多数人不幸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许多人的不幸是由非理性、非德行的原因造成的,其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性本能。众所周知,人与人发生关系,遵守的是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彼此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而动物与动物发生关系,遵守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彼此之间是一种食物链关系。人脱胎于动物,身上本来就残存着动物性,而私有制的本质又强化了一些人身上的动物性特征,使其自私自利、见利忘义、恶欲膨胀、欲壑难填,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干得出来,加之他们又长着人的大脑,故其恶行比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摩尔根的观点,人类是经由蒙昧期、野蛮期进入文明期的,其文明史距今约有5 000年时间,但由于“严格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而文字的发明及其普遍使用尤其是被用于记载历史,距今只不过3 000年的时间,所以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理性文明的历史是3 000年。现有文献表明,3 000年来人类思想家思考最早、最多的问题,一是世界的本源问题,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三是人本身、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的幸福问题。

3 000年前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得普·李·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认为,彼时世界上已形成了四大文明区和若干亚文明区。这种文明区的认定有着严格的标准:其一,文化较为发达——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遍使用;其二,人文、社会、自然等领域

的知识居于其他民族之前;其三,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已发展到可用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问题。根据这套标准,当时世界上已形成的四大文明区依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由埃及代表的尼罗河流域文明、由巴比伦代表的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文明、由印度代表的恒河—印度河流域文明、由中国代表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在时间上稍晚于这四大文明区的其他较发达的文明区被称为亚文明区,其中首推希腊文明。后者虽然在进入文明期的时间上晚于四大文明区,但就文明的发展程度、特别是理性文明的发展高度而言,却是其前的四大文明区所不及的。这一点,始终是世界史的一个谜团。对此,伯恩和拉尔夫是这样解释的:鉴于“迄今为止人类的进步是理智的发展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结果”,而多神的希腊民族并不迷信于神,在他们看来,“神不过是大写的人而已”,他们实行的城邦式的奴隶制民主,“赞扬自由探索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发展到了古代文化的最高阶段”。希腊民族如此重视人的权利、重视人的智慧,其原因,曾由该民族的“圣人”亚里士多德一语道破:“正是理智使人成其为人。”惟其如此,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希腊哲学将作为人类理智之学的哲学定义为“爱智学”,从而使哲学自此成为“智慧”的同义语、进而成为“思想”的象征。“思想家未必都是哲学家,而哲学家肯定是思想家”,其道理正在于此。伯恩和拉尔夫对希腊民族性和希腊文化之特殊性的解读,主要是为了回答许多人提出的希腊文明为什么后来居上的问题,但也间接地说明了为什么是希腊人而不是其他民族在西方文明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幸福问题并将其置于人生的终极诉求之地位。

在目前能检索到的古文献中,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记载下来的古希腊思想家梭伦同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谈话,最早谈到人的幸福问题。梭伦明确地告诉国王:仅仅富有、即使富甲天下,仅仅有权、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不一定就幸福;就国王而言,行善政并能善始善终,才算得上幸福。这种关于幸福的谈话,曾进行过多次,中心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这些谈话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它早于历史学家所谓的“古典时期”的起始阶段(公元前5世纪)2个世纪,所提所答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幼稚,但其意义在于:幸福问题在3000年前已成为人类理性活动的内容,开始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追求。

幸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希腊社会热烈讨论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鼎盛时期。此前的希腊哲学,其旨趣在于探讨世界的本源、物质的基本构成等,经苏格拉底扳了“道岔”,开始由自然哲学向社会哲学、生活哲学、政治哲学转变。幸福问题作为一个与生活、与社会、与政治均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自然受到三位大师的青睐。亚里士多德作为三位大师的哲学之集大成者,对古希腊幸福哲学更是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确立了幸福在人生目的中的终极地位。他认为:“人生之目的不只一样,但许多目的都是我们想借以达到别的目的,因此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有至善明显是最后的目的。凡居于事物之最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如果最后的事情很多,必有一事物是最后之中的最后……幸福这件事就是这种事物,因为我们求幸福就是为了其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事物。名望、快乐、理智及其他种种德行,我们选择它们是为了寻求幸福,借助于它们我们就有幸福。”这一认识清晰地阐明了幸福在人生中的意义,赋予了幸福以人生终极目的的崇高地位,为“幸福”定了调。亚里士多德之后2500年,人类的幸福论坛就是跟着“幸福是人生终极目的”这个调子唱下来的,而且一直唱到今天。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研究幸福问题几乎成了思想家们的共同旨趣、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如同今天的学者“言必称希腊”,当时的希腊学者以及受其影响的罗马学者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却是“言必谈幸福”,甚至以其幸福观的不同而形成多种学派,其中最著名的幸福学派有两个,即伊壁鸠鲁学派和芝诺的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奉行的是“快乐哲学”,将“道德即快乐”作为主要信念,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充满快乐的幸福生活”,“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芝诺的斯多葛学派强调理性、审慎和节制,要人服从自然、不要与命运抗争,认为真正幸福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通过认定他的理性,完成了把他的生命同宇宙目的完全相应的调整,并且使他的灵魂洗涤去一切痛苦和发出对转入厄运的抗议。与高深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圣殿哲学和幸福宏论相比,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幸福观更为通俗、实际,所以分别都拥有众多信徒。

希腊的幸福哲学将幸福作为人生终极追求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同处地中海沿岸且距离最近的罗马人。古罗马著名诗人、思想家贺拉斯认为,伊壁鸠鲁派的“快乐论”和斯多葛派的“节制论”都没有全面、

深刻地理解幸福的本质,他认为:“仅仅没有痛苦并不就是幸福,只有正当的、合理的愿望得以实现、获得满足才是幸福。”显然,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激进的伊壁鸠鲁派的“快乐论”和消极的斯多葛派的“节制论”的偏颇,都是一种矫正。同样将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终极目标的还有曾于公元161—181年任罗马皇帝的马可·奥勒留。他的一句名言是:“在无理性的事物中低等事物是为了高等事物而存在的,但理性的动物(人)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强调人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是很了不起的思想,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其本质就是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无私哲学,这对于一位罗马皇帝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曾经热议的人生幸福之类的话题至此中止——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要人们到上帝那里去找幸福。于是,人类真实的幸福追求被基督教虚幻的幸福许诺替换掉了,等到人们重拾幸福话题的时候,已是“千年昏睡”中醒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了。

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的一大特点就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人性、德性来否定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揭露教会许诺的“来世幸福”的虚伪,肯定人追求“现世幸福”的权利。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在谈到人的幸福问题时,进一步深化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是人生终极目的”的论断。意大利诗人阿利盖利·但丁是吹响文艺复兴第一声号角的人,他用《神曲》——“地狱”、“炼狱”、“天堂”——完整地诠释了人生的悲惨与幸福、人世间的假恶丑与真善美,给人们指示了一条从地狱走向天堂之路。但丁之后,另一位讨伐中世纪教会统治的人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他创立了“人学”以对抗“神学”,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居住在永恒中……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席卷欧洲大陆时,德国的伊拉斯谟、罗伊希林,法国的拉伯雷、蒙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均对如何争取人生幸福发表了自己的著述,他们也因此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代表。英国与欧洲大陆隔峡相望,交通不便,却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效仿最成功、取得成就最大的国家。被史学家称为“英国人杰”的托马斯·莫尔,在人类历史上最先认识到私有制是人类不幸的根源,为展示消除私有制后人类的美好生活,他通过其著作《乌托邦》构建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平等互助、按劳取

酬的理想国家,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莫尔之后约20年,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创建了“知识幸福论”,将幸福的实现从神的恩赐移到自己的求知、奋斗和创造上来,从而变成一种可以兑现的现实。晚培根3年出生的威廉·莎士比亚则用其37部戏剧、数百个人物演绎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反映了人类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其代表作《哈姆雷特》更是为新时期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人”的模版:感情丰富,头脑清醒,目光远大,胸襟磊落,善良、和蔼、正直、刚强,有风趣、有胆量、有能力……总之,具备了新时期人文主义者心中一个真正的“人”的一切理想品质;这个“人”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欣赏、所赞美的“内在的丰富与外在的活力完整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那样的。文艺复兴始于但丁,终于莎士比亚,可谓善始善终。如果说中世纪的一切都在围着“上帝”转,向着来世的终极目标“天堂”走;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都在围着“人”转,向着现世的终极目标“幸福”走。神最害怕什么?睡醒了的人!在中世纪昏睡千年的人类,经过文艺复兴,渐渐醒过来了。

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孕育了欧洲资本主义,接下来发生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则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助产婆,它巩固和发展了文艺复兴的成果,为正在酝酿中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辟了道路。什么是启蒙?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曼努尔·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回答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这期间,欧洲诸多思想家都对人的幸福追求的天然正当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说,“人人都寻求幸福,这一点是没有例外的;无论他们所采用的手段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全都趋向这个目标”。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指出:“保存自己的生命、追求个人幸福这种趋乐避苦的自爱感情,是人所共有的,它推动着社会生活前进。”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追求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必然性……亦就是我们的一切欲望所永远追求的。”并说:“一切含灵之物,本性都有追求幸福的趋向,而且这种倾向形成了他们的强烈动机”。在关于追求幸福的问题上,康德特别强调:幸福的追求贯穿人的一生,也就意味着“责任贯穿人的一生”。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认为:“幸福是一种利益,各人的幸福是他自己的利益,因而公共幸福是一切人的集团的利益……幸福已经取得它是行为目的之一的资格,因而它也取得

它为道德标准之一的资格。”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英国哲学家、法学家杰里米·边沁在他于1788年出版的法哲学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首次提出“最大幸福原则”：“最高的道德就是追求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该原则是对亚里士多德“幸福是人生终极目标”的最好诠释。

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幸福追求,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其最高纲领就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即最大幸福,用“物质财富的极大幸福”和“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来满足人类实现幸福——人生终极目标——的愿望。

认识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是并非人人都能理解。这是因为,对于生之目的,人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其观摩学习的对象和内容,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媒体、亲戚、朋友等渠道的人生观和幸福观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汇集到一起,通过每个人的自主选择,便形成了各自的人生观和幸福观。这些外来信息并非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且信息选择又是有倾向性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的“偶像”是不一样的。美国哲学家A. J. 赫舍尔在《人是谁?》一书中的多处用不同的方式强调同一个真理:“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我是谁——的决定性因素是他所选择的供自己学习和模仿的形象。”这句话入木三分、深刻至极!一个人欣赏什么,他便学什么;一个人欣赏谁,他便跟谁学。文天祥崇拜岳飞,他便成了民族英雄;汪精卫欣赏秦桧,他便成了汉奸。《爱因斯坦传》记载:有青年请教爱因斯坦,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学者?爱因斯坦回答:“成为学者的最佳途径是生活在学者们中间。”为什么?因为处在学者们中间,则四周全是学者,“形象”的力量会作为一种“场”引导你成为学者。

以上对人类幸福学说史的追述,其目的是想通过简述先哲们的幸福学说,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一个将创造幸福作为人生终极目的的坚定信念,从而同那些混迹人世的消极幸福观彻底决裂。

## 二、幸福的误区扑朔迷离

忧愁常常挥之不去,  
快乐往往转瞬即逝;  
不幸频频不期而至,  
幸福总是姗姗来迟。

这是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长达千行的爱情诗《唐璜》中的一段,表述的是诗中主人对于快乐与忧愁、幸福与不幸的那种苦恼和无奈的心情——

不想要的,频频出现;想要的,迟迟不见。这种心态很有代表性:“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国人对此种心态的生动概括。

“条条道路通罗马”是西谚中的一句格言,原本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中的一句,说的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道路四通八达,条条道路都与世界相连,走任何一条路都可以到达罗马,后被引申为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与此谚相似,中国人也有一句俚语:“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应当说,这来自不用文化背景的两句话,所阐明的都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用意也都是积极的,如能正确领会,则于做事大有帮助。与此同时,人们还会想起另外两句话:一句是法国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说,“一个姑娘可以用多种方法使自己变得漂亮,但只能用一种方法使自己变得可爱”;另一句是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个道理:尽管道路四通八达,但其中正确的路只有一条,因为有很多路是小路、邪路、岔路,甚至是一条死路,如果你急于求成、慌不择路,很可能就会陷入误区,走上歧路,而“歧路亡羊”的故事是人人皆知的。这就是说,通向真理的路从来就只有一条。就追求幸福而言,这条路就是德国待人歌德所说的那条路——“找到生活意义”。

与习惯于张扬个性、形而上学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含蓄的,不大宣泄个人的诉求,重视的是集体的目标,常常将“我”的愿望假“我们”之名说出来。这种文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国人的幸福意识薄弱。旧中国自不必说,新中国建立后,没有了“三座大山”,人民都过起了幸福生活。但何谓幸福?没有人说得明白,学者们也不去研究,大家都幸福着却又说不清楚什么是幸福。学术活动的一条规律是: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研究。既然我们这里不存在“幸福问题”,幸福学自然也就成了一片学术空白。更何况,幸福学从亚里士多德起便一直隶属于伦理学,而伦理学和社会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承认是两门学科,恢复了“科学”的身份,则之前留下学术空白也就可以理解了。

近年来社会和媒体热议幸福,是由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引发出来的。“小康”是什么样、“全面小康”又是什么样,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报告已有论述,此不再赘;但“小康”与“幸福”是什么关系,则需要研究。至今许多人仅仅用经济指标、用物质生活去理解“全面实现小康”,说明这些人并

不理解“小康”,仍然停留在幸福着但又说不清楚什么是幸福的阶段。毋庸置疑,对“幸福”和“小康”理解上的偏狭,从大的方面说,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利的;从小的方面说,使得不少奔“小康”、奔“幸福”的人陷入误区、走上歧路,亟待找到正确方向,需要指导。

如果说“找到生活的意义”是通向幸福的唯一正确之路,那么,没有找到生活意义的歧路则数不胜数,它们都在幸福的误区中。这些歧路,大体有以下几类。

### 1. 唯欲望论的所谓幸福之路

“欲望”本无罪,它无非是对生活的要求、需要、期盼和希望,而需求产生动力,它本应是社会前进的一种积极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例如,恩格斯在1875年11月《致彼·拉·拉甫洛夫》的信中,就表示同意他的下述观点:“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但欲望不是一个个美丽动听的童话故事,它只有兑现才有意义,而兑现是需要条件的。首先,欲望必须是合理的目标。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在某个时段所提的要求或所想实现的目标,都必然要烙上时代的印记,顺时而行;而如果对时代无知,逆时而动,则其欲望中的目标断不可能实现。其次,欲望必须是正当的目标。如果目标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的目标,其正当性自然毋庸置疑;但若目标是利己的,则就应当谨慎,应尽量做到利己利人,至少是做到利己而不损人;但若设定的目标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国家是一种“零和博弈”,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损人利己,其不正当性当无疑义。再次,欲望必须是合法的目标。“正当”与否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要求“人皆尧舜”是不可能的,但实现欲望目标绝不能越过底线——法律!中国传统文化将人分为6等,即圣人、君子、好人、常人、坏人、小人。其中“常人”即芸芸众生,“行高于常”者是好人,行更高者是君子、是圣人;“行低于常”者是坏人。常人是社会的大多数,它处在好人与坏人之间,时时向两边分化,其中有一些人专在道德与法律的交界区打“擦边球”——这些人应当谨记: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欲望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不踩到法律红线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良知、道德、纪律、法律是人的行为的4道屏障,其中,法律这道屏障就是用来阻挡人不入地狱的,一旦越过,后果可想而知!坏人和小人设定与所实现的欲望目标很少是合法的或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最后,欲望目

标的设定还必须以自身具备的资质为根据,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存在与期望的冲突——“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谚语已把个中道理讲得很透了。

唯欲望论者在寻求幸福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欲望,对欲望目标的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或缺乏认知或不予理会,对本人资质能否实现目标也心中无数,结果四处碰壁,最后抱恨而去。

### 2. 唯目的论的所谓幸福之路

从亚里士多德起,“目的”一直是哲学中、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是一个与“手段”(方法、途径等)相对应的概念。同欲望比,目的更具体、更清晰。目的与手段是彼此依存、相辅相成的:什么目的需要使用什么手段、什么手段能达成什么目的,是有规律的。尤其是:正当的目的只能使用正当的手段,如若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则目的正当性就令人生疑。“以正当的手段达成正当的目的”是事理学中“事理正义”的一条原则,而正当虽不一定就高尚,但至少意味着合法。现代法学认为,如果法无授权,则行为必然非法——动机的善、结果的善都不能成为行为违法的理由,因为程序是恶的。这就是法学家们奉为圭臬的“程序正义”。

唯目的论者之“唯目的”,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达到他想达成的目的——他所理解的幸福,则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道德与否、合法与否并不重要,甚至不成为唯目的论者考虑问题的一个因素。在唯目的论者中,不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如果有300%的利润,则不惜走上绞架”的亡命之徒。显然,这类人也许可以找到财富,但不会找到幸福。

### 3. 唯物质论的所谓幸福之路

宇宙原本只有一种存在——物质,而自从百万年前猿中的一个或几个分支从地上站起来直立行走并逐渐学会磨石头、学会用火、学会饲养、学会种植、学会用语言特别是文字彼此交流沟通时,宇宙中的一个星球——地球,便又多了一种存在——精神(或意识、或心理)。精神的载体是人。自此,人便从自然世界走进社会世界、从生理世界走进心理世界、从物质世界走进精神世界,从而由物理空间进入思想空间,成为目前宇宙内——至少是地球上——唯一拥有两个世界并同时生活于两个空间的生物。莎士比亚借其所塑造的人物哈姆雷特之口,称人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表明他对人的本质属性的了解是多么的深刻!人们历来尊敬伟人——精华中之精华,曾评出了上一个世纪、上一个千年的伟大人物。但如果要评上一个十万年或百万年的伟

人,则可能只有一位候选人——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的那只勇敢的猿猴,即第一个骄傲地站立在地球上的人,因为他把人类的祖先从森林中、从动物群中带了出来,使我们从此有了人的尊严。

唯物质论者看不见精神,他们看到的幸福全是物质形态的东西。他们不明白,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在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阶梯”上,生理需求(物质的)处在最下端,其上的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均为精神需求,而且一个比一个高。他们所追求的幸福仍停留在动物本能的需求上,其生命仍然活在物质世界和物理空间里。显然,唯物质论者找到的充其量是有较多“骨头”的动物的“幸福”,并没有找到人的幸福,因为“骨头”里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从而也就没有恩格斯所赞美的“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人无德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之“贵”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都富了起来,但多半都有“富而不贵”的困惑和苦恼。这些人应当明白:“贵”是一种精神气质,它不是物质的东西可以取代的,更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所以,“富”并不能带来“贵”。

#### 4. 唯享乐论的所谓幸福之路

爱尔维修在《精神论》中说:“趋乐避苦的自爱感情,是人所共有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人是为了幸福而创造的。”看来,人之享乐或享受是一种本能的需求,而且用来享受的东西数量多、质量高更能满足人的需要,问题只在于是否有资格享受,以及享受什么、怎样享受。

大自然一穷二白,它所提供的“自然物”仅能使寄生在地球上的生物活着,今天我们所能享受到的一切都是人类的“造物”——从磨出的第一块石头,到烤熟的第一块兽肉,到种出的第一株小麦,到发明的第一个文字……到造出的第一艘宇宙飞船。如果没有这些造物,人就只有回到丛林中、回到树上去、回归原来的生活状态,继续以猿的身份与兽作伴。创造使猿变成了人,从而有资格与猿作揖而别;创造又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使人类的后代能拥有今天这五彩缤纷的世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人生所有的快乐都是创造的快乐。”这句话表达了一切创造者的幸福观。所以,造物是属于创造者的,幸福当属于创造幸福的人。英国作家萧伯纳说:“如果我们没有建筑幸福,我们就无权享受幸福。正如没有创造财富便无权享受财富。”相信没有人会对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因为他道出了一个真理。

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追求享乐的恰就是那些不想投入或不肯全力投入创造的人;而创造者多半是把创造活动本身当做一种享受,对物质享乐很少用心。“活得匆忙,来不及享受。”歌德《浮士德》中这句诗也许能道出创造者的心声。唯享乐论者不仅其享受幸福的资格应当受到质疑,其享受幸福的态度也与理性相去甚远:一是始终徘徊在物质世界里,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中流连忘返、打发时间;二是缺乏节制,往往直到享乐致死才罢休。理性的幸福观能清醒地区分人的享受与动物的享乐:一是不排斥物质享受,但懂得“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性),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亚里士多德),所以更注重动物不懂、唯人才有的精神享受;二是不拒绝正常的享受,但有节制,时时准备着“以理性之水去浇灭欲望之火”(亚里士多德)。所以唯享乐论的幸福之路也是幸福误区中的一条歧路。

#### 5. 机会主义者的所谓幸福之路

机会主义原本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属于哲学范畴,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很有特点,值得研究。机会主义者是机会主义的载体,指的是这样一类人:没有什么定见或主见,唯机是从;“为了一碗红豆汤,可以出卖自己的长子权”(列宁),常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政治上投机,生活中取巧,总想不付代价或以最小的代价去谋取最大的好处。

机会主义者不相信规律,相信命运;不相信奋斗,相信机遇;不相信必然,相信偶然。受这种世界观支配,他们往往用投机取巧的手段去谋取自己的幸福。在机会主义者的幸福之路上走着各色人等,他们的心态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想投入,只想产出。这些人很容易用铤而走险的办法去为自己攫取所谓的幸福,那显然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在幸福的误区里还有多少条歧路,没人说得清楚,因为原本就没有定数。这是因为,幸福本来就是某些期许得到了实现时的一种满足感,而由于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人们的期许千差万别,用来实现期许的办法自然也五花八门。但生活中的现实是:一些人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兑现了期许;一些人迷失了方向,走上了歧路,而“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终“不知所之”,最后,或无功而返,或折戟沉沙……

“以正当的手段实现正当的目标”是生活中的真理,是被3 000年人类理性文明史验证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些期许得以实现的人必定是以“两个正当”做事的人;而“亡羊”者之陷入误区而不能自拔,必定是目标设置或实现手段缺少正当性,甚至是二者均缺少正当性。当然,也有偶尔得逞的: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合法的或非法的、诚实的或欺骗的、高尚的或卑鄙的——的确是获得了他们期许的权力、地位、财富、名誉等,但以后发生的情况又证明了,这些人得到的不是“福”、而是“祸”。于是,结论又回到了原点:“以正当的手段实现正当的目标”是实现幸福的正确途径,这是一条绝对安全的“绿色通道”。

在追逐幸福的道路上,陷入误区、走上歧路,必然会付出代价,这没有什么;要紧的是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把所有的歧路都试过。正确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听从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的忠告:“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

### 三、幸福的真谛是精神追求

人人都有幸福,  
人人都有忧愁;  
有时候忧愁是幸福的前奏,  
有时候幸福是忧愁的源头。

这是但丁《神曲》中的一小节,讲的是福祸之间的辩证关系,意在要人们以平常心对待幸福和忧愁:在幸福降临时,不要忘乎所以;在忧愁到来时,不要悲观丧气。

能否获得幸福,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幸福。许多人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其原因可能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幸福。康德曾针对人们的幸福认知问题说过一段很有启示性的话:“幸福这个概念是那么模糊,弄得人人要幸福,然而人人对于他自己究竟要什么、志在什么,并不能说得很清楚,不能说可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幸福概念的所有成分都是经验的、一定要由经验取得的……幸福不是出于理性的理想,是出于想象的理想……组成幸福的那些结果(幸福的元素)是无穷尽的。”用这段话来评估人们的幸福实践,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幸福包括的“元素”多,而一些人“对于他自己究竟要什么、志在什么,并不能说得很清楚”,才导致这些人只见“忧愁”、不见“幸福”。上节我们讨论了幸福的误区问题,分析了种种歧路是如何将幸福的追逐者一步步引向不幸的。那么,幸福的正路在哪儿、幸福的真谛

又是什么呢?这是幸福学说中的认识问题。

恩格斯说:“自然科学的结晶是概念”,这一论断可以推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科学的“结晶”,概念及其定义都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揭示及准确表达。3 000年的幸福论坛,思想家们给出的幸福定义林林总总,不下百种,这些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幸福的内涵及本质,其中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幸福是至善”,善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至善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定义,强调善,即德行,是幸福的本质。

幸福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是伊壁鸠鲁的幸福定义,认为身体(肉)健康与精神(灵)健康的统一就是幸福。

“幸福是人想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满足。”这是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幸福定义,突出人的某种期许得到满足时的感觉。

“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这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幸福定义,肯定幸福就是欲望得以实现且仍在发展,强调了幸福的相对性。

“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找到生活意义的人是幸福的”。这是歌德的幸福定义,突出强调精神幸福和活得有意义。

“幸福就是知足,别的没有什么。”这是苏联作家玛克西姆·高尔基的幸福定义,它认为知足者幸福,因为知足表明其人有自知之明:认识你自己。

“幸福就是追求并实现了意义的那种感觉与体验。‘它’可以被定义为确信自己被他人和社会所需要。”这是赫舍尔的幸福定义,它强调的是生活的意义、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每个人肩负的社会责任。

“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是人生的目的、道德的标准。”这是美国《幸福》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幸福定义,强调了幸福的“目的”意义和“标准”意义。

从以上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几种幸福定义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幸福是人的心理上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由人的某种正当的期许(目标、目的、愿景)得到实现带来的;所实现的期许证明了这个人存在的意义及社会价值;理性(智)、德行(善)是期许得以实现的前提,而非理性(愚)、非德行(恶)会导致人走进幸福的误区;有理性、有德行的人是把生

命和精神安顿好了的那种人。总之,幸福作为一种感觉,它是人对自己生活之意义的一种满足感、愉悦感和价值感,是三者统一时的那种整体感觉。

人的生活包括两大领域: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二者在人的生活中各占什么地位,是3 000年来人们形形色色的幸福观相互区别并相互冲撞的焦点;而社会主流的幸福观,正在于正确地界定了二者的关系,分别赋予二者在生活中以恰当的地位。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对“幸福不过是一种物质上较高的享受”等“物质幸福论”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批评说:“如果幸福就在于肉体的快感,那就是说,牛找到草料吃是幸福的。”柏拉图强调“人”的幸福标准与“狗”不同,其幸福与否不能以“占有骨头的多少”来衡量。这二人均认为幸福不是物质的等价物,但并未对幸福的本质进行阐述以揭示幸福的真谛。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沿着其师的思路进行深入思考,指出幸福是“至善”、是“心灵合于德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牛、狗及一切动物的“幸福”,使幸福专属于人,因为“善”和“德”都是理性的东西,动物是没有的。然后,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分析了幸福内涵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幸福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性灵)诸善……有的人以为,人对于诸善中之德行只需适如其量已经足够,至于财富、资产、权力、名誉以及类此的种种事物则多多益善,没有限度。”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恰恰颠倒了幸福诸要素之间的主次关系,明确指出:“灵魂诸善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则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原因是:“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此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灵魂的各种善德是愈多愈显其效益……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最富饶的财富或最健壮的身体更为珍贵……一切明哲的人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对幸福内涵中的物质因素(外物)与精神因素(灵魂)的关系,做了经典的论述,后世的思想家在谈及同一话题时都直接引用、不再发挥——亚里士多德已把话说透、说尽了,别人不可能说得更透彻。此时颇有点李白不敢在黄鹤楼上题诗的味道,李白自己说,那是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对于人的幸福感的影响不

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一个呈递减趋势,一个呈递增趋势。其规律是:在原始社会,人与动物争食,食物就是生命、就是一切,“果腹”不仅是人的第一需要而且是唯一需要,谈不到精神需要;进入文明期以后,每当物质(食物等)超过人的需要时,人就产生了精神需要,而每当物质匮乏时,精神需要便收缩、减少;但到物质的东西已能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不再成为人们忧愁的原因时,精神需要便扩张、增加,甚至成为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说明,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与幸福感均有一定关系,但都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

据《参考消息》报道,西方有一项关于人的幸福感的调查统计与分析研究,其给出的结论是:

(1)幸福感与个人魅力正相关,与权力、地位不相关,与经济水平弱相关。个人魅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受到的尊重;二是对他人的影响力。

(2)幸福感与富裕程度相关,但当家庭人均月收入超出8 000美元时,幸福感不会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而继续上升。

(3)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小,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大。

(4)“蓝领”对幸福诉求的排序是:健康、就业、收入、安全、社保、教育、娱乐、交际;“白领”对幸福诉求的排序是:健康、事业、职位、安全、收入、教育、交际、娱乐、社保。

(5)住房面积、生活空间的大小影响幸福感:对一般人而言,住房90 m<sup>2</sup>的比60 m<sup>2</sup>的幸福,140 m<sup>2</sup>的比120 m<sup>2</sup>的幸福,但住房180 m<sup>2</sup>的不觉得比住160 m<sup>2</sup>幸福,销售最快的是160 m<sup>2</sup>的而不是140 m<sup>2</sup>或200 m<sup>2</sup>的商品房。160 m<sup>2</sup>被称为一般家庭住房“黄金面积”。

(6)在影响幸福感的若干变量中,多数人的选择顺序是:价值观、教育程度、富裕水平、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但“白领”还选择了“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蓝领”选择此指标的较少。

这项调研表明:无论“蓝领”、“白领”,都很重视看起来很“虚”的、与“灵魂”有关的精神因素,显然吃、穿、住、行的开支目前已不再是人们的头等重要问题了;但从选项的排序看,“蓝领”对物质性东西需求的关注度高于“白领”。看来,“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正确出口”这一论断是成立的。

由于人源于动物、至今也还是动物,所以一般动物的需求,也都是人的需求;但“人猿相揖别”毕竟上百万年了,人成为“文明人”也已5 000多年了,

所以动物的某些需要,人已不再需要。重要的是,在长达百万年、特别是近5 000年的人、猿分立的过程中,人的生活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需要——旨在各种创造活动的思维,以求真、求善、求美,其“产品”有一个总的名称:思想。思想是一种通过心理活动而产生的精神成果,这是动物所不能理解的,自然也是动物所没有的。“思想”作为一种“产品”,是人类一切创造中最伟大、最珍贵的创造,其价值无法用物质、金钱来衡量。概念是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是思想的支点,例如“量子”、“系统”、“剩余价值”、“一国两制”等。据说,有学生问著名人类学家、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伯丁大学校长赫胥黎:“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赫胥黎的回答是:“动物身上没有的东西!”这是“半个答案”。人与猿同祖,就生理结构而言,凡人有的,猿也都有,连盲肠都不缺。那什么是“动物身上没有的东西”呢?学生们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大彻大悟:人比动物多的就是一件东西:创造及其产物——思想,或者称其为精神,或者称其为理性。反之,如果从人身上去掉理性、去掉精神、去掉思想,则人猿等同,人又回到动物那里去了——

动物获得了理性,遂成为人:

动物 + 理性 = 人

人失去了理性,便回归动物:

人 - 理性 = 动物

人与动物既相距很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是指二者社会属性上的差别;人与动物又相距很近,有着本能上的相似,那是指自然属性上的一致。

所以,物质的诉求不能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唯有动物没有、唯人才有的东西才能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唯其如此,我们说人的幸福之路的正确出口是精神追求。

#### 四、幸福的钥匙在自己手里

希望常在远方,  
未来正在路上,  
梦景从未兑现,  
幸福总不在场。

——海涅《无奈》

如果你错失了幸福,  
前面还有希望;  
如果你与希望又失之交臂,  
前面便是地狱。

——雪莱《希望》

海因里希·海涅是与歌德齐名的德国诗人,他的这首《无奈》道出了所有幸福追逐者的“无奈”:对希望、对未来、对梦景,既殷殷期盼、望眼欲穿,又无可奈何、心生怨尤。心有千千结,概因“幸福总不在场”!

珀西·比西·雪莱是英国著名的“希望”诗人,他的“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200年来一直鼓舞着人们在黑暗中企盼光明。这首《希望》,是想劝导那些幸福路上的失意者: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找到幸福,不必懊恼,还有希望;如你执迷不悟,罔顾希望,那上帝也救不了你。在希腊神话里,“希望”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神,上帝派他守在地狱的入口处,抢救那些本不该入地狱而眨眼之间就要入地狱的人。西方人将此举称为“上帝对人的最后的关怀”。了解这个典故,方能深刻理解这首诗。

上节所谈的“真谛”,是关于幸福的认识问题,本节要谈的“钥匙”,是关于幸福的实践问题。

人人盼幸福、人人想幸福,幸福是人的自然权利,这没有疑义,但这仅仅意味着你有权争取幸福,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无功受禄”——凭空得到一份幸福。所以,对一切幸福追逐者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是应知道幸福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现实中对“幸福来源”认识糊涂的人却不在少数。对此,本文在第二节“幸福的误区扑朔迷离”中已有分析,但那说的是幸福实践中的“歧路”,而比歧路更能使人迷惑的一种幸福观则是坐等“金币从天空纷纷落下”(《圣经》)或“天上掉馅饼”,这就是幸福论中的“幸运说”。这是人们从官二代、富二代现象总结出来的一种“幸福观”,它的错误在于并不理解幸福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幸运不是幸福。幸运者可能由于偶然的的机会获得灵魂之外的诸善,可谁都不能完全依赖偶然的的机会而成就其正义和敦厚诸善,并因此而获致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一种意识,是对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满意的一种表达,它意味着个人正当目标的圆满实现和本人潜质的充分发挥,意味着对他人提供了帮助、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从而心情愉悦,感到幸福。而“幸运”是意外地得到了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如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等,你在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无法产生也不可能产生“正当目标的圆满实现和本人潜质的充分发挥”那样的感觉,充其量是“吃香的、喝辣的”,比同类多一些“骨头”而已;至于精神生活则非零即负——“受人尊重、自我实现”这种精神生活中的境界和享受,靠幸运得

到“幸福”的人是无法问津的。所以,富二代从富一代那里继承的无非是一些财富,官一代给予官二代的不过是一些特权,都不是幸福;而特权更有可能是“祸”,而不是“福”!

幸福只能靠幸福的追逐者自己去创造,舍此别无他途。这是3 000年幸福论坛给出的结论之一,它已变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幸福观。幸福的创造之路,是一条以意义为指向,讲贡献的通衢大道;是一条以知识为力量,讲理性的康庄大道;是一条以智情德为追求,讲品位的金光大道;同时,它还是一条以德行为操守,讲节制的绿色通道。

### 1. 以意义为指向,讲贡献,走幸福之路的通衢大道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并非人人都得到了幸福,这里有一个“资格”问题:你对社会的贡献是否大于你向社会的索取?如果是“大于”,你就具备了参与幸福分配的资格,就有了进入幸福家园的“入门证”。这是一个我们平时很少思考的问题,却是人类思想家最为重视且论述较多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幸福,就是被意义照亮的人生,所谓意义就是人对社会的贡献。

人是为意义而存在的,或创造意义或破坏意义、或获得意义或叛离意义,但不能也无法脱离意义。人的生活状况只能用意义来衡量,意义是生活质量的标准。假如一个人在人生的博弈中输掉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他就是最大的输家,其精神生命就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仅具有生理意义的躯壳。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歌德说,“找到生活意义的人是幸福的”。但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意义,而是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的意义。赫舍尔在《人是谁?》中曾以“太阳的存在对其自身毫无意义、对地球有意义”来说明“人的存在对自身并无意义,他的意义在于对他人、对社会”。这是一个极具哲理性的比喻。

人生的意义如何来评价?用贡献来衡量。如果说意义是人的生活质量的的标准,那贡献就是具体体现该标准的尺度。正是由于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做出了贡献,而且贡献都多于甚至大大超过他们从社会获得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存在下来、才能继续下去。在做出贡献与享受幸福的关系上,对于未做贡献者不能享受幸福和贡献远大于获得者有资格享受幸福这两种情况,一般人都不会提出疑义,但要求拿回“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者却大有人在。这是一种很陈腐、很幼稚的观点,马克思早在1875年就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行了驳斥,他指出:社会劳动总产品只有在作出直接生产费、集体总消费、国家防御费等扣除之后,才能用于分配,如果像拉萨尔所主张的(反映在其《哥达纲领批判》中)每人都拿回自己“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则社会必然瓦解,国家将不复存在。作为一种幸福观,如果一个人做了点贡献,而后又不折不扣地拿回了自己贡献出来的东西,那他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岂不等于零、自己岂不就是一个零的存在?

贡献不具有随意性,应当说,它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强制性;仅仅从“分配幸福”这个角度去考虑贡献问题是很功利的。其实,贡献是国民的义务。如今人们的权利意识很强,而权利与义务、与责任是对称的,公民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同时也就有了不可让渡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却被人们忽视了。康德曾在其诗中说:“躺在床上,我幻想着生活的美好和幸福;醒后发现,生活的内容其实是责任和义务。”他认为:“一切欲望在责任和义务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责任贯穿人的一生。”

“权利意识”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权利意识的增强是我国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但目前的情况是,由于权利没有用责任或义务来平抑,许多人的所谓权利意识并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其原因不完全是个人主义作祟,确有认识上的糊涂。边沁曾以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大意是:权利和义务就像人上衣的两只袖子或下衣的两个裤筒,你总不能只套一只袖子或一只裤筒吧?这个绝妙的比喻意在说明,权利与义务(或责任)是分不开的,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的人,就是那个套着一只裤筒招摇过市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不可能存在下去,否则就是对自己义务的让渡、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所以,强调贡献对于幸福建设的重要性,首要的是强化人的责任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 2. 以知识为力量,讲理性,是幸福之路的康庄大道

人们的幸福观千差万别,但所谓的幸福之路,其实只有两条,一条是理性的幸福之路,另一条是非理性的“幸福”之路。理性的幸福之路是一条正路,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知性,一个是德性;非理性的“幸福”之路是一条歧路,而且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表现各不相同,但总体特征就是轻视知性、逃避德性,企图通过“抄近路”、“走捷径”而得到“幸福”;其“幸福”的内涵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有悖于社会

主流幸福观,其“幸福”目标即使实现了,也只能算作“致富”,不是“幸福”。“为富不仁”者有“富”而无“仁”,不能算幸福之人。

“知性”、“理性”、“德行”、“至善”是古希腊哲学、伦理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它们源自古希腊,在中世纪消失了上千年,至文艺复兴又被发掘出来,并作为古希腊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被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在古希腊文化中,这几个概念是紧密联系着的。例如,苏格拉底的一个著名命题是“德性即知识”;柏拉图的一个著名的定义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幸福是至善”。从中可以推出这样的认识:知性是理性的基础和内涵,而理性则是知性的外化和表现;理性的力量来自知性,因而也就是知性的力量。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小康社会建设本质上是在实施一项“幸福工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幸福工程。这一工程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后就开始了;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提高了工程标准,而且加快了工程进度;而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表明这一工程8年后就要竣工了。

自英国人文主义大师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后,300多年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的沧桑变化已使知识的力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这里无须再去讨论知识为什么会是一种力量、知识如何成为一种力量,只想强调:任何一种不以知识为力量的幸福尝试,都是与理性、与德性背道而驰的,因而是注定会失败的。

### 3. 以智、情、德为追求,讲品位,是幸福之路的金光大道

认为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正确出口,这是本文的主旨,其理由已如上述。但“出口”问题并没有回答精神追求的内容是什么,即我们在精神上追求什么?而这一点却极其重要——由于始终不明确人在精神上追求什么,许许多多的人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精神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意识,精神的有无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精神的富有或贫困又是区分不同人的标准。那么,这种区分的具体指标是什么、有哪些呢?这就涉及到精神的本质及内容。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意识。低级形态的意识感性成分多、理性成分少,而作为高级形态意识的精神,由于

其理性程度很高,因而它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把握也更准确、更深刻、更本质。例如,我们说某人具有道德意识而另一个人具有道德精神,显然后者比前者能更深刻地理解道德。精神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他需要凭借某些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就是精神的具体化。黑格尔和马克思曾先后指出,在精神哲学中,精神现象大致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即认识的、感受的、意愿的。与之相对应,精神追求也包括智、情、德三个方面,它们是精神的三要素——人与猿正是在这里分道扬镳!

追求幸福,以物质的东西为目标,叫没品位;追求幸福,以精神的东西适如其量即可、物质的东西多多益善最好,叫低品位;追求幸福,如果在基本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基础上,专注于自己精神诉求的不断满足、不断充实、不断提升,叫高品位。人的精神品位的高低主要看其对智、情、德三个方面的追求。

#### (1) “智”的精神诉求

人首先是由于智高于猿,才知道、才能够从地上爬起来直立行走的,智使人学会用火,智使人知道打制和磨制的石头更锋利,智使人懂得四季更替、春种秋收……因此,作为现代人,要提高幸福的品位,发展和享受自己的智力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发展智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求知,但要保持求知的欲望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是距今2600多年前雅典贤明君主伯里克利所建帕台农神庙大门上镌刻的一句箴言,旨在告诫世人:要节制言行,要有自知之明。苏格拉底曾4次拜访帕台农神庙,每次都在这句箴言前久久站立,参悟其中含意。最后苏格拉底终于悟出:由于不能认识自己,人类常常犯错误;造成错误的不是那些已经知道的人,也不是那些自己知道他不知道的人,而是那些并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的人。不能认识自己,就只能自己做自己的奴才;认识了自己,就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成就自己的人格。自从悟出此箴言,苏格拉底便自称“一个自知其无知的人”。不懂得求知、不愿意求知、不能持之以恒地求知,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就求知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求知,而是愿不愿意求知。

知识有三个来源:一是从实践中学;二是从他人那里学;三是从书本中学。显然,前两种来源都各有局限性,唯有第三种来源可以操之于我。所以,一个人要使自己在“智”的精神诉求上有显著进步,唯有读书。

“阅读改变人生”这句话是文字发明以来被人类中的无数精英反复验证过的真理。读书之难在于成为习惯不易,而一旦形成习惯,阅读便成为一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而变成一个人文化模式的要素,这时候,一个人的习惯便是他自己,二者合为一体,想分开都难。人有许许多多的习惯,有优良习惯,有不良习惯。在所有的好习惯中,人一生受益最大的当数阅读习惯,正是该习惯的有无把人分成了两种人:有知者和无知者。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改变自己的境遇、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唯有阅读能够改变人的素质——读多少书,知多少理;唯有阅读能够改变人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

## (2)“情”的精神诉求

情也是一种高级意识,是人对外界事物的一种心理反应和积极反映。与此相对照,动物对外界事物只有本能反应和消极反映。“如果某一天猴子会笑、会哭,那它就不是猴子了。”这说明,情专属于人,动物是没有的。

情分三种:亲情,友情,爱情。亲情源于血缘关系,这里不去讨论。根据保加利亚学者基·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友情缘于“对彼此人格的敬重”,爱情缘于“异性之间的相互欣赏”。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三种情的维系,他存在的意义就只剩下维持自己的生存,而生存并不是生活。正是由于认识到爱是人的精神追求,托尔斯泰才说:“爱别人和被人爱是同样的幸福。”

关于友情,古今有两个伟大的榜样。一个是柏拉图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友情,一个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情。柏拉图是古希腊文明的开拓者梭伦的直系后代——7世孙,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关于他对希腊哲学和人类文明的贡献,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评价:“柏拉图奠定了人类理性大厦的基石,几千年西方哲学史无非是对柏拉图的注释而已。”亚里士多德并不是雅典人,也不是希腊人,他从当时还比较落后、野蛮的马其顿王国到雅典求学,投师在当时誉满希腊、名噪欧洲的哲学大师柏拉图门下。在柏拉图的指点和影响下,来自落后国家的学子亚里士多德几年后便长成参天大树。他一边虚心听课,一边在思考老师的观点,经常在课堂上与老师辩论,为此常受到同学们的责任。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最听话的学生,却是他最好的学生。柏拉图非常喜爱这名常与之争辩的学生,常对友人讲:“我的学园由两部分组成,亚里士多德是学园的大脑,其余的学生是学园的身

体。”亚里士多德也曾当着老师和同学们的面解释自己与老师的争辩,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话一字一珠,乃千古绝唱,至今仍然是人们尊师、爱真理的座右铭。柏拉图去世时,亚里士多德代表“柏拉图学园”在老师的墓前致悼词——一首自己为老师而作的长诗,高度概括其师对人类的贡献和对自己的教导。这悼词今天读来,其感觉就像在读恩格斯当年那激动人心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葬礼一毕,亚里士多德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老师的遗文、出版老师的著作。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高过柏拉图,称他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后,仍不忘记“蓝”,其人格之伟,光照千古!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情,人们都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爱情,其作为精神诉求的意义和作为精神享受的价值还要高过友情。如果说“亲情是人与人之间血缘的贯通”、“友情是人与人之间灵魂的贯通”,则爱情更是“人与人之间灵与肉的贯通”。爱情为什么是人之“情”的享受之最,读一读古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的《爱经》你便知道了。有学者研究,从古至今,写得最好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戏剧)、因作品而成为大文学家或大诗人的,均与爱的主题有关。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是叱咤风云的伟大革命者,一生著述岂止等身,但若读一读马克思写给恋人燕妮的十几首爱情诗,读一读毛泽东写给其妻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和为杨开慧而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体会那种神圣的爱,你便会知道什么叫做“淋漓尽致”、什么叫做“荡气回肠”,从而便会理解,正是赤子之心使他们成了伟人!

## (3)“德”的精神诉求

在“依法治国”的法制国家,我党又提出“以德治国”,原因在于深刻认识到了道德的伟大力量。法制的完备和道德的高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在柏拉图美学里,真善美是统一于美的:真的事物是美的,因为它真实;善的事物是美的,因为它善良。至于美的事物,则其美当是无疑了。道德的核心是善、至善。与法律具有的强制力不同,道德之力在于它的感召性,其所产生的力量能震撼人的心灵、改变人的性格、端正人的道路、提升人的境界——这就是古今中外一切道德楷模身上具有的那种力量!“心里总是想着有德之士的人,必定也是有德之士。”这句罗马思想家马可·奥勒留传于后人的格言,是对道德之力量的最深刻的诠释。试想,人的一

生如果能与有德之士交友、生活在有德之士中间、接受有德之士的陶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唯其如此,人们把享受道德——自己的道德和他人的道德以及社会的道德——往往视为人的最高的享受。“君子德如玉,淑女品若兰”,道德人品高尚的人,其香扑面而来。“一盎司的忠诚相当于一吨重的聪明”,道德的分量由此可见。

儒家所说的“仁者无敌”是一个包含着深刻思想关于道德力量的著名判断。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仁者”得道多助,敌人奈何不了他。该解读望文生人、穿凿附会,将一个极富睿智的命题作了肤浅的解释。事实上,“仁者无敌”的本意是:仁者,是没有敌人的。因为“仁”即“善”,与仁为敌便是与善为敌,那就将自己置于恶人的位置上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结尾时说:“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笔者认为,这段话与“仁者无敌”异曲同工,是对“仁者无敌”最好的解读。

关于人的精神诉求,人与人可能有所不同,但智、情、德基本上覆盖了人在精神方面的诉求——一个少智、寡情、无德的人,他所缺失的正是那种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

#### 4. 以德性为操守,讲节制,走幸福之路的绿色通道

幸福固然“操之于我”——幸福的钥匙在自己手里,但幸福的追逐者只有经过一条安全的通道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一条以德性为操守的绿色通道。

这一点之所以被强调,一是它具有普遍性意义,二是它具有现实性意义。“德性是幸福的守护神”是一句至理名言,它应当成为所有幸福追求者的座右铭。歌德说:“才能造成的缺失,可以由道德来弥补,而道德造成的缺失,却无法由才能来弥补。”这

表明,当人的两种最重要的素质同时出现时,道德始终站在排头!

谋求幸福就是实现自己的欲望,但能否实现取决于两个边界条件:一是欲望的正当性,二是用于实现欲望的手段的正当性。这个道理,本文在“误区”一节已经作了分析。问题在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亚里士多德命题”,经2500多年的验证后至今仍不被某些幸福的追逐者所认同,生活中视自己为目的和归宿、视他人手段和工具的行为者比比皆是,其中不少人在自己的“幸福”之路上倒下了,细究其因,竟都出在“德行不足”上——或少德、或缺德、或无德,总之都成了自己操守的牺牲品。

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幸福工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双重身份:我们是这一工程的享受者,这是权利;我们更是这一工程的建设者,这是责任。树立以精神追求为旨归的幸福观,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性。什么是统一性,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说:就是“两个概念共存于其中的那个事物”。这个“事物”,在目前,就是我们正在加紧实施的“幸福工程”——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10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 [2] [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 西方思想宝库[M]. 编委会,译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 [3] [英]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4]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得普·李·拉尔夫. 世界文明史(1—4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5] 俞久洪. 外国文化史[C].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 [6] 刘西琳. 人类求索精神出路的漫漫征途[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17-05

#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以洛阳市为例

张宝锋<sup>1</sup>, 侯利文<sup>2</sup>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2;

2. 洛阳师范学院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通过对洛阳市358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从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10个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较高,但是在具体满意度幸福指标上其高低存在较大差异,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社会发展主观指标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凸显并呈现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后媒体时代很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尤其是其中通过不正当途径而实现的“一夜暴富”,“富二代”的炫富,“官二代”的“拼爹”等,必然会导致人们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进而影响民众正常的心态和心理健康,使幸福指数降低,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把提高民众主观幸福感放在重要位置,提出要不断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任由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主观幸福感是社会及个体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的综合指标,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

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sup>[1]</sup>,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显著特点。1980年代中期,我国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问题。林南等<sup>[2]</sup>在天津、上海等地采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法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叶南客等<sup>[3-4]</sup>对上海老年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调查。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主观幸福感问题。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理论脉络各有传承,研究方法长短互补且以实证为主导,不同学科之间的借鉴和融合也渐成趋势。进入21世纪,学者们的研究焦点更多的是对带有明显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从介入幸福感研究的学科领域来看,以伦理学、社会学为主,兼有心理学、政治学;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著作、期刊论文以及博士论

**[收稿日期]** 2012-10-12

**[基金项目]** 2012年河南省软科学项目(122400450173);2012年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2B092);2011年度洛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11-QNJJ-016)

**[作者简介]** 张宝锋(1966—),男,河南省周口市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郑州轻工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城市社会学。

文等各种形式;从研究性质来看,以大型定量研究为主,兼有高质量的理论探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与文化积淀的地区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没有完成理想类型的建构(现有的研究更多地是涉及东部沿海地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探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既能准确摸清现阶段城市居民的实际心态、对幸福的主观感知程度,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可以作为反映社情民意、衡量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进一步为政府把握社会建设的主观条件和城市居民的心理脉络提供科学的现实依据,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洛阳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典型性。本文拟通过对洛阳市360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从“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维度生活满意度”两个层面剖析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各个具体维度上的差异,进而给出政策建议。

## 一、研究方法

### 1. 样本与资料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2年3—7月份对河南省洛阳市18周岁以上的360位城市常住居民的抽样问卷调查,其目的是了解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其中,从性别来看,男性被访者169人,占比47.9%,女性被访者184人,占比52.1%;从年龄来看,18~34岁的150人,占比42.4%,35~60岁的152人,占比42.9%,61岁及以上的52人,占比14.7%;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的35人,占比10.0%,初中的96人,占比27.4%,高中、中专123人占比35.1%,大专以上的96人,占比27.4%;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256人,占比72.7%,未婚的96人,占比27.3%。

本研究采用分段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在洛阳市随机抽取2个区,然后在每个区中抽取2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各抽取2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各抽取40~5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个案访谈。同时,通过对河南省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等相关机构和各级政府、村委会的实地调查、个案访谈及现存统计资料收集,获取相关的一些文献、统计资料等信息。需要说明的是,调查资料的收集工作全部是由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通过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完成的,并且在调查之前由专业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技巧方面的培训。调查资料的质量可靠。

资料的分析主要以定量研究法为主、质性研究为辅,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在对大量样本进行科学统计的基础上,从人口学特征和类型比较的分析视角出发,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 2. 变量的操作

研究的变量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工作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业余生活、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生活预期等。研究中将“主观幸福感”转化为“生活满意度”指标。通过整体生活满意度和10个维度的生活满意度来加以测量。对于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您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么”这一问题来进行的,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就构成了主观幸福感从低到高的排序。此外问卷中“假如幸福感为0~10分,您认为您现在的幸福感可打多少分”一题更是直接对主观幸福感的量化测量。而对于10个维度的具体生活满意度,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相关问题(不同问题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来加以测量。

## 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描述性分析

### 1. 整体生活满意度分析

整体生活满意度是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主观感受的整体性表征,是综合了各个方面因素而成的综合性指标,对于测量包括很多因素、方面(这些因素和方面彼此之间又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相关关系)而又具有很强主观性的“幸福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通过Spss13.0统计分析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情况较好。358位被访者(有效样本)中对目前生活感到“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的分别有8人和30人,有效百分比为2.4%、8.9%,也就是说有一成多的人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不满意;相反,对目前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有22人和141人,占全部有效样本的6.5%和42.0%,可见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人数较多。因此,可以认为:洛阳市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大多数人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需要注意的是,在336个被访者中,仍然有135个选择“一般”,占比40.2%,这说明有四成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对这一部分我们要辩证地分析、具体地研究。经过深入访谈发现,选择“一

般”选项的人,他们大多是对目前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好坏感觉或是觉得同以前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出于对目前社会主流趋势的积极期待,致使他们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社会期望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就具体的生活满意度指标进行分析,才能对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作出判断。

“您对自己现在的幸福感打多少分”的调查结果显示,358位被访者中打分5分以下的有63人,占18.4%;打分“6~8分”的有218人,占63.7%;打分“9~10分”的有61人,占17.8%。这从量化的角度反映出经过近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普遍有所提升,洛阳市作为中原地区有代表性的城市也不例外。这同方纲等<sup>[5]</sup>在成都市对433名居民调查得出的结论相同(整体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值为7.11分)。

## 2. 具体生活满意度分析

作为主观性的整体感知,主观幸福感是民众对自己各个方面感知的叠加和整合。为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我们分别从10个方面调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现状(见表1)。它们分别是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在这10个维度上的选择是“一般”和“满意”。这就充分印证了上文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判断。

就工作现状而言,305位被访者中大部分人对工作现状感到满意。调查显示,仅有3人对工作现状“非常不满意”,另有39人对工作现状“不满意”,总共占13.8%;对工作现状感觉“一般”的占51.5%;对工作现状感到“满意”的占30.2%;对工作现状感到“非常满意”的占4.6%。此外,在问到“对目前工作

取得的成就满意吗”时,54.7%的被访者回答“一般”;23.4%的被访者回答“满意”和“很满意”;近1/2的被访者认为工作中的压力适中,不大也不小;66.0%被访者认为工作中付出和回报较为平衡。

就居住环境而言,被访者普遍较为满意。调查显示,354位被访者中仅有6人对现在的居住环境“非常不满意”,30人对居住环境“不满意”,48.1%的被访者表示对现有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同时72.2%的被访者与配偶或子女共同居住,生活幸福,42.0%的被访者对居住小区的环境表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洛阳的城市社会建设使人们普遍受益。

就家庭生活而言,被访者的满意度很高。数据显示,354位被访者中197人对家庭生活感到“满意”,占总数的55.6%;11.0%的被访者对家庭生活感到“非常满意”。61.5%的被访者认为“家庭和睦幸福,家庭成员沟通愉快,感觉满意”。在有婚姻关系的358位被访者中,56.4%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婚姻关系“不错,和睦相爱”,13.5%的被访者认为“十分亲密”。可见,洛阳市居民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家庭生活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家庭收入方面,与其他具体维度相比,被访者的满意度有所下降。调查显示,在352个被访者中,有116个被访者表示对家庭收入“满意”、“非常满意”,占33.0%;17.9%的被访者对家庭收入“不满意”、“非常不满意”。这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数据中得到体现:43.5%的被访者认为月收支情况“一般,有时候需要精打细算”;56.6%的被访者认为洛阳市的物价水平“比较高”和“非常高”。

人际关系方面,被访者的满意度也较高。353位被访者中51.8%的人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满

表1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具体维度的调查统计

具体维度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频数	占比
工作现状	3	1.0	39	12.8	157	51.5	92	30.2	14	4.6
居住环境	6	1.7	30	8.5	148	41.8	157	44.4	13	3.7
家庭生活	4	1.1	13	3.7	101	28.5	197	55.6	39	11.0
家庭收入	6	1.7	57	16.2	173	49.1	108	30.7	8	2.3
人际关系	2	0.6	12	3.4	128	36.3	183	51.8	28	7.9
业余活动	3	0.9	41	11.7	175	50.0	114	32.6	17	4.9
家人的健康状况	2	0.6	13	3.7	125	35.3	174	49.2	40	11.3
生活的城市	3	0.8	13	3.7	120	34.0	190	53.8	27	7.6
心理状态	2	0.6	22	6.3	109	31.1	175	49.9	43	12.3
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	7	2.0	63	17.9	148	42.2	118	33.6	15	4.3
生活满意度	8	2.4	30	8.9	135	40.2	141	42.0	22	6.5

意”,7.9%的人对自己的 interpersonal 关系感到“非常满意”。60.2%的人认为自己的朋友不少;尽管是在城市,仍有37.7%的人与邻里经常有往来;61.4%的人认为自己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95.2%的人认为自己遇到困难时会得到亲朋好友、邻里的帮助;87.7%的人有心事时会向亲朋好友、邻里诉说。这说明大多数人都能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其生活满意度高的一个原因。

从业余活动看,虽然人们的业余活动日渐丰富,但还没有达到人们的满意状态。调查显示,350位被访者中50.0%的人认为自己的业余活动“一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的业余生活距离其期望值尚有空间。从表2和表3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业余生活满意程度较低。

表2 调查对象对自己空闲时间的回答情况

类别	空间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值	非常充足	39	10.9	11.0	11.0
	比较充足	93	26.0	26.3	37.3
	一般	136	38.0	38.4	75.7
	不太充足	65	18.2	18.4	94.1
	很不充足	21	5.9	5.9	100.0
	共计	354	98.9	100.0	
缺失值		4	1.1		
总数		358	100.0		

表3 调查对象对自己业余活动的回答情况

类别	业余活动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值	丰富多彩	22	6.1	6.3	6.3
	比较丰富	59	16.5	16.8	23.0
	一般	243	67.9	69.0	92.0
	枯燥无味	28	7.8	8.0	100.0
	共计	352	98.3	100.0	
缺失值		6	1.7		
总数		358	100.0		

从家人的健康状况来看,被访者的满意度较高。数据显示,354位被访者中49.2%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感到“满意”;11.3%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满意”;仅有4.3%的人对家人的健康状况感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就生活的城市而言,被访者的满意度非常高。调查显示,353位被访者中61.4%的人对生活的城市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人们可以从城市的绿化、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安全状况等方面得到自己对城市的整体感觉。调查中的大多数人对城市的绿化、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安全状况感到

较为满意,64.9%的被访者认为生活在洛阳很舒心、很幸福。

此外,351位被访者中49.9%的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感到“满意”,12.3%的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感到“非常满意”;37.9%的人对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42.2%的人认为预期目标达成情况“一般”。

总之,在10项具体生活满意度中,满意度最高(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是家庭生活(占66.6%),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占33.0%)。这种结果一方面表明洛阳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人们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生活较为和谐;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深受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之力量的影响——其一是现代性经济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其二是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sup>[6]</sup>此外,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5个具体维度的满意度均超过了50.0%,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其他5个维度没有超过50.0%,但是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的比率(满意度/不满意)都大于1,这就意味着被访者对这5个维度也具有比较高的满意度。

### 三、结论与建议

#### 1. 结论

本研究将城市居民个体作为基本的考察单位,以洛阳市18周岁以上的360位城市常住居民为调研对象,以个体对幸福的主观感知为分析内容,研究了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据分析显示,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主观幸福感较高。

第二,从主观幸福感的10个具体维度——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较高。满意度最高(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是家庭生活(占66.6%),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占33.0%)。

研究还发现,就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而言,当前城市居民不仅关注微观自我利益范畴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如工作单位和自我心理状态等),而且越来越关注宏观社会利益范畴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如

居住环境、生活城市与社会环境等)。这一细小的变化,折射出居民从以往更多关注微观层面问题发展到现在更多关注宏观层面问题,也即居民生活中更为宏观层面的内容正在逐渐深入到居民对生活满意与否的感知中,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主导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sup>[7]</sup>这方面还需要在更多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 2. 建议

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来看,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对策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介入。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类发展困境”。国家整体上发展了、富裕了,但是民众生活并没有获得同比例的发展,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弱势。这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GDP挂帅”理念有很大的关系。某些地方政府为了GDP的高增长和短期的政绩,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环境、生态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增长。因此,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推进的新区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依据城市的起点、现状与环境社会的可承受程度来合理制定其发展的目标与规划。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渐次提升。

第二,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要深入做好就业工作,特别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和部分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这是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根本。二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保障。三要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是新形势下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四要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公共事业。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工作。五要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这是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归根到底应落实到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与发展的历程中长期存在“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指标、轻主观感知”的评价制度。为政者应

时刻谨记客观的“中国经验”只有有效及时地转化为“中国体验”的时候,民众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在推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将一些关键的主观性的指标纳入社会整体发展的评估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

第四,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近年来,洛阳市以“国家卫生城市”建设为契机,不断优化城市环境,包括市内交通、绿化、公共文化设施与场馆等,大大提升了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本次调查中,64.9%的被访者认为生活在洛阳很舒心、很幸福;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大多数人更愿意生活在洛阳。政府应该继续发挥“创建精神”,建设宜居洛阳,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与魅力。

第五,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尽管我们的调查没有直接证实家庭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存在,但是收入水平的改善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已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因此,政府要多措并举,不断优化居民的就业环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居民的绝对收入;二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减少收入差距,注重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三是要深化社会结构调整,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四是要通过多种路径努力建立弱者关爱机制,重点是缩小因客观条件差距而造成人们的心理落差。

## [参 考 文 献]

- [1] 苗元江. 幸福感,社会心理的“晴雨表”[J]. 社会,2002(8):40.
- [2] 林南,卢汉龙. 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1989(4):75.
- [3] 叶南客,唐仲勋. 老年生活初探[J]. 人口研究,1989(6):33.
- [4] 邢占军.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 [5] 方纲,风笑天.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述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8.
- [6] 郑杭生,杨敏.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55.
- [7] 王培刚,衣华亮.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2007(6):1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22-04

# 自然事实、客观事实与科学事实

——当代科学哲学关于三种事实的理性辨析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自然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它对于人及其活动而言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指特定的实践事实、真实的事件,它是指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实践因素而对客观事实作了纯自然主义的理解。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无论自然事实抑或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就形成了经验事实。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可错性,二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理论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事实也不等同于客观事实。从理论上弄清这三种“事实”的联系与区别,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地构建科学理论,反对科学迷信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然事实;客观事实;科学事实

**[中图分类号]**B80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3

自然事实是指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指天然事实,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是指日常事实。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自然事实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它们与实践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凡是与实践内在相关并保持敏感性的事实,就构成实践性的客观事实;凡是与实践外在相关、或根本无缘的,就是日常事实或者天然事实。而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也同样是有所区别的,它们的重大差别在于:究竟其可靠性是取决于它与描述体系的一致性抑或是与实践的一致性。本文拟从概念解析入手,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尊重事实、研究事实,进而以事实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建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我们以事实为基础,与从狭隘经验出发“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经

验主义<sup>[1]</sup>和从本本出发在主观观念中虚构事实的主观主义划清界限,提高认识能力、推进科学发展,也极具理论意义。

## 一、自然事实及其非实践性

自然事实(天然事实或日常事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客观事物和人的生存性状,即客观事物本身或者人的非本真存在,包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和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万象,它是与客观存在或客观实在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对于人及其活动而言,自然事实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当纯然外在的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尚未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时,它还只是自存自在的“物自身”,只有当它与主体发生认识—实践之关系,即发生反映与被反映或者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时,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这

[收稿日期] 2012-08-25

[基金项目] 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KA2012-9)。

[作者简介] 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科技哲学。

种自在之物才转化为“为我之物”,具有认识对象或者实践客体的意义,才成为我们认识—实践的客观事实。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是偶然的和无限多样的,它具有自主性、自在性、自因性。在人类认识—实践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纷然杂陈的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只有一部分能够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认识—实践的客体。随着人类认识—实践能力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越来越多地向认识客体转化。促使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并向认识客体转化的根本力量,是人们客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无疑是任何一个理论得以确立的经验基础,是判断该理论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真理性的生活基础。尊重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的实在性、真实性、唯一性,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出发,进而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是保证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不从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客观事实本身及其真实的相互关系出发而从想当然出发的研究者,以及以主观臆造的联系替代真实的关系的研究者,都很难在科学上有所收获。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人们永远也腾飞不起来;没有事实,人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在枉费苦心。中国古代人们为了长生而进行的炼丹术和巫术活动,西方历史上进行的视灵者的实验和以太实验等,最终都被证明是荒诞的、背离科学本性的,其关键就在于没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 二、客观事实及其实践性

哲学上的事实是指特定的、真实的事件,它是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事件、现象、关系、性质、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客观事实就是认识论上所谈的客体,但并非指所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指可诉诸实践的事物,是一种实践性的事实或者基于实践而确立起来的事实。客观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由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本性所决定的。物质性或先在性只是客观事实的自然前提或本体论基础,而非本质性要素和决定性环节,构成其本质内涵与决定环节的只能是社会实践。因为,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属于人的事实、打上人活动印记的事实,哲学上所说的自然是第二自然、属人的自然。马克思讲,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sup>[2]</sup>。我们总是生活于

人化自然中,没有留下人化印记的天然事实或者自在自然已很难寻觅。自然同社会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物质基础。单纯外在性的自然,对人说来是“无”——它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意义。换言之,客观事实之所以能成为客体,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性和先在性,而是取决于它的对象性或指向性,取决于它能否及如何进入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并被人们的实践所捕捉而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因此,认识—实践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主体及其能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状况,认识—实践客体的界限也取决于主体的探索手段、能力与范围。在此意义上,客体是指在主体之对象性的认识—实践活动中同主体一起构成活动的两极并发生了相互作用之功能关系的外部事物或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实际指向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sup>[3]</sup>质言之,人不可能创造或消灭客观事实,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予以改造。而那些在实践活动中被改造并打上主体烙印的客观事实,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表现形态而已,其客观性并未因此而消解。客体首先属于客观世界,是的确确实客观存在着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客观世界都是当下意义上的现实客体,只有被主体纳入其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那部分,才能从潜在意义上的客体变成现实意义上的客体,从天然之物变成人化之物。

旧唯物主义者仅仅把客观事物当做直观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把直观对象等同于客观事实,没有从主体的能动的本质力量 and 实践活动方面和相对于主体及其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并把握客观事实的客观规定性,因而陷入了唯客体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泥潭。正如马克思所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4]</sup>在旧唯物主义者看来,哲学的对象是感性的人及其自然,自然和人都在直观意义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基础,一切非思维的存在都是人的现成的客观事实;进而,他们从“唯物”的角度出发,认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于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是自在自因的,而思维只是这种存在的主观映像。旧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实就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存在”,即它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就

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非思维的存在。

旧唯物主义事实观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不是从与实践的关系上区别客观事物与客观事实的,而是从与思维的关系上来区分两者的,他把客观世界看做人的感觉、直观反映的对象,没有看到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即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看起来很‘唯物’,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自然界的真正本性。”<sup>[5]</sup>譬如,费尔巴哈,他虽然强调人属于自然,却没有看到人也能动地改变自然,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主体,他对客观世界只是从客体的角度或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和实践方面去理解。换言之,费尔巴哈只是对事实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而没有同时对之作实践的理解,在他对事实的理解中并没有实践的位置,他没有看到实践作为客观事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重要意义,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事实并非从来就有、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世代活动的结果。离开现存世界的物质性实践,就不能真正理解已经在实践的作用下改变了的自然事实,也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历史事实。

### 三、科学事实及其经验性

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既不是指那种普遍存在的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亦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指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并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描述体系对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进行判定所形成的单称命题或者经验事实。可见,科学事实是与个体存在相对应的主观陈述和经验事实,这一特点说明科学事实描述的是个体经验而不是个体所属的类的经验。科学事实强调的就是认识特殊事物的感性活动及其经验内涵,而不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理性活动及其抽象表达。凡是经验事实都应有可复核、可重现的特点,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对同一现象再次经验并且对认识结果的陈述是相同的。那种不可重复、不能复核的事件都不是科学事实,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它们的真实性。凡是经验事实都应该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对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不能进行系统描述和精准测量的事实构不成科学事实。

经验事实的客观性,不是取决于事实本身或者实践需要,而是取决于获取经验事实的手段本身是否科学,取决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实践活动获得的关于经验事实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以什

么样的科学语言来对经验事实进行表达。在科学活动中,人们要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实,就必须使用特殊的话语,这些特殊的话语总是属于特定的理论体系,而人们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的过程,也就是该事实获得理论解释并使之转化为科学事实的过程。仅仅成为客观事实的,并不能被直接视为科学事实,它只有得到一定的理论解释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事实。当然,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人们解释它的方式方法不同,所获得的科学事实也不相同。

## 四、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和联系

### 1. 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差别

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哲学上的客观事实本质上属于实践性事实,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是一个从属于实践意义上的范畴,无所谓对错之分。<sup>[6]</sup>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所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它就转变成科学哲学所说的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它的形成经过了人类大脑的加工,有对错之分。科学事实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它的内容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它的形式却是主观的,因而其认识—实践结果就具有可错性。因此,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误差的。引起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实验方法、思维方式和人文环境的制约。一个科学事实往往是先通过观察,然后通过推断,紧接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验证和应用才被人所承认。这期间当然要受到人文环境以及实验手段的制约,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能说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而且,科学事实由于受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主体极有可能歪曲事实,它作为描述物质现象与过程的经验事实,其真理性有待于科学共同体的进一步审查。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系统鉴定的事实,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也受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即使是公认的科学事实也是相对的、可错的。

科学事实描述的都是个别事件,形成的都是单称判断,极其复杂的综合事件及其全称命题不属于科学事实,而只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科学事实是否具有可重复性,需要科学共同体来确定,“非科学人员的‘重复’,甚至是行政当局、新闻报界的大肆鼓吹,即使一时得逞,最终仍不能确认为科学事实”<sup>[7]</sup>。科学事实需要精准检验,在定性定量上都高度准确,而这非常不易。当代混沌学认为,由于混沌系统初始条件的极度敏感性,初始条件

的细小变化就会带来整个系统未来性状的极大差异,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科学上的真实要靠事实来验证,科学事实是任何理论获得确立的基础,离开足够多的科学事实的支撑,再优美的理论也不能成为科学真理。科学事实既可以出现在科学理论之前,亦可以出现在它之后。在当代,科学假说就常常走在科学事实之前,当它遭受质疑与反驳时,就需借助更多的科学事实来验证,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 2. 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统一

古典经验主义者如弗兰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纯粹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对它的观察不能携带任何主观因素,观察不能受任何理论的污染,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感官反映活动,要像镜子那样直观地映现事实,反对主体的先见(前理解)对事实的构建作用。正如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说:“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坐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指的路走。否则,就将一无所得。”<sup>[8]</sup>现代经验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莫里茨·石里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中性的观察,认为客观事实与语言描述相联系,凡是通过语言规则系统与观察事实发生关联,就可从中获得经验蕴含<sup>[9]</sup>。只有保持科学观察的中性,才能保持科学事实的中性。要防止主体先见的无端介入,就必须使自己的观察要么直面事实本身,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因素;要么依据特定的、大家公认的逻辑规则进行客观性的描述,以确立公认的经验命题。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取决于观察的逻辑蕴含、逻辑规则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无自性观察”(又叫“零度观察”、“零支点观察”),认为观察纯粹是随意的、任性的、毫无目的的。观察就是观察,理论就是理论,二者互不相扰,一切都停留于当下。观察不为任何理论提供经验基础,也不接受任何逻辑规则的检验,更不顾及实践的需要,它仅仅与人的那种无限延异、无穷解构的情绪内在相关。后现代经验主义试图推翻任何带有整体性、主体性踪迹的客观性描述,认为回到事实本身就是仅仅切问碎片与泡沫,事实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都应被纳入解构环节之中。——连一切科学理论都被解构了,哪里还管什么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别和联系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观察与理论是辩证统一的,观察是理论的基础又不断推进并检验着理论,而理论则引导着观察并使之日益延拓和深化。二者之间良性的循环发展,就会使错误的观察得以矫正、使错

误的理论得到淘汰,逐步实现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一致,促进科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当然,二者获得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不可能是主观虚构或者逻辑表征。

## 五、结语

总之,科学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和自然事实,科学理论及其使用都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因为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至上”与“科学万能”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东西不是科学”<sup>[10]</sup>。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反驳、被质疑、被充实和被修正的历史,也是错误的理论与方法不断被发现被纠正的历史。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一个理论的科学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可错性,该理论“不管曾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推翻的”<sup>[11]</sup>。波普尔“唯有可错的才是科学的”的观点可能有点极端,但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不能把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更不能把科学事实认定为客观事实,否则就会把科学绝对化、神圣化,造成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这非但不能推动科学前进反而会束缚它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郁乐.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J]. 伦理学研究, 2010(3):104.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 [5] 肖前,李准春,杨耕.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4.
- [6] 李醒民. 科学事实与实验检验[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11):43.
- [7] 刘大椿. 科学哲学通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7.
- [8] [英]贝弗里奇. 科学研究的艺术[M]. 陈捷,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53.
- [9] 张灏. 意义与事实——对逻辑经验主义意义理论的质疑[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1):10.
- [10] 陶德麟,王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7.
- [11] [英]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M]. 纪树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1.

# 文化的生态转向探讨

熊小青

(赣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规定及教化,它具有保守固化和超越革新的双重特性。文化的生态转向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存方式上融入生态思维和生态理念,并在生存意义上确立生态价值观。文化的生态转向建基于对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的反思,是一种文化自觉,是人为了追求更为完善和全面的发展而产生的人化需求与利益驱动所致。文化生态转向的最终结果是要实现自觉文化的自在化,以自觉文化的反思品格与愿景建构引领文化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化不断融入生态思维和生态内容;在作用路径上,它一方面表现为自觉文化不断地从以往的自在文化中寻求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自觉文化不断地转化为自在文化。文化的生态转向将以和谐、友好、共赢的关系来建构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状况,使个体从一种自我的、利己的、单向的满足,向和谐、完善的多向度发展转型。

**[关键词]**文化;生态转向;生存方式;自觉文化;自在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Q98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4

## 一、文化与文化转向

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规定及其教化。文化,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是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的,是指“以文教化”即“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因此,文化,一方面是基于人的生存而对人作出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人化”,就是人通过对自在自然改造所形成的成果。这种从人之为人之意义上即人的类本质上对“文化”的界定,就在人与物、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的存在。因而,文化的存在领域非常广泛,如认识的(语言、科学、哲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设施的(建筑及其技术等)。人作为现实的生成物,其生存范式总是表现在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现实关系的交互之中。所以,文化就是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渗透在人之生存的一切

领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体及其一切活动。

文化作为对个体的人和社会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它除了以人的一种自发的、甚至未曾意识的生存模式存在外,更多的是以人的自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所建构的生存方式表现出来。生存经验的历史凝集以及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所显现的自然生存条件等,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规定和塑造出生存于这一区域内的人,并由此成为他们自发性、主导型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生存模式中总是力图维持其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当它遭遇到一种更加强势或者说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方式之时,它只能被不断边缘化,乃至最终消失。生存模式一旦形成,它必然稳定地、强势地甚至排异性地发生作用,并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我们经常说的文化具有地域性、风俗性、习惯性就是从生存方式的常态角度来说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具有保守、固化的一面。

但是,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在一个时

期内的存在方式,同样也存在超越、革新的趋势。当这种趋势作用很强大时,就出现了文化转向。当这种主导型的生存方式被另一种生存方式代替,对于一个特定民族来说,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并非仅仅由一种外来文化的强势所致,因为作为文化主体即这一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内在需求始终是文化转向的根源性因素。任何外来文化只能在与现存生存方式的有机结合中,借助于原有的或现存的生存方式来建构和催生出新的生存方式。这时,文化转向就成为了必然趋势,这一民族的社会心理,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就必然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和更换。当这一转向无论在时空(较大的历史跨度,覆盖整个群体的每一个人)、内容(价值理念、文化习惯、思维方式)还是在程度上(根本性的、根源性的、脱胎换骨式的)都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展示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完成了转型,意味着一种区别于原有文化特质的新的文化(尽管这一文化带有原有文化的痕迹)成为了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

文化转向必然涉及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关系问题。所谓自在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而所谓自觉文化则是指集中体现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领域中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sup>[1]</sup>作为人的类本质对象化或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无论是自在文化还是自觉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人在现实的生存活动中不断对象化的结果,都是人化的结果。区别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依据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作用机制。自在文化主要来源于人在长期的生存实际中积淀起来的经验常识、道德戒律、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它是一种常态化、模式化的文化精神或者人类知识,它以群体的认同方式显现其力量所在。因而,文化所具有的自在性表明了文化对于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的生存方式具有强制性和给定性,它对于规范个体、协调社会、延续传统具有重要作用。人的生存首先是一种自在性生存,人总是在现有的常态性、常识性的自在性文化氛围中确立自己的生存图式。然而,自在文化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即人的创造性的、开放的生存方式是不相一致的。人在本质上就是不断超越已有的生存范式并不断追求完善的存在物。因此,自觉文化即人对所遇问题的新的阐释或者生存范式的超越就成为了必然趋势。此时,自觉文化一方面不

断打破自在文化对人的束缚和封闭,引领人不断寻求到更适合人的生存范式,不断超越已有文化模式,推进文化的转向和进步;另一方面,自觉文化作为一定时期内在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和自由向往,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中,它必然以对人的异化的经验凝结而呈现其过程性。因而,自觉文化所蕴含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相对于原有文化即人的已有生存方式而言的,自觉文化的超越和创新也必然表现为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所以,文化转向并不完全是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更是自觉文化所蕴含的反思品格及其未来愿景与建构不断引领自在文化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化不断融入新思维和新内容。

## 二、文化生态转向的根源

文化的生态转向,是说个体的人和社会在生存方式上融入生态思维、生态理念,在生存问题上确立一种生态的价值追求。显性层面上,它表现为人们的绿色环保行为、节俭行为及其主张、循环利用和绿色经济等;隐性层面上,它在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中融入和谐共生的理念,把尊重生命、共存共生、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融入人的终极关怀。这些构成了今天文化转向的内涵和标志。文化转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追问这一文化转向的根源。只有对根源进行反思、对这一转向的合理性进行追问,我们才能确立这种文化转向究竟能在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上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能否如同血脉传承一样,成为人类总体文明的有机成分,成为现实人生存的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表面的方式。

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文化作为人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必然对个体的人和群体的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这个时代中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活动当中内在的、机理性的、深层次的因素。因此,文化转向的实质应该是这一文化特质的部分或全部改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指出:“文化存在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自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其以价值观最为重要。”<sup>[2]</sup>也就是说,思想观念和价值是文化的特质。然而,一种文化的转向往往首先是通过一些外显的方式发生,比如生活理念、生活习惯、生活行为等的改变和转向。显性的方式改变表征着社会及其个体生存方式的改变,这往往是一

种文化变化或转型的前奏,有时也可以是一种文化转型后的稳定方式。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的生态转向,更多的便是这种显性层面的东西。

文化的生态转向最直接的推动力源于对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反思。工业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功利主义主宰下的原子主义、个人主义及主客二分思想。人作为非自足的存在物与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之生存一样,都需要依靠外界物质世界来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但是,人高于其他生命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能够借助于理性和理智把需求分成了实体物质的和虚拟精神的两种。实体物质的需要更多的是实在的、能够满足人之物质生存的需要的物质产品,而虚拟精神的需要则是一种观念化了且作为表象存在的需要感或需要意识而已,是人有生匮乏而意欲得到弥补的心理期望。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相当程度上就在于它极力塑造人的这种匮乏感,从而使人为为了满足这种匮乏感而非生态地向自然界索取。于是,为了这种索取,人们在观念上把自然与人分隔开来并使之独立化、孤立化。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技术的祛魅功效在工业文明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中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技术是一种“促逼”的解蔽<sup>[3]</sup>,它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现代工业文化是在“促逼”意义上摆置了自然。同时,作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存在,在资本的驱动之下,人性的弱点被强烈放大成为现代社会为着解决“产品过剩”和“刺激生产”的砝码。个体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显现在社会之中,个体与个体之外的关系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实现自利即个人意义实现的手段和工具。这一系列观念和外在方式的最终结果是:人把自己与自然对立,人也把人与人对立,人之生存的应该维度——自然与人的和谐、共荣之关系,最终成为了对人之反动。

一种文化的转向不仅是对前一种主导文化的否定和破坏,也不仅是对前一种文化从表现形式到内容,从根源、本质到派生、衍生之物进行批判——尽管这都是必要的——更应该从新文化建构的合理性上予以阐释,也就是说,文化的生态转向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回应了人的生存焦虑、困惑和生存期待。当然,我们今天也在竭力地推进这种文化转向,其缺陷和不足是显然的。从根源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文化自觉,它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仅仅从自然的视角抽象出自然价值论、自然主体

论、共同体论等,其思维方式是通过提高自然地位以证明人与自然的平等,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其二,从人的角度即“人类中心主义”来推论出“自然天然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问题”,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并不需要对自然作出价值上或主体上的更高更多的认同,而在于把人从狂妄与贪婪中解放开来。这在宣传教育层面表现为各种环保知识的普及、环保行动的开展等。这一切是否真正地诠释了文化生态转向的根源并构建出转向的动力呢?我想并没有,其原因在于,它并没有从文化的本质,从文化作为人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这一角度来阐释,一句话,并没有从这一转向的根源性入手。

文化转向根源于人的生存矛盾,也就是人的现实生存境况与生存需求、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存在与自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人的生存方式固然有着稳定的给定性、循序性从而呈现出保守的一面,进而构成了人的生存经验和人类文化的传统与积淀;但是人天然的主体性(具有理性和智慧)注定了人的生存是开放性的,注定了人的需求不可能停留于本能层面,因而人类必然依赖于意识和自主活动而超越本能的自在性和给定性的存在方式,选择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因此,人在不同时期的持续生存和追求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与更为完善和全面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文化即人化的内涵和真正根源。

据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环境问题之所以构成问题,其实质就在于对人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威胁。地球作为迄今为止人类能够生存的唯一家园,已经难以承受来自于人本身日益庞大的需求以及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大气和水体污染严重、森林植被锐减、土地荒漠化加快、生态失衡加剧、臭氧层破坏、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等,都直接呈现在现代人面前,其直接后果是人面临着能否持续存在下去的生存危机。因此,人作为“种”的存续发展是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追求更好的生存应该是人的最高利益。当然,这显然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共同利益而非仅仅是个体的或某一群体的利益。为着这一利益,人的生存方式包括其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正是人的不当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而引发了环境问题。我们的生存方式即“文化”必须从与自然对立、仅仅把自然理解为“人的对象化”客体和“对象性存在”转变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即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在性和给定性回归)的统一上。这就从人作为“种”的持续存在的视角自觉地建构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规范。当然,这从根本上体现为此部分人与彼部分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之生存的规范,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维持一种稳定的、使彼此存在物之间处于相应生态位的状态。对这种生存取向的践行,就成为了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单向度的人向生态生存维度的人的转向。

利益,作为人存续和生存需求的满足,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既有人作为存在而在文化上所体现出的自在性一面,又有人作为社会性存在而在文化上呈现超越性的一面,从而构成了现代人生存方式即文化转向的现实动力。有人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这仅仅是作为“活着”的价值设定,“因为从人的生存利益出发确定人的应当行为,就混淆了人与动物的根本界限,把人的道德存在和道德生活贬低为一种动物式的存在和一种动物式的生活”,而且“任何动物都有自己的利益,任何动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当行动。只不过这种利益以动物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sup>[4]</sup>。我们说,动物生存和人的生存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具体形式上都完全不同。动物之“利益”(姑且称为“利益”)是动物在长期的自然进化当中与它的对象构成的固定的、本能的、封闭的关系。尽管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动物通过进化也能打破这一关系,但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因此,这一关系仅仅是程序化了的生态关系,是自然界给定的产物。但是,人与其对象的关系是人以开放的、自主的、创造性的方式来改造对象,从而使之不断发生改变而更好地适合人的需要的关系,人不断地把自己的需要、愿望、计划、目的等主体规定性(即人在长期生存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生存期待)客体化到对象当中。所以说,人的利益满足既是人生存需求的满足,也是人所建构起来的人化需求即人通过本质力量的确证而得到的精神与心理需求的满足。因此人的需求满足是以人化而非本能的、生态给定的方式进行的,它以劳动对象化(为本质对象化)方式来诠释和界定利益。由此看来,“利益”并不是生态概念而是人化概念,它彰显了人以人的生存方式与其对象构成的现实关系,人并没有局限于人所依存的所有对象对人的规定性,而是按照人的需要对之进行改造即人化。对象的人化更多的是以人的现实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利益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性所形成的。当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关系所构成的人化状态不利于人的生存时,也就是人的需要、愿望、计划、目的等主体性规定客体化到对象之中并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时,就会出现对人的否定,不仅人的利益无法得以实现,而且人也无法以人的方式生存下去。这就昭示着文化转向的必然性。比如现代工业文化就是通过“资本”和“市场经济”破坏了农民的土地依赖和血缘依赖,从而打破了通过“土地”来实现“利益”的传统农业文化,并使之向工业文化转向。而当工业化的“利益”驱动造成人的异化,不利于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时,由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向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 三、文化生态转向的路径

当自然和环境无法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化需求而变成对人的反动时,人在现代工业文化中所形成的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便无法维持和规范人的生存。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消费主义背景下所形成的经验常识、行为规范、道德戒律,以及一些常识化、自在化、模式化的文化精神成了人生存的桎梏甚至灾难;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存在物,在工业文化的强制下所展示出来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结果,如科学、艺术、哲学、文化等,并没有真正使人得到更好的发展,相反却把人推向危机之中。因此,用一种生态思维和生态内涵去推动文化的创新和转向,就成为了现时代的庄严使命或文化发展的重大机遇。

文化的生态转向作为人类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背景下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救,作为人生存的一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必然以两条现实的途径发生作用:

(1)自觉文化不断地从已往的自在文化中寻求生态资源,使其表现出更多的自在性从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自觉文化通过人的文化反思和觉醒来实现。文化觉醒总是以思想解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思想解放总是根源于以往的传统,文化传统中已经具有的理性、创新、反思等超越性文化因素再次凸现出来,并且不断成长。自在文化总是历史的,它随着时代赋予的内涵而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涵,不可避免地对原有某些文化因素予以遮蔽和遗忘,比如中国文化对墨家兵家的遮蔽,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遗忘。遮蔽和遗忘只能代表这种文化因素与那个特定时代的主流不相一致,并不表明它在整个历史当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我们对这些被遮蔽的自在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并将其作为自觉文化的内涵

时,自觉文化所产生的超越以及与现时代自在文化的冲突,会以和平的、整合的方式进行,从而使文化转向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向前推进。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是古希腊文化的复活,古希腊文化在经历1 000多年尘封之后重新获得了与现实对接的契机而展示其活力。当我们在推进文化的生态转向中,许多学者在挖掘文化传统,从民俗民风、宗教禁忌到礼仪礼节、行为方式,说明我们早期的文化中已经具有(广义上的)生态思想或生态智慧,我们传统的生存方式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智慧品质。这些因素只不过在工业文化当中被遮蔽了。在文化的生态转向当中,这种挖掘和整理是一种内在的创造和创新。古希腊时代的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奠定了西方的文化传统,成为其个人生存方式的自在性内容。然而,在中世纪宗教盛行之时,经验性文化和宗法关系抑制了其理性的、自然主义的文化,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通过了宗教改革和对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挖掘和弘扬,实现了文化转型,恢复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今天,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生态传统,文化的生态转向也已有了坚实的基础。

(2)自觉文化不断地转化为自在文化,从而使生态文化真正成为人的生存方式。在现实的文化生态转向中,人们往往以一种简单的、机械的方式,甚至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意欲通过一种全盘否定现有文化的方式,或通过一两次宣传鼓动的方法来实现生态转向。作为一种包含自在和自觉内涵的人化样式,这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态转向的路径选择只能建立在文化自身的内在矛盾和人生存的自在与自由矛盾的调适基础上。说到底,文化既是历史积淀下人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又是人不断超越已有生存状况、打破各种限制、实现更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文化的自在性代表人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文化的自觉性代表人的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它们都是作为人应然的选择并处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之中。所以,文化的生态转向,必然就有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成果,即人在长期与自然交往当中所积淀下来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存经验的挖掘,也有对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成果,即人的工业文化的理性反思及未来生存方式建构的弘扬。因此,文化的生态转向最终是需要实现自觉文化的自在化,即作为人们的习惯、常识或惯常的思维方式而存在——它意味着转向的真正实现。

以哲学、科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觉文

化,往往很难独立发生作用。人的现实生活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习俗、经验,并在一种常识化、常态化、模式化的文化氛围中进行。人的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不是借助于自觉文化所显现的理性或通过某种突破或创造来实现,而是依据现成的经验、常识、习惯、传统等把问题纳入到已成为稳定的范式或图式中并将其解决。因此,自觉的文化普及、教育就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环节。生态知识、生态思维、生态思想、生态哲学,在今天的学术层面尽管还有许多争论,但是它们都是作为人的觉醒和自救、作为人生存方式转向的理性愿景和理性选择而成为观念的东西,依然是远离大众常识的存在,现实层面上也存在环境意识不强、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原因就在于,自觉的文化没有转化为自在的文化。事实上,195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生态思想,如美国的亨利·梭罗、约翰·缪尔、吉福特·阿尔贝特·史怀泽等,但民众反响不大,直到作家卡逊的小说《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后,民众的环境意识和热情才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自觉文化的自在化。卡逊以通俗的现象描述,把人内心所蕴涵的生存本能和危机意识揭示出来,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生产场景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了,明确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所出现的问题及其危害,从而在民众心里产生极大震撼。

自觉的文化及其精神的自在化是自在文化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生态知识、生态思维的自在化,是实现文化生态转向的关键,这既是一种外在批判性的重建和自在文化的断裂与改造,更是自在文化的一种提升和对人摆脱生存困境的一种积极回应。当然,自觉文化作为某一时期的生存的一种期望而具有局限性,但这恰好反映了文化转向的艰巨性和永恒性。

文化生态转向的实质与核心是确立一种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虽然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在传统文化当中也存在,但那仅仅是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感性认识 and 实践经验,甚至是对自然的一种摹仿与情感。今天的生态智慧、生态价值观显然是在对工业文明所蕴涵的主客二分、对立所造成的人类灾难的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的、现代的价值设定和思维方式,生态思维、生态价值观的现实化是一种生态智慧的传播、启示和物化,也是转化为自在性文化和现实力量的过程,这是文化生态转向的标志。在此,文化生态转向既需要对接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又应批判性重建,

即采取移入、强制的方式,把西方生态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过来。这样,文化的生态转向才真正有可能。

#### 四、文化生态转向的意义

文化,从显性层面或形式上说有着经常变化的特性,从隐性层面即理念、价值和思维层面说则具有相对稳定和作用时间长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的核心即隐性内容是某个时期人类历史和人类历史发展状态的标志和尺度,它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是文化的转型。“天人合一”、“自然主义”等价值观被“天人相分”、“主客之分”、“人类中心”等价值观所取代,标志着农业文明的消失和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作为社会转型的量的积累或前奏与外在形式,文化的转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然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积蓄力量,随着文化中的某些点和局部发生变革,进而在整体上对原有文化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予以颠覆,最终实现文化转型。

文化的生态转向意味着人们对生态观念的认同和确立,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等,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这一转向将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无论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还是对个体人的存在,作为一种价值设置和追求,生态存在均是以一种和谐的、友好的、共赢的关系来建构人的生存方式,从而改变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对立的状况,比如改变社会发展的单一经济

维度,转变价值的单一物质取向等。同样,文化的生态转向也将对个体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产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智力开发、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将从一种自我的、利己的、单向的满足向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多向度转变,从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从异化消费转向本性消费等。

文化的生态转向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生态的生存范式作为一种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文化生态转向的必然的、坚定的理念。通过这一转向并由此推进文化的转型,才能真正建构起生态文明。

#### [参 考 文 献]

- [1] 衣俊卿.论文化转型的机制和途径[J].云南社会科学,2002(5):53.
- [2] [英]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宗教与意识形态[M].龚方震,陈耀廷,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25-126.
- [3] 刘海明.两种解蔽方式:产出和促逼——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3.
- [4] 曹孟勤.人未到场的生态伦理研究[J].伦理学研究,2004(5):7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32-04

# 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点

## ——论《巴黎手稿》历史定位问题

彭宏伟

(北京工业大学 实验学院, 北京 101101)

**[摘要]**在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历史定位的不同观点中,“起点论”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手稿》而得出的结论。从《手稿》之文本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思想来看,马克思在《手稿》中以“现实的人”超越抽象的人性论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并确立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科学劳动观,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进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又阐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回答了诸多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以社会劳动的方式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实现人的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是辩证统一的。《手稿》以崭新的方式建构起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前提,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通向唯物史观的思想起点,虽然部分思想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但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了较高级别的同质性,显示出它是成熟时期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观点的萌芽。

**[关键词]**巴黎手稿;起点论;科学劳动观;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5

马克思《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联学术界把《手稿》定位于不成熟著作而将之打入冷宫,严重地妨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赫伯特·马尔库塞为解释马克思的《手稿》而创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书,其中心思想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定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著作发表后不久,西方就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标志的“《手稿》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才真正开始独立研究《手稿》,至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逐步形成了

“不成熟论”、“顶点论”、“起点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不成熟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顶点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不成熟论”主要接受了苏联的观点,持“顶点论”者主要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看到《手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而把这种差异无限放大,以致造成马克思思想在不同阶段上的对立。“起点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观点,应当起始于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的《手稿》单行本的中文注释。该注释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献。”<sup>[1](P190)</sup>这个论断表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当然,并不能从“第一次”就能简单地推论出

[收稿日期] 2012-06-23

[作者简介] 彭宏伟(1967—),男,辽宁省大连市人,北京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起点论”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把握这个文献中的核心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才能说明这个“第一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这一手稿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包含着‘自然存在前提论——对象化活动论——异化劳动论——人化自然论’等哲学内涵,乃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起点,既是历史起点,又是理论起点。”<sup>[2]</sup>“起点论”是中国学者摆脱苏联及西方马克思学的双重影响、独立研究《手稿》而得出的自己的结论,在国际马克思学界真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起点论”应当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文本的历史定位主要依据于文本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思想,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登上哲学舞台的亮相之作,虽然它体现了马克思的天才,但没有超出黑格尔体系,其基本思想显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从哲学的角度说,马克思已经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但还没有明确形成自己的哲学观,而且又明显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彻底打破并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初步确立了整个马克思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科学的劳动观,而劳动观恰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精髓。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手稿》中基础性论断及其对诸多根本性哲学问题的回答的分析,来探讨其定位问题,指出它是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点。

## 一、《手稿》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与以往任何哲学都不同,它完全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确立了“现实的人”为哲学前提,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崭新的基础。

### 1. 科学的思想方法

“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sup>[1](P51)</sup>西方许多思想大家,比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曾利用“虚构的原始状态”进行哲学推论。这种方法此后又直接被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广泛运用,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路径范畴。而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明确反对“虚构的原始状态”,实质是反对整个抽象人性论路径,意

味着马克思开辟哲学新道路的意向和决心,显示出颠覆西方传统学术路径的巨大勇气。

可以说,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自己与西方传统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别,于是在摆脱抽象人性论影响的同时,开始向“现实的人”的转向,为正确解决哲学前提问题确立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sup>[3](P66-67)</sup>马克思哲学的前提——“现实的人”已经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形态,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不是经济学、伦理学或其他什么学科虚构的人,而是一种合理的、具有永恒的现实性的科学抽象和哲学抽象,与以往离开人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抽象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 2. 科学的劳动观

从《手稿》思想的基本内容看,马克思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工资、利润、地租、私有财产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经过思维抽象得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是普遍现象这个基本结论,进而深刻分析异化劳动,并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道性质。但是,异化劳动仅仅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暂时现象,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永恒现象,异化劳动不能成为理解人的本质的基础,也就不能成为最根本的哲学基础。进而,马克思继续深化在《手稿》中刚刚确立的异化劳动观,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得出劳动才是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

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最直接、最核心的表述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sup>[1](P57)</sup>关于这个命题,学术界多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命题。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只是借助费尔巴哈的概念来表述而已。“生命活动的性质”即生存方式。比如鱼儿只能生活在水里,鸟儿只能在天空中飞翔,这是不同物种的生存方式的差异而已。特定的物种与特定的生存方式是同一的,这完全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在今天来看这就是科学常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sup>[1](P57)</sup>。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有意识地改进生存方式,动物则天然地接受本能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人们往往把“自由的”理解为在某种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其实,这里的“自由”具有特定的含义。因为,自由是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自由,并不涉及工人与劳动、工资与资本等方面的问题,“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sup>[1](P58)</sup>。这是一种合理的哲学抽象,依然以科学为依据,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规定已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sup>[1](P57)</sup>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批评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没有逃出抽象人性论的藩篱。在表面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词语似乎一致,但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的“老瓶”装自己的“新酒”,实质上已经与费尔巴哈的脱离现实的“类本质”分道扬镳了。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是在《手稿》中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进一步把《手稿》中的这一重要思想以更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动物与人相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的,是对事实的哲学抽象,依据的是科学事实,而不是凭借“天才的虚构”。这个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明确的表述:“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sup>[3](P67)</sup>

## 二、《手稿》正确地回答了诸多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升华到科学的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当时,马克思是否已经明确认识到劳动在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实际的思想进程告诉我们,其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具体(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到抽象(确立异化劳动思想),由抽象(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到分析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质)的曲折过程,才逐步发现被历代思想家忽视、甚至蔑视的“劳动才是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的基础”最基本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只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初步抽象,“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sup>[1](P59)</sup>。作为经济事实

的异化劳动不是哲学起点,但经过哲学抽象,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发现劳动才是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是变化的。这个“劳动”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已转换为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了。“劳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分野,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人作为“感性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依据科学的劳动观,马克思系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新天地。

###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知、情、意及其活动过程的形成,是通过“对对象的占有”实现的,感觉承担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sup>[1](P86)</sup>马克思肯定了感觉的作用,批评理性主义者把感觉排除在“人的本质”之外的观点,同时也明确指出感觉自身的局限性,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sup>[1](P87)</sup>。人的精神活动、实践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用恩格斯的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4]</sup>。

劳动是人依赖于自然界、实现人的生命活动的唯一的手段,人通过劳动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并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志的类存在物”<sup>[1](P57)</sup>。人能能动地适应和创造自然界(人化自然),通过劳动,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 2.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依赖于其意志的客观关系。生产劳动不仅生产出“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sup>[1](P60-61)</sup>。社会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劳动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其次,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sup>[1](P170-171)</sup>人在劳动中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个人的本质就是个人的“社会联系”。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之表述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3](P56)</sup>再次,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sup>[1](P83-84)</sup>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二者辩证统一。

### 3. 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个关系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sup>[1](P82-83)</sup>。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产品、劳动主体等共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社会性质取决于“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具体的“社会的性质”在“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同时,自然界中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中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自然界与人的联系是以社会之方式为中介的,自然界中包含着社会的本质,这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sup>[1](P83)</sup>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以劳动的方式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实现人的存在,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 4.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马克思明确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1](P82)</sup>从思想连续性上说,这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深化,沿着这个命题的思路,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3](P72, P73)</sup>可见,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最初表达。

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sup>[1](P88)</sup>。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通过实践解决理论的对立,评判是非,同时还批判旧哲学的功能仅仅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3](P57)</sup>。

### 5. 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

通过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1](P92)</sup>。“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sup>[1](P107)</sup>当历史被认识到是历史的时候,人已经摆脱原有的(非人)状态而成为了人。所以,“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sup>[1](P92)</sup>,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即当人在劳动中通过感觉而形成感性意识,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与自然相分离,同时又在劳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的时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起点的探析不是从人的理性、人的感性欲望或生物学的立场,而是从劳动的角度来说明的——当劳动成为人的生存的唯一手段的时候,标志着人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始。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持了这一观点:以往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sup>[3](P93)</sup>。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的观点,确立了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辩证统一的关系,避免了自然与人的对立——而这正是唯心史观的思想本质。

## 三、结论

体现在《手稿》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崭新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的逻辑前提,避免“虚构的原始状态”,代之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二是初步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彻底批判抽象人性论,确立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并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基本保持一致,并且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构架;三是科学地阐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伟大思想。这些基本观点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深化和完善。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上说,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劳动观的合乎逻辑的飞跃,飞跃的起点恰恰在《手稿》中。

不可否认,《手稿》中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

(下转第68页)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36-04

# 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首次尝试

——论《巴黎手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

李彬彬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巴黎手稿》是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尝试,具有逻辑整体性和思维跳跃性的二重性特征。从分析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工资、资本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入手,马克思揭示了地产分割的私有财产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以工资、地租、利润为立足点,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四重异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在普遍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展开的;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提出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人性在更高基础上的复归。《巴黎手稿》的理论成果或明或暗地反映在马克思以后的思想中,对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但这一成果在理论层次上缺乏统一性,对劳动异化分析的实证材料不充分,也没有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与时机。

**[关键词]** 巴黎手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6

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学术思考的一条主线。《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是他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尝试。《手稿》开启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解剖市民社会的思想历程,通过分析私有财产运动,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以工资、地租、利润为立足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人的异化,并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人性在更高基础上的复归。在这一思想历程中,逻辑整体性与思维跳跃性并存,真切地反映了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期的艰难探索。从分析《手稿》的思想起源和文本结构入手来探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历程及其得失,对于我们把握《手稿》内容的复杂性和逻辑的统一性有重要意义。

## 一、《手稿》的思想起源和文本结构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要是从“体系的二重化”、“逻辑神秘主义”、“作为主

体的观念”三个方面对黑格尔以思辨的逻辑替代事物本身的逻辑的方法进行批判的。然而,这种颠倒主词与宾词关系的批判在根本上并未超越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视野。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同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近代历史的进程相契合的。黑格尔是当时唯一严肃认真地分析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德国思想家,是当时唯一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sup>[1]</sup>当时尚缺少经济学视野的马克思也就只能基于莱茵报和他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社会经历与历史学知识,对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进行方法论上的清算。这次向着黑格尔法哲学的倒戈将马克思引领到了市民社会这一现实的基地上,并且,经过《德法年鉴》的中介,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打破旧世界实现人类解放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尽管马克思已经指出:“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sup>[2](P203)</sup>

[收稿日期] 2012-06-23

[作者简介] 李彬彬(1983—),男,河南省信阳市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学研究。

但这并未解决马克思面前的问题,即如何构建一种“彻底的”、“抓住事物(无产阶级)的根本”的理论,真正把“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要让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历史使命,有赖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在巴黎的那段时间,通过对诸多经济学家著作的研究,马克思最终确立起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方法论信念,《手稿》就是在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指引下完成的。

大概写于1844年4—8月的《手稿》不是一部孤立的著作,它不仅处于马克思同一时期写作的《巴黎笔记》文本群中,而且可能还构成了《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这种复杂的历史和文献学背景给我们把握《手稿》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在对《手稿》思想逻辑的整体把握上,国内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手稿》是一个统一的逻辑整体,即马克思从经济学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扬弃私有财产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出路;另一种则认为它是一个个断片连缀起来的思想纪实,其中的跳跃性、断片性真切地反映了马克思清算旧哲学信仰、创立新理论的艰难历程。我们不妨把这两种声音看做《手稿》的两个面相。联系《巴黎笔记》的相关内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手稿》的这种二重性。

《巴黎笔记》真切地反映了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期的艰难探索。按照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描述,“马克思在介入经济学之初,除了看热闹外几乎无话可说。这是一个专业哲学家进入新领域之后的失语状态”<sup>[3]</sup>。或许正是这种“失语”,造成了后来《巴黎笔记》发表之初所遭受的冷遇。自1932年发表以来,相对于发表在“著作手稿”部分并引起广泛而热烈讨论的《手稿》,发表在“笔记摘录”部分的《巴黎笔记》则少有人问津。这种状况直到1960年代才随着大家对《手稿》认识的变化而有了改观。此时,相对于发表初期以“内容的完整”辩护“形式的断片”这一倾向,各国学者开始强调《手稿》的“未完成性”、“非同质性”。在这一背景下,《巴黎笔记》和《手稿》各册笔记本的写作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等问题也突显出来。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献学成果。<sup>[4-5]</sup>结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更愿意把《手稿》看做一个不断“试错”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过程的目标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巴黎笔记》写作

之初的“失语”式的“摘录”,是马克思寻求切入点的过程,《手稿》是马克思从市民社会中的“人”出发来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首次尝试,后期的《穆勒笔记》是马克思从生产过程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以此方式来审视《手稿》,更有利于我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把握《手稿》内容的复杂性和逻辑的统一性。

## 二、私有财产运动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工资、资本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从纷繁芜杂的经济事实中挑选出这三者,其实关联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中的研究成果,即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和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心脏”。这种理论水准和阶级立场促使马克思去解剖市民社会、关注工人的现实处境。在写作“第一笔记本”之前,马克思已经通过萨伊理解了斯密的理论,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工资、资本利息和地租研究的起点。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领取工资的工人、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坐收渔利的地产所有者,他们构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主要人群,工资、利润和地租分别构成他们的收入。在对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中,马克思认识到了异化的社会现实,看到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却被不平等地分配给了社会上不同的人群。马克思对这一事实的揭露,成了他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切入点。

联系“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的补充,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形成时,其实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他指出:“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sup>[2](P68)</sup>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私有财产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所有者通过掠夺、开发来占有土地,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资本家战胜了土地所有者。这是“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之间围绕地租和利息的斗争带来地产的不断分割,而地产分割——作为私有财产运动的一种形式——带来大地产不断集中,不仅导致小地产所有者破产,而且造成

一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一部分大地产所有者成为工业资本家。最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差别消失了,社会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资本对地产的胜利充分彰显了工业的奇迹。但伴随着市民社会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这一事实出现的还有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就是这种对立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实面前,工人的劳动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他得到的只是养活自己和繁衍下一代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而且,在竞争中“已经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信任人”<sup>[2](P49)</sup>。马克思在看到资本主义工业相对于封建农业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向它下达了死亡通知书。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全面异化

回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我们会发现,在工人阶级“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sup>[2](P227)</sup>的现实面前,工业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关于自由、文明、道德、博爱的标榜,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虚构。这种现实也促使马克思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出发,把工资、利润和地租作为合理的分配制度确立下来,既没有考察私有财产的原因和本质,也没有看到私有财产的历史性。马克思不仅追问私有财产运动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工人与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入手,考察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sup>[2](P51)</sup>马克思由此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不仅不为工人所支配,反而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与生产者相对立。这也是马克思所规定的异化劳动的第一重含义,即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既然工人为了生存已经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了资本家,那么,他在劳动过程中就要受他人支配和控制。工人与劳动活动的异化构成了异化劳动的第二重含义。当工人的生命活动不再受自己支配,而是仅仅成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劳动这种生活方式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时,人的类本质也就与人

异化了。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人与人相异化。这就是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一般地,我们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就到此为止,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文本的全部。马克思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因为,通过异化劳动,“工人还生产出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sup>[2](P64)</sup>。马克思分别从资本家同工人、劳动以及劳动对象的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的异化。他指出:“首先……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sup>[2](P64)</sup>

尽管在马克思准备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的地方文本中断了,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不只是工人,还有资本家。观照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异化状态的批判,我们看到的是黑格尔承认理论的话语。工人在劳动中的生产活动为非工人提供了外在于这种活动的可能性,可是,这并没有使得处于享受地位的非工人摆脱异化。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特性,意识只有在达到普遍的互相承认时,才能获得对自身的确证。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对待工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产品,把工人置于自己与劳动对象之间,通过工人的劳动获取财富,而现实地从事劳动的工人却不能支配自己的产品,这种现实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生产摆脱“主人—奴隶”式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在普遍的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个社会中,作为资本家或者作为工人的人当然也不能为人赢得尊严,人是扭曲的人。

### 四、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景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异化的现实境遇。而这种境遇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扬弃这种异化的积极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首先批判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的几种不成

熟的形式。最初,共产主义体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力图把私有财产普遍化,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马克思认为这种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只是“贪财欲的泛滥”而已。从总体上看,“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sup>[6](P79)</sup>,它并没有真正扬弃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政治的共产主义。对政治的共产主义而言,政治生活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使政治权利摆脱私有财产的限制,一个人享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利与他的财产是没有关系的。然而,政治国家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并没有让人的生活摆脱私有财产的限制,实现了政治解放的人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这两种共产主义之所以没有摆脱私有财产的限制,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就是说,它们没有理解私有财产在本质上不过是客体化的劳动,是劳动对象化的积极成果。事实上,私有财产的运动为正在生成的社会提供了所需的全部材料,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sup>[6](P81)</sup>。只有在私有财产运动创造的丰富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

马克思这一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私有财产是迄今为止的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展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是生产的特殊方式。因此,扬弃异化的现实运动就包含着两方面的任务:扬弃“宗教的异化”和扬弃“经济的异化”。前者的目标在于从人民意识中排除掉“创造论”的观念,树立起“人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信念;后者则追求现实生活的回归,使私有财产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积极确证。只有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人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为某种现实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制度设计,而是“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这种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开创的新阶段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具有更高现实性的发展阶段。

## 五、《手稿》的得失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运动的分析,从无产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历史命运这个角度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矛盾的起源。通过对

他们收入形式的分析,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提出了扬弃私有财产、使人性在更高的基础上得到充实与提高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认识到这种运动的依靠力量在于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性的行动。《手稿》作为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努力,其理论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些理论成果或明或暗地反映在马克思以后的思想中,对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这次解剖资本主义努力中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尽管马克思已经抽象出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概念,然而,马克思还是以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形式为立脚点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难免造成理论层次上的混杂,以致缺乏统一性。其次,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分析缺少充分的实证材料,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异化劳动的后三重规定中。如果说,“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是基于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人与劳动相异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都是通过逻辑推理而从“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得出的,这种逻辑推理中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剩余价值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在理论深刻性上有相当大的差距。再次,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要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私有财产,从而实现人性的复归。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时机进行,这些问题却是《手稿》尚未回答的,这不能不说是《手稿》的一大缺憾。这些问题是马克思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马克思在其后期的理论探索中,不仅思考了这些问题,而是一一解决了这些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M].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0.
- [4] 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114.
- [5] 鲁克俭.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57.
-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3版.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40-05

# 马克思关于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阐释

——解读《巴黎手稿》的一个新视角

张聪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视角来考察激情,认为人是一个有激情的感性对象性存在物,激情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首先,人的存在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方式,人首先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其次,人的劳动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本质,正是在劳动中并且通过劳动,这种对象性活动得以感性的形式爆发而成为人的本质活动;再次,私有财产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中介,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最早形式,普遍的私有财产是对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否定和扬弃,真正的私有财产是对普遍的私有财产的否定和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至此,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总体上、在人性中存在。因此,感性对象性、劳动、私有财产才成为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含义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激情;真正本体论肯定;感性对象性;劳动;私有财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7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奠基之作,那么《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种子”之作。自1932年《手稿》出版以来,马克思的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没有像《手稿》这样引起思想界和学术界广泛、热烈而持久的争论。按照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态一旦被认可了其独特性和命名,就已经偏离了其原旨,也就注定要走向消亡”<sup>[1](P4)</sup>,那么《手稿》一经定位,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就会丧失,其生命力也将随之终结;而事实并非如此,对《手稿》的持久争论显示出这部著作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本文试图从马克思关于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的新视角解读这一经典文本,以期开显新唯物主义视野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本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独特看法。

## 一、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解读《手稿》之新视角

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说:“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sup>[2](P3)</sup>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本人把《手稿》的目的描述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一种‘实证的’批判。”<sup>[3](P95)</sup>实质上,就《手稿》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仅是对政治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或国家学)的批判,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马克思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sup>[2](P3)</sup>这就是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结论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和《德法年鉴》时期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尽

[收稿日期] 2012-06-23

[作者简介] 张聪卿(1983—),男,河南省鲁山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

管如此,马克思实现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之目标的标志却是在1857年10月到1858年3月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和之后《资本论》这一巨著的问世。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和批判也是《手稿》的重要内容。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研究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和“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的<sup>[2](P50)</sup>,但马克思决没有停留在对这个事实的描述和批判上,他“所阐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sup>[3](P98)</sup>,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的问题。虽然“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sup>[2](P50)</sup>,但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完全变了:它成了一种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的科学。这种革命本身与经济上的激变无关,它意味着人的全部历史的革命,人这一存在物的定义的革命”<sup>[3](P95)</sup>。这是马尔库塞对《手稿》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例如,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就围绕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借用国民经学的概念术语展开论述,最后归结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首先,工资使资本家获得利润和积累财富,但使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激起资本家那样的发财欲望,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愿望”<sup>[2](P10-11)</sup>。其次,资本成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sup>[2](P21)</sup>,资本的本性使资本之间(也即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残酷的竞争,资本竞争和道德沦丧达到丧失人性的地步,资本使资本家也异化了。再次,地租是资本利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来源于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者的权力来源于掠夺”<sup>[2](P35)</sup>。地租不是缓和了竞争,而是加剧了竞争;不是减少了剥削,而是加重了剥削;不是减弱了异化,而是加深了异化。

马克思围绕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死的财富的积累与活的人性的泯灭之间的深刻矛盾来阐述自己的结论。这种阐述是在两个焦点上展开的:一是人的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即人是类存在物——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是感性存在物——人是激情的存在物。二是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即私有财产的形式——个人的私有财产、普遍的私有财产和真正的私有财产——及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

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对死的财富的积累与活的人性的泯灭之间的矛盾解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异化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所以,马克思才在《手稿》的序言中声明:“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sup>[2](P3-4)</sup>

马克思哲学的立足点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完整的人。马克思承认并继承了人本主义对人的理解,但他没停留在那种人本学规定上,而是从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理解人本身。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论称的那样,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人的劳动就是人的本质,但首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异化劳动既是劳动的普遍现实状态,又是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与矛盾就是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区别与矛盾。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也即人向真正的人的复归,就是在劳动的异化过程中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人是一种有激情的感性存在物,激情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感性爆发,因而,激情是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正是从感性对象性、劳动和私有财产等方面来阐释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的。所以,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是解读《手稿》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域。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上考察激情,深刻地阐释了激情在人的确证、实现和超越中,在人的存在与本质上以及在人的历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马克思关于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在《手稿》中具有结论性或提纲挈领性作用。

## 二、人的存在: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方式

“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那么不言而喻:(1)对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特殊性……(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式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也就是对对象的肯定。”<sup>[2](P140)</sup>由此,人的存在的生命形式就是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方式。人首先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即激情的存在物,这是三种“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方式。

人首先是一种类存在物。“一种存在物的类是指这种存在物根据他的‘血缘’和‘起源’而得以存

在的那个东西。它是指这种存在物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中为全体所共有的‘原则’，即这种存在物的一般的本质。”<sup>[3](P106)</sup> 第一，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一种“全面的”存在物。人与其他存在物相比，人可以把一切存在物的类(包括人自身的类)作为自己的对象，即人能够占有一切存在物的类本质，并认识和利用这种占有来为自己的类本质的丰富和发展服务。第二，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物。在理论上，一切存在物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又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在实践中，其他存在物“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第三，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的类本质仅仅表现为自身的生命活动，它是什么，它就是怎么样生活的。而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或者说，人对生命活动(既包括自己的又包括其他存在物的)是有意识的。人是什么不仅与他怎么样生活有关，而且还与自己和其他人怎样看待这种生活有关。人是唯一能意识到生命活动的存在物，由于这一点，人才是“自由的”类存在物。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首先，人的生命需要维持。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人的肉体也是由一系列元素、蛋白质和器官构成，人的感官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人也需要吃、喝、住、用、行，人也需要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其次，人的血缘种族需要延续。生老病死、传宗接代、养儿育女，不仅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义务。血缘种族的延续自然而又必然地靠夫妻、家庭、种族的关系来实现。总之，人生命的维持和种族的延续就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但是，人的历史不仅是像其他存在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一样的过程，而且还是人的现实和经验存在的产生活动，同时又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运动。人是作为自然生物而产生的，人有许多本能、倾向和生命力，人的肉体 and 自然本能(饥饿、性等)都是被动地受到限制的，这就产生了人的需要、欲望。但是，人决不仅仅停留于这个“产生”。“人在长时期的斗争中为自己的存在承担了日益增多的责任。他的活动变为力量和意志，他获得了——痛苦地获得了意识。”<sup>[2](P164)</sup> 人有理性和激情，追求自由和博爱。

人的自然本质不仅包括由饥饿、生殖缘起的欲望，还有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独有的意志、爱和激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是理性、意志、心。……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

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只有人，才具有纯粹的、智能的、不以个人兴趣为转移的喜悦和热情；只有人才会欣赏理论的视觉观玩之乐。”<sup>[4](P31, P33-34)</sup> 没有意志、爱和激情，不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干不成，而且人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也无法维系，就连生命的持存和血缘的延续都无法完成，换言之，人的本性无法生成，人的本质不能实现，人的存在无所依据。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激情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sup>[2](P140)</sup>

人也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人，也是一种“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sup>[2](P104)</sup>。对象性是人的本性，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首先，一方面，人能动的自然力、生命力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受动的肉体性、现实性作为对象、条件和限制存在于人之外。人的自我对象化把这些方面确证为自己必然的对象，实现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其次，其他存在物并不被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直接环节，但是，作为人的外部对象世界的原型，其他存在物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成为人的外部对象世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自然界”。也正是通过外部世界和在外在世界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人才成为“有机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sup>[2](P105)</sup> 什么是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5](P9)</sup> 人本身首先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既作为对象本身，又占有对象世界，同时进行对象性的活动。人现实地、感性地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确证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的本质。

但是，“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sup>[2](P107)</sup>。因为，人自为地存在着，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中确证并表现自己，人的历史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扬弃自身的过程。人的对象首先是人的感觉的对象，人的对象性活动首先是人的感性活动。“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sup>[2](P87)</sup> 同时，人的感觉是人对自己对象的感觉，人的感性活动是由于人的对象的存在、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sup>[2](P87)</sup> 马尔库塞认为：“由对象所创立的存在物

的这一特性又是‘感性’的基本决定因素(受对象作用,具有感觉),因而马克思把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感性存在物等同起来。”<sup>[3](P110)</sup>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手稿》中,对象性、感性是马克思用来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sup>[2](P106)</sup>《手稿》中的“感性”这一概念可以通过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一直追溯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sup>[3](P111-112)</sup>所以,马克思说,“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因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2](P140,P107)</sup>

### 三、人的劳动: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本质

在《手稿》中,马克思是借助国民经济学的三个概念——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来分析工人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他深刻地认识到:不仅在资本家奴役下,工人和劳动人民肉体被折磨、精神被摧残;而且,在他们创造的物质环境的奴役下,所有的人(包括资本家)道德被歪曲、个性被泯灭。接下来,马克思不屑于描写这些现象和事实了,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它们的基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因为,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它的基础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本身,“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sup>[2](P57,P134,P184)</sup>从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这一概念的本体论性质,这不可避免地带有黑格尔的痕迹,因为,“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sup>[2](P113)</sup>。可见,劳动是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活动。劳动不仅决定了人之为人,还决定了人之为某种人。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就表现出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人的劳动是人的自然的本能、自为的本性和自由的本质的统一。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劳动表现为异化的劳动。首先,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异化状态中,劳动产品作为劳动生产的对象和结果,不再

属于劳动本身,而是作为异己的存在物外在于并统治着劳动者。劳动产品与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于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sup>[2](P52)</sup>。其次,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异化。人的劳动对象就是自然界,就是外部的感性世界。自然界一方面给人提供作为劳动对象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给人提供作为维持工人本身之肉体生存的手段的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在异化状态中,人越是从事占有外部感性世界的劳动,人就越在这两个方面失去自己的生活资料。他生产的越多,他失去的也就越多,自己能占有的就越少。再次,劳动者与自己的类相异化。人的类特性就是自己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直接地内在于人本身,是只属于人自己的活动。在异化状态中,人的劳动是异己的、被迫的强制劳动,是“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sup>[2](P55,P58)</sup>。最后,劳动者与他人相异化。人同人的异化是前面三种异化的直接结果。“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sup>[2](P59)</sup>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被当做“工人”或“异化了的人”,而不是被当做“真正的人”来对待的。

劳动的异化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私有制社会中都存在。“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指劳动——引者注)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sup>[2](P184)</sup>劳动的异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现实性上,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区别就是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2](P92)</sup>人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异化和对这种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也是对异化劳动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劳动异化的现实,而且是为了对这种异化予以扬弃。“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来说是必然的环节。”<sup>[2](P93)</sup>共产主义就是对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就是向真正的人类劳动的复归。

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本质,正是在劳动中并且通过劳动,人的兴趣得以产生,人的欲望和需要得以满足,人的情感得以激发,人的本质得以实现,并且这种对象性活动得以感性的形式爆发而成为人的本质活动。所以,“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sup>[2](P90)</sup>。

#### 四、私有财产:激情的“真正本体论肯定”之中介

对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私有财产进行深入分析,这是国民经济学家任务和目的,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始终关心的是人的本质的发展以及人类历史的进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异化是人的异化和人的现实性丧失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在现实中显示和表现的方式,是异化劳动的现实结果。他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sup>[2](P61)</sup>私有财产一旦与异化劳动联系起来,它就已不再只是个具体的经济学范畴。“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因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sup>[2](P82)</sup>在这里,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概念也有了本体论意蕴。那么,私有财产在人的本质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到底是怎样起作用的呢?马克思是从私有财产的三种形式(即个人的私有财产、普遍的私有财产和真正的私有财产)来探讨的。

首先,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最早形式,也是私有财产的最初异化。个人的私有财产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私有财产,是个别的、自然的、虽然部分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但并不依赖于人的劳动的私有财产,是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的私有财产,是“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这样一种私有财产。<sup>[2](P85)</sup>

其次,普遍的私有财产是对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否定,也是对私有财产的最初扬弃。普遍的私有财产“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自主活动等等开始,并把私有财产移入人的本质之中而能够不再受

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sup>[2](P74)</sup>的私有财产。普遍的私有财产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私有财产。粗陋的共产主义“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这个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妒忌心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的完成”,“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还是不理解它的本质”<sup>[2](P79-81)</sup>。

第三,真正的私有财产是对普遍的私有财产的否定,也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积极的扬弃。真正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sup>[2](P73)</sup>。真正的私有财产是人的主体的、自为的劳动,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对自身的真正的、彻底的占有,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展现。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sup>[2](P81)</sup>。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对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占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sup>[2](P85-86)</sup>。

私有财产形式的交替就是私有财产的异化及其扬弃,而私有财产的异化及其扬弃是人类历史进程和人的本质的发展的现实表现之一。所以,“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sup>[2](P140)</sup>。

#### 【参 考 文 献】

- [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3版.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4] [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45-09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遭到了学界某些人多次有组织的围剿。尽管这类围剿最后都铩羽而归,但围剿者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成果”:在大学讲台上,劳动价值论被边缘化了,剩下的只是“现代经济学”对价格的肤浅临摹(即教科书里面那把“伟大的叉子”——供求曲线)。于是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由于缺乏起码的劳动价值方面的知识,以致完全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经济学有句行话:“劳动价值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实践证明,这真是至理名言。继赵磊教授组织了《“天生苹果”驳倒了马克思吗?》的讨论(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之后,于开红同学又以“无主草地”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了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赵磊教授组织了下面的笔谈。

## 劳动价值论之辩

[摘要]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习讨论中,于开红提出“无主草地”的价值是否存在、其是否由劳动所创造的问题,认为价值的主体是二元创造的。赵磊教授驳斥其陷入了庸俗经济学的误区,未能理解价值是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李俭国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说明“无主草地”的特殊历史性;易森认为应从自然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区别来看待此问题;鲁保林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价格,但是虚幻的;肖斌认为于的错误在于未完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李节认为,“疑似”商品可以没有价值而有价格;张朗朗则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解析“普遍无主”是一个悖论;邹坤秘认为,价值的本质不是物,是社会对人力的耗费评价。这场劳动价值论之辩,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价值;使用价值;商品;市场

[中图分类号] F014.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8

### 庸俗经济学左右下的劳动价值论误区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四川成都610074)

但凡了解经济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于开红的困惑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见下文《质疑价值

[收稿日期] 2012-06-18

[作者简介] 赵磊(1957—),男,黑龙江省依兰县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开红(1976—),男,四川省射洪县人,重庆三峡学院讲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李俭国(1975—),男,重庆市荣昌县人,西南财经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易森(1987—),男,湖北省监利县人,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鲁保林(1982—),男,河南省潢川县人,贵州财经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肖斌(1985—),男,江西省宜黄县人,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李节(1969—),男,四川省泸州市人,成都体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理论;张朗朗(1984—),男,江苏省宿迁市人,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邹坤秘(1989—),女,四川省安岳县人,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主体一元论》),都是马克思曾经在与庸俗经济学家论战时早就批判过的错误观点。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今天依然还在重复这类错误,这说明:(1)庸俗经济学家对价值的庸俗化理解,是人们最容易犯的常识性错误;(2)对于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有关论战,尤其是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尚缺乏起码的学术了解。

于同学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问号:(1)草地在无主之前,究竟有没有价值?(2)草地在有主之后,究竟有没有价值?(3)草地的价值,究竟是不是劳动创造的?

对于这三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其一,草地在无主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其二,草地在有主之后有没有价值,要看草地是否被当做商品进入交易。

按理说,只要能把价值理解成“关系”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对于以上两点回答,于同学是不难接受的。遗憾的是,他对“价值”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于同学说:“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无主草地’这样的物品,而不需要付出劳动”。在他的逻辑里,草地在无主之前,就已经具有价值了。

其实,草地在无主之前,不论它多么肥沃、多么美丽,物种是多么丰富,它所具有的也仅仅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就如同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主草地不仅没有耗费人类劳动,而且也不具有任何价值!正因为于同学把草地的使用价值误认为是价值,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然林”在没人去招惹它时就没有任何价值。只不过于同学把“自然林”换成了“无主草地”,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无论是自然林还是无主草地,“人类如果不去招它惹它,也就罢了。一旦这些‘自然林’要进入人类的视野和生活,它们就一定会打上人类劳动的烙印”。这个“人类劳动的烙印”,其实就是价值的来源。

下面我着重点评一下于同学提出的第三个问题——“草地的价值,究竟是不是劳动创造的?”可以说,这个问题集中了庸俗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所有困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困惑,原因就在于他在认识上存在以下误区。

一是未理解价值是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草地在无主之前,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范畴。价值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一种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但庸俗经济学陷入了将价值看成永恒范畴的误

区而不能自拔,偏要去证明“自然经济下的‘无主草地’为什么会有价值”这类伪问题,这就类似于讨论“‘无主空气’为什么也会有价值”是一样的荒谬。如果你呼吸的空气是“无主”的(在你还没有把它装进罐子里去出售之前):即使你呼吸的空气对人类有极大的使用价值,这些空气依然没有价值。

其实,在于同学的逻辑里,这类错误非常明显,以至于他坚信:“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无主草地’这样的物品,而不需要付出劳动。”请注意,如果草地“无主”,它又何来价值可言?即使草地“有主”,如果不进入交易,哪怕这块草地包含了人类劳动(比如对土地的改良和投入),它依然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二是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按于同学的历史演绎,原来无主的草地现在“有主”了,被人“圈占”了,进入“交易”了,可以带来收益了,因此,没有耗费劳动的草地现在具有“价值”了。请注意:“有主”或者“圈占”仅仅是价值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要条件。圈占的土地只有进入交易,才会具有价值;如果圈占的土地只是自然经济的“农家乐”,仅供自娱自乐,那么它也不会具有任何价值。

退一步讲,如果按照于同学的思路往下推演——圈占的土地理所当然要进入市场交易,而决不允许自娱自乐——那么,这是否就能证明体现在市场交易中的价值不是劳动创造的呢?不能,因为:(1)被圈占的土地之所以在圈占之后再也不能无偿获得,而必须进入市场交易才能获得,这个真实的历史恰恰证明,这块被交易的土地的交换价值必须依靠“付出”才能得到。这个“付出”,本质上就是人类劳动。(2)哪怕是第一次进入这块草地的圈占者或所有者,实际上也会有所“付出”的,丈量土地、分配土地、协调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维护边界划分等,这些事情总是需要“付出”的吧?这个“付出”,在本质上也是人类劳动!至于这个劳动是否要通过价值来表现,是否会形成价值,那要看它是否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再退一步讲,如果圈占者连丈量土地、分配土地、协调关系、维护划界这类工作都不用做,只要往地上一躺,就得到了无主草地,用不着“付出”,那也只能说明,这些草地丰富得就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需付费。问题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谈免费草地的价值有多少,就如同谈空气的价值能卖多少钱一样,是不是有点搞笑?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嘛(至于清人入关后的“跑马圈地”,那是利用强权对

他人劳动的暴力掠夺,是价值的分配问题,而不是价值的来源问题)。

从“付出”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的关键在于,这块草地之所以可以进入交易,从而具有交换价值,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这块草地“有了主人”,而是因为:(1)这块草地能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如在草地之上生产农作物、狩猎、放牧、搞房地产等——注意,生产这些使用价值,除了自然力外(比如阳光、土地本身的肥力),难道不需要耗费人类劳动吗?由此带来的“租金”(也就是易森说的“地租”),难道不是劳动的结果吗?所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里的“财富”,其含义是使用价值。反过来说,如果这块土地是有毒有害的,不能生产任何使用价值,不能给所有者带来“租金”,即使这块土地姓于不姓赵,那也是分文不值的(至于有害土地在今天也可以人工改造为有用土地,另说)。(2)要得到这块草地,就必须付出相应的“辛苦”、“麻烦”和“时间”,这些“辛苦”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劳动”。说极端一些,哪怕于姓家族最先占领了这块草地,除非别人能付出一个市场可以接受的价钱,外姓人就是靠肌肉和拳头去硬抢,也总要付出比“辛苦”还要宝贵的鲜血吧?否则,老于家凭什么要把祖宗留下的产业免费相送呢?

此外,于同学把自然林的“归属权”当做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依据,显然是把“价值来源”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了。自然林的“归属权”只能说明“价值分配”,而不能解释“价值创造”。这种类似于

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100多年前就已经被马克思批判过了,看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就行了。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因为于同学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搞不清楚价值只是一个历史范畴,所以他必然再次重复庸俗经济学一再犯过的低级错误:不知道价值到底是由劳动创造的,还是由使用价值天然生长出来的?这种混淆,使得他得出了“价值不由劳动创造是普遍现象”的结论。其实,于同学的这个所谓“价值”,不过是“使用价值”而已。可想而知,在没有搞清价值与使用价值区别的背景下,很难明白“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用马克思关于虚拟价值或虚拟价格来解读无主草地的“价格”,对于全面把握劳动价值论而言是必要的。但于同学的困惑并不在这里。在于同学看来,马克思的虚拟价值或虚拟价格不仅没有证明价值的“一元论”(劳动创造价值),反而证明了价值的“二元论”(非劳动也创造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虚拟价值”来解读于同学的困惑。

我注意到,参加这次笔谈的同学从不同方面讨论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虽然有比较深入的挖掘,但似乎也同样缺乏对马克思与庸俗经济学论战情况的起码了解。这是经济学领域最近20多年边缘化马克思的恶果。一次甚至几次笔谈是很难消除这种恶果的。所以,我不仅希望这类笔谈能够继续深化下去,更希望研究者和学习者能多花费一些时间认真了解一下马克思是怎样批判庸俗经济学的。

## 质疑价值主体一元论

于开红

(重庆三峡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4000)

我认为,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无主草地”这样的物品,而不需要付出劳动。

陈世松和贾大泉两位先生编著的《四川通史》中有这么一段历史: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在秦昭襄王时期率众人修建了举世瞩目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而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随之而来的是,秦王陆陆续续地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入成都平

原。这些外来的移民到了四川以后,就开始大规模地圈占土地,用石块将土地圈起来,以表示对这块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中央政府也对这样的圈占方式给予了法律上的认可。

显然,这种私人圈占土地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但是,赵磊老师认为,如果“天生苹果”的假设“成为‘普遍’的事实,不仅劳动价值论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也消亡了,那么我们就

要用自然力与人力的关系,也就是用更深层的理论,来理解这个问题了”。

问题是:在中国封建王朝初期的秦王朝,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占从属地位的年代,市场经济都还没有产生,这与“市场经济也消亡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端,一是始端,一是终端。如何看待这种“无主土地”私有后的交易所得呢?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讲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价值二元性来讲,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

在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个人获得“无主草地”这样的物品,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和代价。此时,“无主草地”从无产权变成有产权的过程,正是其从无人劳动凝集价值变成有人类劳动凝结价值。因此,将这样的商品用于市场交换,从而可以获得相应的货币。这正是赵老师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提到的,要获得“没有人类劳动的自然界产品”是需要代价的,换句话说是要付出劳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人没有付出任何劳动而获得了“天生苹果”,其必然是个小概率事件、偶然事件,不具有普遍性。

取得“自然林”中的木材需要付出劳动,正好可以说明价值创造的二元性。价值创造的主体到底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以马克思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分别给出了价值创造主体二元论和价值创造主

体一元论。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价值创造主体如马克思所说是一元的,是劳动创造的。窃以为,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价格可以背离价值,但是无论怎么背离,总是有价值这个基础的,也就是说,一个物品要入市交易,首先必须是商品,就必须耗费人类劳动来凝结价值。但是,没有经过劳动创造的物品是不是真的没有价值呢?“天生苹果”和“无主草地”似乎都表明没有经过劳动创造的物品也具有价值。

但是,赵老师认为,类似于“天生苹果”的“自然林”的获取也是需要代价的,因此是具有价值的。他说:“如果你就是不信‘劳动价值论的邪’,你就是要坚持没有花费人类劳动的商品不仅存在,而且‘很多’,那你就应当高呼:既然‘自然林’没有花费人的劳动,大家就有充分理由拒绝付费,气死那个独断的马克思!如果你真的去砍一棵所谓‘自然林’的树木,你付出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了。”

在这里,赵老师认为,你如果要去砍伐“自然林”中的树木,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像是在说明人类如果要获得“没有人类劳动的自然界产品”也是需要付出劳动的。但是,赵老师好像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片“自然林”其实不是真正的“无主林”,它是有归属权的,是归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所以,局外人如果想要获得树木,必须用货币的所有权去交易树木的所有权。

## 论价值与商品的历史性

李俭国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四川 成都 610074)

于开红同学在上文中提出了“无主草地”的假定(以下简称“于文”),并且以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大量关中人口迁入成都平原圈占土地得到中央政府给予法律认可为依据,试图证明“天生苹果”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早在自然经济时期就普遍存在。这与赵老师在《“天生苹果”驳倒了马克思吗?》<sup>[1]</sup>一文中的观点“市场经济消亡了”才会出现“普遍的天生苹果”的推论相悖,于文进而试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首先我们看赵老师在《“天生苹果”驳倒了马克

思吗?》的观点:

(1)从立论的角度出发,赵老师认为,在现实中,“天生苹果”的假定太偶然,所以,“天生苹果”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2)“天生苹果”在交易市场上并不存在,分析不应该以伪问题为对象,即理论分析与客观存在应当基本符合,而不能从纯粹主观想象中捏造出来。

(3)赵老师通过“守株待兔”的故事证明:“免费兔子”只是特例而已,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不需要付出劳动的“免费午餐”是不可持续的,这说明了人

类劳动的必要性。

(4)“天生苹果”的假设一旦成为“普遍”事实,劳动价值论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也会消亡。此时,就需要用自然力与人力的关系,来理解“天生苹果”之类的“免费午餐”问题了。

我们再看于文的观点。于文写道: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无主草地”这样的物品,而不需要付出劳动。并以史料证明之。

于文试图以这段论据推翻赵老师上述观点(1)和(4)。在我看来,于文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于文用实践来检验真理,那么,真实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人口不能与今日相比,尤其是在成

都平原这个地方,地处偏远西部,土地资源极其丰富,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土地资源就如同“免费呼吸的空气”一样。即使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人为圈占起来的土地又能卖几何?难道真的有很多人傻得花一大笔钱去买那轻易就能拿来的土地吗?

总之,在人口稀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土地大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是很难出现的。即使按今天暴发户的心态推测,有人脑子进水了,兴致所致,非要没事炒地皮,也只能偶尔为之吧?如果是这样,于文的“无主草地大量交易”的观点就不能成立,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这个历史事实正好印证了赵老师上述的观点(2)。所以,于文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也就不得要领,是自说自话而已。

## 论土地的价格与价值

易淼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于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土地没有耗费人类劳动,自然无从说价值的凝结。那又何来价格背离价值呢?”并且,他进一步地将“无主草地”和“无主苹果”合在一起进行了分析。我认为,“无主土地”和“无主苹果”还不能简单地等同。

在自然力没有完全替代人力之前,绝大部分的苹果种植都会需要一定的劳动消耗,因此没有价值元素的“天生苹果”只是特殊的个例。这种“天生苹果”的特殊性可以内涵于整个苹果生产的一般性之中,就好像单个厂商商品生产的特殊性可以内涵于所有商品生产的一般性中一样,丝毫不影响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天生苹果”的问题,赵老师在《“天生苹果”驳倒了马克思吗?》《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等文中已对其做出了极为精彩的剖析<sup>[1-2]</sup>。

然而与苹果不同的是,土地主要表现为一种重要的自然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sup>[3]</sup>。也就是说,土地在一般情况下基本不存在劳动的消耗,因而没有相应的价值凝结。但是土地依旧能取得价格,比如于同学认为“无主草地”用于市场交换,可以获取相应的货币。的确,现实中就是这样,撂荒多年、荒草丛生的地皮能够在市场上以高额价格成交,没有价值的地皮拥有了极

高的价格。而且重要的是,在现实中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其实已经做出过很好的阐释。马克思说,“土地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因而是提前支付的土地地租”<sup>[4](P911)</sup>。地价本质上是一种“租”而已,它不过是因需求而形成的价格,即由于土地之上产品的需求导致了对土地的需求而形成的价格。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也曾经在分析谷物价格时指出,地租(通过折算就成了土地的价格)直接受到土地产品即谷物的价格变动的影

响。而且,正确认识土地价值问题以及价格形成问题,对把握当前相关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几年里,正是土地之上的房屋的需求导致了地皮的需求,进而使得地价飙涨。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中是房价推动地价。那些所谓地价推动房价,并以之帮开发商推脱责任的说辞,不过是忽悠而已。进一步地,一旦房价的推力不再,那么地价也必然失去支撑。当前情况正是如此,随着2011年下半年以来房市遇冷、房价下跌,这段时期的地皮交易与之前情况大相径庭:地皮不再被热炒,而且在当下出现了频繁的流拍。

## 论价格的虚拟性

鲁保林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围绕“无主草地”的价值,于开红同学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感想。对于土地的价格,于同学似乎感到很困惑,原因在于其缺乏劳动价值方面的知识。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1卷中就指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sup>[5](P121)</sup>因此,虽然土地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土地可以有价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土地价格是由地租资本化而来的,即“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资本化的地租,从而,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献,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sup>[4](P703,P874)</sup>

从虚拟经济的研究视角来看,土地的定价方式可以称为资本化定价方式,现实中采用这种定价方

式的商品还包括股票、债券等。采用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虚拟资产的研究范围,这些虚拟资产的价格“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sup>[6]</sup>。虚拟资产价格的涨落依赖于购买者/投资(机)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利息率的变动等因素。

无论是“天生苹果”,还是“无主土地”,笔者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它们根本没有价值,因此硬说它们具有价值,或者用劳动价值论去证明它们具有价值,实际上是钻牛角尖,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南辕北辙。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价格,说“天生苹果”或者“无主土地”具有价格,这没有违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更没有驳倒劳动价值论。至于这些商品的定价方式,正如前文所述,是一种资本化的定价方式。

## 论价值的历史范畴

肖斌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价值是个历史范畴,是相对于商品而特有的概念,也就是说离开了商品谈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何为商品?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称为商品。这个交换关系包括现实的,也包括观念上的非现实的交换关系。所以,对于“无主草地”的价值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

一种情况是,“草地”不存在交换市场。造成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草地”普遍存在即人人都拥有;二是“草地”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草地”都不是商品,没有价值,也就不存在有无价值的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草地”可用于市场交换,并且价格是1万美金,除了寻找市场的劳动付出不说。

“草地”进入市场交易,这1万美金代表着这一类草地的价值,而这一类草地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回到“草地”的特例,即使于文所说的“草地”人类没有付出任何劳动,但是其作为商品的价值仍然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由社会生产同类草地的必要的劳动凝结来决定的。在这里,只要作为商品进入交换市场,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来进行评价的。

于文说:“窃以为,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

点,价格可以背离价值,但是无论怎么背离,总是有价值这个基础的,也就是说,一个物品要入市交易,首先必须是商品,就必须耗费人类劳动来凝结价值。”

我认为,于同学并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的价值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或者“价格可以背离价值”,都是指市场价格背离了“商品的平均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而不是个别商品的价值量。

## 论“疑似商品”的价值与价格

李节

(成都体育学院 经济管理系,四川 成都 610041)

于文可以归结为:以“无主草地”、“天生苹果”此类理想实验为例,劳动价值论难以自圆其说。这里隐含着:劳动价值论关于劳动、商品、价值、货币、价格及其之间关系的认识是不是过时了,或者说,劳动价值论是不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科学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阐述<sup>[5](P123)</sup>: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人类劳动对象化,过去译作人类劳动物化,“汗滴禾下土”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这段话意思很清楚:

(1)骑白马的不都是王子,还有唐僧。用来交换的不一定是商品,而交换却可以使不是商品的东西、不包含劳动在里面的东西具有商品的形式,这个东西姑且可称“疑似商品”。“疑似商品”是无花果,不开劳动之花的交换之果。于文提出:“一个物

品要入市交易,首先必须是商品,就必须耗费人类劳动来凝结价值。”简言之,先是商品,后方能交易。以马克思上述以荣誉和良心为例的论述观之,于文的这个全称判断是错的。某些东西不是商品,可以先交易(交换)、先有价格,而后具有商品的形式,即成为“疑似商品”。

(2)价值与价格有极紧密的联系,但又有区别、有矛盾。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是商品两重属性之一,是商品的必要条件,因此,不是商品的东西就不包含价值。既然用来交换的不一定是商品,那么,用来交换的就不一定都具有价值,交换可以使没有价值的东西与有价值的货币(如黄金等)或价值符号的纸币建立联系而具有价格。就是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价值量为零、劳动时间量为零的东西可以有价格。换句话说,价格可以没有价值基础,可以不包含一丁点价值。“疑似商品”与金钱的交换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同理,没有汗滴的禾与土,完全可以有价格。

于文第一节涉及的土地及附着物所有权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有详述。社会关系变现(货币),由无价(值)而有价(格)的“疑似商品”,还可举几个。如被贪官包养的“二奶”的天生丽质、克莱登大学的文凭、高价买来的官等。有一丁点价值而有超高价格的商品,如比尔·盖茨那远远超出父母养育之恩、老师培养之德、肄业之前寒窗苦读、肄业之后发明创造的辛勤汗水等价值之和的知识产权。

## 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再认识

张朗朗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基于对“价值”和“商品”的理解,我谈谈于文所说的“普遍的无主土地现象”。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认识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就是说我们只能从物品的某些已知的属性去认识物品的使用价值。比如:放射性物质铀在被当作核材料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它的使用价值,当然也就没有价值。那么,什么决定了“普遍的无主土地”的价值?

注意,对人类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土地,就没有价值。比如:外星球的土地,目前来看,对人类没有使用价值,就不会有价值。于文讨论的问题换个说法就是,“大量的(普遍性)、无产权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为什么有价值以及其价值决定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个悖论。如果严格满足命题条件一定没有价值。命题可以简化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能够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决定”。因为“天生苹果”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天生苹果”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交换行为的完成需要耗费人类劳动。因此,劳动不仅仅是创造产品的劳动,完成交易行为所需要的其他必要劳动也得算上。

(2) 命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没有制造成本的‘天生苹果’能够按照市价(包含制造成本)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必须是偶然的、个别的。如果存在大量的“天生苹果”进入市场,结果必然使得同样数

量的商品中包含的制造成本减少。

(3) 第一、第二点说明,“大量的(普遍性)、无产权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进入市场的结果必然降低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供应同样数量的商品,制造成本大大减少,也就是人类劳动在减少),从而降低市场价格。文中所提到的都江堰的例子,实际上是大量的人类劳动间接改良了下游土地的生产环境,因此下游的土地改良有间接的人类劳动的耗费,而不是自然的结果。只不过这种耗费是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没有都江堰之前,那里的土地价格低廉,甚至没人要,因为使用价值很低。

“自然林”的问题在于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遭到改变,通过行政、立法等方式可以改变社会的生产条件。如果国家禁止自然林开采,所有林木全部来自人工种植,林木生产的社会劳动时间必然会增加。“自然林”类似于“天生苹果”,只不过现在这个“天生苹果”被赋予了产权。产权的功劳在于使“自然林”获得交换条件,使其由物品成为商品。其实,是否赋予产权并不影响“自然林”的价格。无论是偷、抢、还是赋予,都是取得形式上的区别,与价值形成无关。“自然林”能够按市价出售,其原因在第一、第二点已经给出了说明。

## 价值的本质是人的劳动耗费

邹坤秘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在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依然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那么劳动价值体系就没有过时,就是适用的。什么是价值,商品的价值只与人类劳动

有关。赵老师在《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这篇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价值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社会对人力“有偿”耗费的评价,离开了人类及其劳动耗

费,一切所谓的价值评价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寓于机器之中并用以替代人力的自然力是‘无偿’的,因而机器提供的贡献并不创造价值。”

我赞同赵老师的说法,“如果要把‘天生苹果’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要害并不是如何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问题,而是如何占有自然力的问题”;而“当自然力的贡献还未能达到让全体社会成员免费共享的程度时,决定自然力无偿贡献归谁占有的依据只能是生产资料所有权”。<sup>[1]</sup>

“天生苹果”在现实中太偶然,是小概率事件,既然在理论世界中是可以存在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逻辑试着往下推:我们都知道,按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看个别劳动时间的多少。假如一个“天生苹果”交换到一个“劳动梨子”,这个“天生苹果”的个别劳动时间几乎为零,远远低于市场上一个苹果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个主人却能够获得与社会上“劳动苹果”相等的价值。那么,接下去的逻辑会怎么样呢?

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生产活动中人人都是理性的,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天生苹果”在市场上能够交换到一个“劳动梨子”,那么,既然生产梨子的人是理性人,他就必然去想办法要求得到免费的“天生苹果”,而绝不会去和“天生苹果”的所有者进行交换。如果人人都能免费得

到“天生苹果”,最终,人人都能占有自然力而无需付出人力,社会产品便可以按需分配,私有制也将走向覆灭。

于文说:“‘天生苹果’和‘无主草地’这样的现象是普遍还是个案,需视情况不同而定”,其论据是战国时期秦王将人口大量迁入成都平原,出现了外来移民并非“小概率事件”的圈地现象。我认为,圈地行为就是在占有自然力,既然大家都有地可圈,说明资源相对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免费进行耕作。文中也提到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比较落后,如果只是出于自给自足的耕作目的,就不会产生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土地交易,这种土地圈占的背后不具有任何价值元素。

#### [参 考 文 献]

- [1] 赵磊.“天生苹果”驳倒了马克思吗[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86.
- [2] 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J].学术月刊,2005(4):26.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9.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J].东南学术,2004(1):4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54-04

#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魏涛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张载;礼;理;以礼合理

**[中图分类号]**B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9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张子全书·序》中,朱轼曾引薛思庵之言曰:“张子以礼为教,不言理而言礼,理虚而礼实也。儒道宗旨,就世间纲纪伦物上着脚,故由礼入最为切要,即约礼、复礼的传也。”<sup>[1](P396)]</sup>薛氏之言,似指张载仅注重具有实用价值之“礼”,而罕言创化生生之“理”。实质上,张载虽强调“礼”具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实用价值,却并非不言“理”。近年来对于张载礼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并不少,然对于张载礼学思想中的核心——“礼”与“理”的关系问题则缺乏系统的关照。本文拟对张载哲学中的礼理关系问题再作探究,以期揭示张载礼学思想的核心要义,并求教于方家。

## 一、问题指向:工夫而非本体

### 1. 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的礼理关系

在宋明道学家中,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都讲“礼者,理也”,区别在于对“理”的把握不同。周敦颐讲的“理”是可显可微,但又不是独立的

精神存在。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来反对张载“气为太虚”之说,“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sup>[2]</sup>,以“天理”否定张载的太虚之气,把“理”说成无形而实有之物,而且认为“理”乃天地万物之根源。朱熹已意识到“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行迹之可言”,“某之意,不欲其只说复理而说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实。若说人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sup>[3]</sup>之后王阳明在《礼记纂言序》中讲道:“礼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其浑然于其性也,则理一而已矣。”<sup>[4]</sup>王阳明将“礼”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认为它是事物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现。尽管如此,他们仍有一个共性,即通过对“理”的意义阐发,将礼理关系的讨论提升到了伦理终极根据亦即本体的高度。

### 2. 张载礼理关系的问题指向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从天理、物理、人理等各个方面为“礼”作论证,把“礼治”变成“理治”和“治心”,把封建礼教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使礼理相通

[收稿日期] 2012-07-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YJC720039)

[作者简介] 魏涛(1978—),男,陕西省西安市人,郑州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张载关学与宋明理学。

更具有了权威性,对人们的思想引导变成了思想控制。与他们不同,张载借助于“天”而非“天理”或“心”来解释三纲五常和礼理关系。这也是张载礼理关系理论的重要特色。张载对礼理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对如何践礼的讨论来进行的。尽管与其他宋明道学家相比,张载亦有着宋明道学家企图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据的共同倾向,但在他那里,对于五代以来甚或孔孟以来伦理纲常丧失的状况有着更为强烈和独特的感知,其批判不止指向佛老对伦常的冲击,世儒、陋儒与现实政治的脱节更是其重要的理论批判指向。在张载看来,当时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即在于国家缺乏有效的礼制,而世儒和陋儒与社会脱节,导致“体用殊绝”,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使传统礼仪出现了形式化和去形式化这两种不良倾向。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改变儒者“不知择术而求”而只是重视内在修为的局面,还要走出国家制定礼仪制度“出于人”的误区。在张载看来,只有通过“礼”的贯通理解与实践,这个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张载通过对传统礼观的重构,在新的意义上提出了礼理关系的新见解。他说:“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sup>[1](P326)</sup>针对世俗践礼过程中过分注重礼的外在化、形式化倾向,张载强调应该注重把握礼的内在精神,并批评在“礼出于人”理念指导下制定礼仪的行为规范。质言之,他所要解决的是礼的内外之辨问题,而非如何为伦理确立终极根据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张载是通过对虚气关系的深入探讨来完成的。

## 二、理论特质:礼本于天而非本于天理

把握张载的礼理关系说,首先要澄清的就是张载关于礼的本原问题的探讨。

从学理上来说,考察张载的礼理关系说,既要考察其对“礼”的定位,亦要考察其“理”的涵义。在宋明道学的整体话语体系中,要把握张载礼理关系的特质,关键在于把握其“理”的涵义。在张载那里,除“顺而不妄”之“气之理”,还有“性命之理”、“自然之理”以及“天理”等诸多提法。张载所讲之“理”主要是指不得已而然的必然性,亦即规律。尽管张载讲“天理”之处亦不少,且往往将其与“人欲”置于一处而论。“徇物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者乎!”“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sup>[1](P18, P22)</sup>这两处的“天理”皆是就自然法则而言。张载亦讲:“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

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sup>[1](P23, P24)</sup>这依然是从普遍法则的角度而非从“至静无感”的本体论角度来说“理”的。可见,在张载这里,“理”的提法尽管很多,但基本是从自然法则和规律意义上谈的,并没有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张载对礼的本原的反思并没有止于“理”,而是通过上达至“天”的思路而最终完成的。

首先,从张载应然的理论逻辑来看,礼当本于“天”。针对陋儒“不知择术而求”而“有有无之分”及佛老理论陷入虚空寂定的理论弊端,张载从“太虚”概念的引入入手建构起了新儒学的理论体系,为人和万物的存在确立了终极价值根据。“虚者天地之祖,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sup>[1](P325)</sup>天地万物之“取足于太虚”,正说明太虚是天给予万物的内在禀赋;而从“天之实”到“心之实”,则是就太虚作为天人一性而言。“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从虚中求出实。……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sup>[1](P325)</sup>这也说明了太虚之天人一贯的性质,而天地以虚为德乃太虚之至善属性的表现。张载言:“虚者,仁之原,忠恕者与仁俱生,礼义者仁之用。”<sup>[1](P325)</sup>从虚到仁、从仁到礼,张载实现了由“太虚”向“礼”的自然过渡,使得“礼本于太虚(天)”成为必然的理论归宿。

其次,张载曾明确讲过“礼本于天”。张载不认同前贤时儒“专以礼出于人”的观点。他在其佚书《礼记说》中提出:“大虚(太虚)即礼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礼非出于人,虽无人,礼固自然而有,何假于人?今天之生万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礼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或者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sup>[5](卷五十八)</sup>张载曾明确讲到:“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盖礼无不在天所自有,人以节文之耳。”<sup>[5](卷五十四)</sup>此处将礼的本根已讲得非常明确,将礼的地位提升到了天的高度。以此为基础,他为当时的社会危机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序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sup>[5](卷九十七)</sup>此段话有三层含义:其一,礼不依于人而有,即使无人存在于世,天地之间所展现的秩序性即“礼”之展现。基于此可知,若礼不依于人而有,则礼之根源不在于人;而由“天地之礼自然而有”则可知,礼之本根实源出于天地。其二,人是通过顺承并取法天地所展现的整体秩序性而建立人间秩序之礼的。人通过与

天地宇宙的“感通”来完成从天序、天秩向人间之礼的转化。张载哲学“以人合天”的思路得以充分展现。其三,礼虽为形上之理于存在世界所展现之整体秩序,但礼之实践需基于人之内在道德心性,方能体证取法天地大化所展现的秩序性。这样,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模式得以充分展现,“天”抑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不仅“礼”根源于天,“理”同样也根源于天。

若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则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

首先,该提法没有准确把握张载引入“天理”概念的意旨。在程、朱那里“天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张载这里却并非如此。如前所言,张载虽然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及“天理”的概念,但并未超越《礼记》中的《仲尼燕居》《乐记》等篇的思想范围,仍然主要是从自然法则和规律意义而言的。借助于“以礼制心”的实践工夫,克治人心(人欲),以化解道心与人心之紧张关系,这是张载首要的观照点和引入“天理”概念的主旨所在。尽管其“天理”概念已包含着普遍之理的必然性,但更为突出的应是其“所当然之理”的规范意义。张载曾言:“全备天理,则其体孰大于此!是谓大人。以其道变通无穷,故谓之圣人。”<sup>[1](P236)</sup>可见,张载并没有把“天理”放置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不可能用它充当礼的终极根据。这也正是“礼本于天理”的命题在张载这里不成立的最重要的文本根据。

其次,该提法不利于把握张载的工夫论特色。张载在宋儒中是比较早地将“天理”“人欲”和“道心”“人心”这两对范畴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儒者。他说:“穷人欲则心无虚,须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穷人欲则灭天理。既无人欲,则天理自明,明则可至于精微。谓之危,则在以礼制心。”<sup>[1](P264)</sup>张载通过“虚心”、“反(返)天理”、“变化气质”和“以礼制心”等修身实践工夫将“天理”“道心”与“人欲”“人心”衔接起来,突出强调了超越人欲、回归天理的价值取向。他所提出的以“礼滋养人德性”、“得礼上下达”的提法都是在强调“克己”、“化性”的重要性。这也是张载工夫论的鲜明特色。而“礼本于天理”的提法,易于导出“先识仁”、“涵养需用敬”的修养工夫,与张载重视礼化而渐次提高修为工夫的特点不符。

最后,该提法不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关洛学派的差异。尽管在张载著作中也多次出现“天理”、“义理”和“穷理之学”等词语,但需要根据语境作具体研判。通过对散布在张载著作中“理”概念的综合

考察发现,“理”在“天、道、性、心”的哲学总纲中与“礼”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地位,即近于“道”。张载礼之根源在于“天理”的提法,将“先识造化”或“天”的关学特色淹没在“先识仁”、“先识天理”的洛学思路之中,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本位立场。这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张载哲学的建构层次,若将礼之根源归于“天理”,无疑是“礼根源于太虚(天)”的深刻性降低到了“道”的层次,也容易给人造成张载与二程本体论建构无差别的误解。这对于准确把握其礼理关系都是非常不利的。

### 三、理论归宿:“以礼合理”而非“以理代礼”或“以礼代理”

张载对礼“本之于天”的认识和“得礼上下达”的贯通式理解,使得天序、天秩与人间社会规范有机结合,从理论上真正实现了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事的贯通。“以礼贯通天人”或“礼合天人”的理论,成为张载在修养工夫论中通过礼的实践而顺利完成“合内外”之目标的理论铺垫。

#### 1. 礼合内外

礼的内外之辩其实一直是传统儒家思想里的重要论题之一。对张载而言,有效协调礼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其礼学思想建构的重要目标。

首先,在张载看来,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张载认为礼并无所谓内外,“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sup>[1](P264)</sup>,主张“平物我,合内外”<sup>[1](P285)</sup>。在张载看来,践礼、行礼的过程就是内外合一、勉认成性的过程,“知礼成性”之要义在于将外在礼仪通过实践内化于主体自身。由此不难看出,集“合两”、“成性”于一体的张载人性论已经给践礼提供了内外合一的空间,为确保在重视义理即“理先”的前提下做到礼理融合贯通打好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礼理的先后问题也就是在礼化的实践中如何实现内外一致的问题。

其次,在张载看来,礼理先后问题实际上是对内和外的重视程度问题。翻检卫湜《礼记集说》会发现,张载对于礼理关系要义的阐发,来自于对《礼记·乐记》篇中“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一句的解释。《礼记》原文通过对“礼”和“乐”的不同意义的揭示,阐明了礼乐与人情之间的关联。张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礼者,理也。欲知礼必先学穷理,礼所以行其义,知理乃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夫立本者,未能穷则在后者,乌能尽礼文残缺?惟是先求礼之意,然后可以观理。”<sup>[5](卷九十七)</sup>他明确指出,无论是学礼还是践礼,

都需要先学理、穷理,而且认为“礼出于理之后”,并在此基础上批评当时建构儒家新理论的学者们不先穷理,尤其是不问礼之本意而一味效法古礼的做法。在《张子语录》中,他进一步指出:“礼文参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当。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礼,礼则所以行其易,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sup>[1](326-327)</sup>他认为礼的精髓在于礼义,而非在于礼文。对于盲目效法者,需要重视礼的内在精神;对于空谈天道性命者,需要重视礼的外在仪节。礼理的先后问题关键在于要实现内与外的“交相培养”。

## 2. 以礼合理

首先,“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张载反复强调要先穷理而后知礼:“今礼文残缺,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他日得理,以意参校。”<sup>[5](P327)</sup>礼本就是“天理之节文”,乃顺乎人情的产物,故而要真正理解礼,就需先得“礼之意”。所谓“合此理”、“他日得理”之“理”,实指综合考察诸种礼仪器物制度后所得礼仪上的条理或规矩。可见,张载之意,乃礼理二者兼容并包,而非相互取代。张载认为,礼之实践乃“合内外之道”,若人能守礼便是不背离天道。因此,张载认为礼能使人“持性反本”,即通过外在之礼的践行实现内外合一,此即“以礼合理”。

其次,张载“以礼合理”思路的中断是关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朱子在《答陆子寿书》中云:“伊川先生尝讥关中学礼者有役文之弊。”<sup>[6]</sup>所谓“役文之弊”,即拘泥于形式上的仪节礼教。伊川弟子谢上蔡认为:“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涅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sup>[7](卷上)</sup>指出张载后学之讲礼,只限于有形和外在的规矩,失去内在修养上的实践意义。在张载弟子的视野中,似乎张载仅重视外在仪节,对礼与道德实践在理论上的必然关联关注不够,甚至在理解中发生了从“礼”向“理”的自然滑转<sup>[8]</sup>,从而导致其后学尽管能够秉持“崇礼贵德”、“学政不二”的宗旨,但理论建树非常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关学学派在张载之后同洛学及其他学派的学理讨论与沟通,导致其后学渐趋中绝的格局。

最后,“以礼代理”与“以理代礼”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后学之所以遭到来自程朱学者的批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于道德实践中呈现出的“以礼代理”的思维导向。即便如此,朱熹本人仍对张载“以礼合理”的思想保持了几分自觉。朱熹在生前就曾针对学生提出的“以理易礼”说给予了激

烈的批评,而且从其一生的理论建树来看,既有对儒家性命义理之学反复精研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学术性理论著作,亦有对现实社会移风易俗发挥重要导向作用的《朱子家礼》,这使张载的“礼理融合”的思路得到充分展现,从而奠定了其在道学史乃至于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至清中叶,为了纠王学末流之弊,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儒发起的“以礼代理”的思潮运动,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学术指向,以此推定理学发展初期甚至包括从张载那里就已存在“以理代礼”趋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sup>[9]</sup>

## 四、结语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sup>[10]</sup>这是皮锡瑞对经学史上汉、宋学各自学术宗旨所做的论断。就汉学与宋学在义理层面上“由礼转理”的思想史转型而言,这一论断确为精辟之论;而就某一个思想家的特殊性而言,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礼”的定位问题,就政治层面而言,统治者关注的是如何达到掌控社会的目的,故易诱发“以礼代理”的倾向;就学理分析层面来看,因儒者的着力点多在学术探析与思想阐发,故而易沦入“以理代礼”的泥潭。此两种取向,虽意义指向不同,但对社会的整合都非常不利;只有贯通学与政,实现“礼”与“理”在实践层面的融合与沟通,才是理想政治秩序建构的必然选择。本着“学政不二”、“天人合一”的思维,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 【参 考 文 献】

- [1] 张载. 张载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 程颢,程颐. 二程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1:118.
- [3] 朱熹. 论后世礼书[C]//朱子语类. 北京:中华书局,1986:2183.
- [4] 王阳明. 传习录(上)[C]//王阳明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81.
- [5] 卫湜. 礼记集说[M]. 宋嘉熙新定郡斋刻本.
- [6] 朱熹. 朱子全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559.
- [7] 谢良佐. 上蔡先生语录[M]. 张伯行,辑. 福州:正谊书院.
- [8] 牟坚.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J]. 中国哲学史,2009(1):20.
- [9] 何俊. 以理转礼抑或礼合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视角[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36.
- [10] 皮锡瑞. 经学通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54:2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58-03

# 王阳明《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及其价值

王黎芳, 刘聪

(安徽工程大学 思政理论课教学部,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佛说化珠保命正经》的内容是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疗方法,其关于出痘原因的解释及阴阳变化思想与佛教传统观念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依据,故据此可认定此经是伪经。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是王阳明于正德五年离开贵阳之际所作,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序》中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也与史实相符。通过研读该《序》及其相关资料发现,弘治末年“渐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关键词]** 王阳明;佛教;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

**[中图分类号]** B2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0

《已新纂续藏经》保存了王阳明的一篇遗文,即《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通行本《王阳明全集》未见,亦少有学者关注。该序全文<sup>[1](P416)</sup>如下:

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日坐小轩,检方书及释典,始得是经。阅之,其妙义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按方书,诸病之生,可以审证而治。惟鲁痘之种,不见经传,上古未有。间有附会之说,终非的证,治无明验。此经所言甚详,悉可信。且痘之发也,必焚香、洁净、戒酒,忌诸恶秽。其机盖与神通。云细察游僧,所吉即药王菩萨现世度厄。其曰“吾自乐此”者,药也;曰“急扶我骸”者,“急救婴孩”也。乃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愚篋之石曰“佛篋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禱者立应。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序。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

笔者在《阳明学与佛道关系》一书中曾引用过此文,现就该文写作背景及其价值略作探讨,以求教

于方家。

## 一、关于《佛说化珠保命真经》

王阳明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是为《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撰写,该经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疗方法,全文大体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首先,有鉴于痘症流行世间,尤其是儿童深受其害,药王、药上二位菩萨请教于释迦牟尼痘症的来源。释迦指出,摩尼珠是历劫来诸佛凝结而成,主持世界中有情众生和无情之物。摩尼珠在人身中本应如万川映月一般,灵光毕现,但由于众生欲气粗浊,精血交媾,再加之受生以后,诸缘熏染,使得性体中的摩尼珠表现出清浊明暗诸相,遂产生痘症。二位菩萨又问释迦:佛性慈悲,摩尼珠普照众生,为何还有痘症?释迦的解释是:痘症的产生并非摩尼珠自身有明有暗,而是众生有善恶,善气轻清而恶气重

[收稿日期] 2012-07-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2YJC720016)

[作者简介] 王黎芳(1971—),女,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刘聪(1973—),男,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释道三教关系。

浊,轻清为阳而重浊为阴,阳清珠明,性以制命,仍居阳界,阴浊珠暗,命与性离,仍还阴界。阴阳二气的变化使得摩尼珠有明有暗,以致产生痘症。由于痘症多发于儿童,所以二位菩萨进一步追问释迦:婴儿有何恶业,却得如此恶报?释迦说:婴儿出痘非婴儿之过,或者是因为众生生死轮回,前世业报致使摩尼珠不照而得痘症;或者是因为父母先人恶业相感,致婴儿性命不保。

其次,释迦牟尼为二位菩萨演说祛痘之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常存善心,慈悲喜舍,时持杀盗淫邪之戒,便生端生有福之儿,神灵气清,聪明智慧,与摩尼珠浑合无二,有何灾疹能侵?若有人于儿子鲁痘时,顿发善心,自悔恶业,父母斋戒,不杀不淫,香华耀烛,晨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满一千遍,或五千四千余遍,即有佛圣降灵,摩尼照耀,天龙守护,恶鬼逃亡,孩儿保命,父母延年,是大饶益,不可思议。”<sup>[1](P416)</sup>在这里,释迦叙述了祛痘的两种方法。从根本上说,不出痘的原因在于人们“常存善心,慈悲喜舍,时持杀盗淫邪之戒”,这样所生婴儿不但不会出痘,而且神灵气清,聪明智慧。如果已经出痘,需“父母斋戒,不杀不淫,香华耀烛,晨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则可使“佛圣降灵,摩尼照耀,天龙守护,恶鬼逃亡,孩儿保命”。

最后,二位菩萨听罢,表示若有人持诵佛号及神咒,当分身救护,以使世人安宁,于是释迦为他们说法痘咒语。

事实上,《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并非释迦所说,很可能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伪经。原因有二:其一,就内容而言,该经对出痘原因的解釋与佛教传统观念不类。该经论及出痘原因时,虽然利用了佛教的一些说法,但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变化。如果阳气占主导,就不会因痘而亡;如果阴气占主导,则仍还阴界。这种阴阳变化思想不会出自佛教,甚至不为佛教所接受。其二,就经典依据而言,该经没有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依据。日人杉室主人连山僧交易曾评价到:“竺乾之书不经译而传于兹土者,吾于此经始见焉。新建所谓药王菩萨现世度厄,良有以也。新建于儒可谓杰然者也,尊信此经,而刻之序也,则世儒岂可异端而侮之哉,况于奉佛者耶。予得此经,而什袭珍藏也久矣。药王菩萨不待请,而化现流布。予又忆:古曰君子莫大乎善与人勸。是故附劄厥氏,令广其传云。”<sup>[1](P417)</sup>连山僧交易明确指出,该经找不到印度文献的出处,属于“不经译而传”者。刊刻此经的原因在于王阳明是儒家中的杰出人

物,他尊信该经,故不能以异端视之。

## 二、《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出自王阳明之手

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是疑伪经,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出自王阳明之手。

首先,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从地点上看,该经最早出现于贵阳龙场,王阳明在此地得见。在王阳明撰《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之前,另有一篇署名“刑敬”的《序》,文中介绍了此经出现的经过:贵阳龙场痘患严重,当地习俗是将出痘儿童置于旷野,不死然后持归。刑敬的一双儿女出痘,按习俗远置于废庙中。有一游僧施法,儿女得救。此僧将所持篋挂于石上离开,众人于篋中得此经。从此以后,龙场奉佛而灾疹渐消,于是刻印此经。王阳明的《序》中说:“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悬篋之石曰‘佛篋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祷者立应。”该经得自龙场废庙,当时贬居龙场的王阳明得见该经之发现流行的全过程,并以“悬篋之石”命名废庙为“佛篋峰寺”。二者记载相当,可知王阳明在龙场得见此经。从时间上看,王阳明的《序》后有“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序。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谪居龙场,明正德五年(1510年)升庐陵县知县,离开龙场。可见,王阳明离开龙场时,携《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归,并为之序。

其次,《序》中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与史实相符。王阳明的《序》前有“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日坐小轩,捡方书及释典,始得是经。”王阳明自幼多病,曾自述:“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sup>[2](P187)</sup>。龙场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得王阳明病患不断,这期间的书信和诗文中常可见到王阳明提及身体上的种种不适。此外,被贬龙场也影响了王阳明的心情,《年谱》中记载他当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sup>[2](P1228)</sup>。《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的“多病寡欢”,形象地描绘了王阳明此时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 三、《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价值

在通行本的《王阳明全集》中,未见有王阳明为

佛经撰写的序文,《已新纂续藏经》中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可能是现存王阳明为佛经撰写的唯一一篇序。该序对于研究王阳明思想的演变,尤其是正德以后王阳明与佛教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因家庭和自身原因,王阳明早年曾留心于佛道之学,在弘治末年时,王阳明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开始走上构建心学体系的道路。《王阳明年谱》记载:“(弘治)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八月,疏请告。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sup>[2](P1225)</sup>这段记载是学术界公认的王阳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王阳明在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之前对道教和佛教都有交涉,而在这一年中,王阳明一改以往出入佛老的做法,认为道教是“簸弄精神”、佛教是“断灭种姓”,重新回归儒家伦理之学。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王阳明以行动践行了其对佛道之非的认识。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主考山东乡试,“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sup>[2](P1226)</sup>。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被下锦衣狱,不久又被谪贬贵州龙场。在这些变故中,王阳明从儒家经典和圣贤人物的事迹中寻求精神支柱。明正德元年的《吊屈原赋》就是通过缅怀屈原的事迹以抒发不畏困难的心情。在狱中,王阳明通过阅读大量儒家经典来激励自己不畏困难。《狱中诗十四首》中有:“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sup>[2](P675)</sup>《赴谪诗五十五首》亦有类似的诗句:“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sup>[2](P686)</sup>

然而,自贵州龙场返回后,王阳明对佛教以及儒佛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弘治末年的“渐悟仙释之非”转向了认同佛教思想,甚至有儒释殊途同归的观点。王阳明死后,湛若水应阳明之子正亿和弟子黄绾之请作《奠王阳明先生文》,文中记述了王阳明在正德年间三次对儒佛关系的评价。明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说,“言圣枝叶,老聃释氏”,认为佛道与儒家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相对于儒家主干而言,佛老是旁出的一枝,地位稍次,但并无根本区别。明正德九年(1514年),王阳明同意湛若水所说佛老“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儒学与佛老一样,都是“学竟是空”<sup>[2](P1519-1520)</sup>。明嘉靖三年(1524年),张元冲问王阳明“二氏之学”与“圣人之学”的异同,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三间厅堂”之喻:“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

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已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sup>[2](P1289)</sup>如果我们从弘治末年的“渐悟仙释之非”、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中三次对佛教的评价、嘉靖三年的“三间厅堂”之喻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矛盾:弘治末年王阳明悟到的佛教之非是“断灭种姓”,正德六年至嘉靖三年却认为三教的关系是“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

事实上,弥合王阳明弘治末年与正德中后期对佛教不同看法的契机是谪居龙场时的人生经历。杜维明在解读王阳明“渐悟仙释之非”的转变中曾指出:“在实践上,一个人如何能够自由或大胆地从其他价值体系中选取一些成分来激发或丰富自己的价值信念却又不会受到浸染、不会最终被改造呢?这是关于个性发展的一个难解的学术问题。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持守自己的价值信念,无疑取决于他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面对外部的挑战并对新的环境作出柔韧的反应。”<sup>[3]</sup>正如杜维明所说,“渐悟仙释之非”是王阳明思想转向儒学的关键,但是随后王阳明在生活和官场中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一切考验着他能否将先前的转变坚持下去。从王阳明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可以看出,谪居龙场是王阳明人生中的一段痛苦经历,在这种“多病寡欢”的逆境之中,他走了一条与许多中国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心路历程——在遭受挫折时,接触乃至接受佛教。考察王阳明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谪居龙场期间,王阳明与佛教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其对佛教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对佛教的认同感也日见加深。在《居夷诗》中王阳明自述与僧侣交往的诗文就有以下数首:《白云堂》《南庵次韵二首》《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阁中坐雨》《雨霁》《僧斋》《德山寺次壁间韵》《泗州寺》等,其中的《泗州寺》最能体现王阳明与佛教界人士交往之密切:“淶水西头泗洲寺,经过转眼又三年。老僧熟认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佛壁作灯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外缘。”<sup>[2](P718)</sup>从这首诗中的“老僧熟认直呼姓”、“诗留佛壁作灯传”等句中可以看出,此时王阳明与佛教界交往日深。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是王阳明在谪居龙场时期阅读的佛经之一。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此时对佛教的态度较往常大为缓和,开始逐渐接受佛教的观念。王阳明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说:“阅之,其妙义

(下转第109页)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61-03

# 弘扬红旗渠精神 助力中原经济区建设

林世选

(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果说民族精神是支撑国家创新发展的不懈动力,那么一个地区的文化性格或者说文化精神则是区域发展的支撑和动力源。以“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息、奋斗不息”为主要内容的当代红旗渠精神,是包括林州人民在内的中原人民在长期建设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财富,是中原人民认同的精神价值和共同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体现。弘扬红旗渠精神,可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关键词]**红旗渠精神;中原经济区;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战斗力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1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果说民族精神是支撑国家创新发展的不懈动力,那么一个地区的文化性格或者说文化精神则是区域发展的支撑和动力源。以“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息、奋斗不息”为主要内容的当代红旗渠精神,是包括林州人民在内的中原人民在长期发展建设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财富,是中原人民理想信念和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也是中原人民认同的精神价值和共同追求。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原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比较好的趋势、比较好的态势、比较好的气势。在这个背景下,应当继续弘扬红旗渠精神,给力中原经济区建设。给什么力?给凝聚力,给向心力,给感召力,也给战斗力!

## 一、凝聚力是红旗渠精神的价值之源

弘扬红旗渠精神,进一步凝聚中原人民的精神追求,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凝聚力。中原文化璀璨瑰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在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文化中,有愚公移山般的豪情壮志,有精卫填海般的儿女情长,更有敢教日月换新天般的英雄气概,这些都是形成中原儿女核心价值观念的源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

淀,传统美德的长期熏陶,传统思想的经久磨砺,铸就了中原儿女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不畏艰难、侠肝义胆、包容宽厚、忍辱负重、自尊自强、能拼会赢的群体性格,孕育了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锻造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的“三平”精神。文化的变迁,价值的凝练,需要精神的激励。红旗渠精神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的最佳结合与集中体现,蕴含着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干部作风、革命精神等十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和劳动人民的光荣传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凝聚力,具有感化陶冶、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重要意义与当代价值,是中原人民所认同的精神追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之一,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是要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中原风貌、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品牌,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区域。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创业四部曲的红旗渠精神,则是中原文化的优秀代表。其中,艰苦奋斗精神尤为可贵,懂得“忧劳兴国、逸豫亡身”,才能吃苦耐劳、勇挑重担,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开辟人生和事业的前进道路;理解“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才能从小事做

[收稿日期] 2012-07-02

[作者简介] 林世选(1952—),男,河南省温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哲学、社会学。

起、从基础做起,用埋头苦干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深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才能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在千磨万击中历练人生、收获成功。正如胡锦涛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言:“只有自强不息才能把握命运,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时代,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强国富民,只有艰苦奋斗才能成就伟业。”<sup>[1]</sup>在当代红旗渠精神中,难而不惧是核心,富而不惑是精髓,自强不息是特质,奋斗不息是灵魂。其中,既有中原人民勤劳、勇敢、忠厚、淳朴的传统美德的长期积淀,又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向真、向善、向美,使中原人民的灵魂和精神得到洗礼和升华,必将成为中原人民投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价值源泉。

## 二、向心力是红旗渠精神的力量之本

弘扬红旗渠精神,进一步固化中原人民的文化自信,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向心力。文化不仅具备震撼心灵、满足需求之精神力量,而且具备引领社会健康发展、激发民族创造活力之物质力量;一个国家的兴盛强大离不开文化,一个民族的传承延续离不开文化,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文化。不管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还是“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息、奋斗不息”的当代红旗渠精神,既体现了时代精神,又体现了民族精神;既包含了长期历史的积淀,又赋予了改革发展的创新;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其空间和时间的双向坐标更展现了拥有厚重历史与文化的中原人民的文化自信。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sup>[2]</sup>尤其是当今世界,我们时刻都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巨大挑战。没有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就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潮的碰撞难免引起文化的冲突。而文化冲突带来文化反省,从文化迷茫到文化自觉,在曲折的探索和辉煌的成就中,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这份文化自信,立足于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传承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衔接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有了这份自信,中原人民不会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也不

会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有了这份自信,中原人民就有了海纳百川的胸怀,将祖宗留下的优秀文化及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都化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凝练为中原人民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加上中原人民的勤劳勇敢,中原经济区规划蓝图的实现便指日可待。

## 三、感召力是红旗渠精神的动力之魂

弘扬红旗渠精神,进一步引领中原人民的价值认同,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感召力。红旗渠精神的科学性不仅体现了其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还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使得红旗渠精神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是中原经济区蓬勃发展的动力之魂。要使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原人民道德素质的主体,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弘扬红旗渠精神的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条件。中原人民应当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在前代人已经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之基础上肩担道义,在中原经济区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挥洒浩气。被崇高的红旗渠精神所激励,就能产生惊人的毅力与忘我的拼搏精神。中原人民只有自觉结合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实践、自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自觉地抵制错误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体中原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把红旗渠精神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把自己的一言一行落实到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决策上,落实到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周密部署上,落实到增创粮食

生产新优势、构筑“三化”协调新格局、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取得转型发展新跨越、开创和谐社会建设新局面的“五新”发展目标上,落实到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核心任务上,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才能跟上时代不断前进的步伐,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形成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强大动力。

## 四、战斗力是红旗渠精神的实践之基

弘扬红旗渠精神,进一步彰显中原人民的求真务实精神,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战斗力。红旗渠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未来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体现了中原儿女的精神文化追求。红旗渠精神源于社会生活的自觉感悟和实践体验,汇集了中原人民的优秀文明成果和精神追求。红旗渠精神的弘扬与传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验证和调整,即在多层次、多向度、多属性的社会实践中,作为社会化的个体使自己的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通过进行认识、评价、审美等复杂的心理文化活动,把社会需求与主体需要结合起来,不断刺激个体产生新的需要,激发起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欲望,从而使红旗渠精神在原有基础上向更高水平发展。红旗渠精神是中原儿女的一种自觉追求、一种政治责任,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用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效来检验主观世界的改造。建设中原经济区,关键在做,坚持求真、务实、重干,立足于实、立足于做、立足于效,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当前,中原儿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和谐文明的中原经济区,为实现中原经济区宏伟目标迈出新步伐、实现新跨越。

以红旗渠精神为实践之基进一步强化中原人民

的求真务实精神,一要在政府制度设计和执政行为中体现红旗渠精神,这既需要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共领域提供公正有效的制度供给,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更需要政府在行政方式及公务人员的执政行为等方面体现为民、务实等精神,充分发挥导向、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二要在坚持发展中推进红旗渠精神,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三要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内化红旗渠精神,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吸引公民个体普遍参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坚定信仰、执着追求,坚持不懈。

## 五、结语

中原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势不可挡,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焕发生机,两者相得益彰、互动互促,凝聚力是价值之源,向心力是力量之本,感召力是动力之魂,战斗力是实践之基。给力中原经济区建设,红旗渠精神大有可为。正如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红旗渠精神’的核心就是两句话、四个字:为民、奋斗!为民,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奋斗,就是艰苦奋斗、持续奋斗,让我们用实践、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创造辉煌。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河南,建设中原经济区,实现中原崛起的宏伟目标,仍然需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sup>[3]</sup>

### [参 考 文 献]

- [1] 新华社.胡锦涛: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8-03-18)[2012-06-20].[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3/18/content\\_7813356.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3/18/content_7813356.htm).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 [3] 大河网.省委书记卢展工解读红旗渠精神核心:为民奋斗[EB/OL].(2011-07-28)[2012-06-20].<http://law.dahe.cn/c/news/2011/0728/10678.html>.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64-05

# 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刘瀑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近年来,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实力明显提高,科技经费投入力度日益加大,科技成果逐年增多,政府推动科技发展的服务功能也持续强化,但仍存在着全社会研发投入较低,科技人员结构失衡,全社会创新意识薄弱,推动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从充分发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微观主体积极性和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等路径出发提升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河南”。

**[关键词]** 创新型河南;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2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自主创新是相对于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的一种创造活动,自主创新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动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近年来,河南省通过“科教兴豫”、“人才强省”等战略的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中部地区之首。但是,河南省自主创新的总体水平与经济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亟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中原经济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 一、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的现状

### 1.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进程加快,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也不断增强,日益成为全省研发投入主体、技术创新主体和成果转化主体。200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企业已占到65%左右。新培育国家和省级创新型企业189家,高新技术企业519家,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100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41家,许继、平高、中信重机、华兰生物等多家企业进入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行列,数量居中部地区

首位。企业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加快,截至2011年底,河南省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6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674个;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4家,国家级科技企业技术孵化器4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4家,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1家。企业逐步成为科技创新投入的主体,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由2005年的35.9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22.18亿元。企业创新产出明显增多,“十一五”期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大约高出同期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6个百分点。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2430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82.6%。<sup>[1]</sup>

### 2.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实力明显提高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河南省科技创新的源头。截至2011年底,河南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99所,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7个,部级重点实验室25个,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6个,省级重点实验室75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个,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30家;全省共有各类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1665个(比上年增加202个),其中企业办科技机构1238个(增加159个),占总量的74.4%。河南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收稿日期] 2012-06-08

[基金项目] 河南省2011年度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12400450081);河南省2011年度省级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刘瀑(1977—),女,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学。

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是通过技术转让、合作研究、投资或参与企业创建多种途径和方式实现的。同时,还通过产学研共建高新区,形成区域创新聚集,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产生辐射,推动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如郑州高新区引入了郑州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研究院、郑州机械研究所、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省生命科学院和郑州地矿研究所等多家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积极与其合作,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全国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竞争力。

### 3. 科技经费投入力度日益加大

“十一五”时期,河南省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逐年增长。2006年该项支出为79.84亿元,2010年增至211.38亿元,年均增长20.2%;201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0.92%,比2000年提高0.42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财政科技投入由2005年的13.8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5.52亿元,增幅达到156%。2010年河南省研发经费支出在10亿元以上的城市依次为郑州、洛阳、新乡、平顶山、焦作,五市合计为144亿元,占全省总研发支出的68.1%。

### 4. 科技成果逐年增多

河南省申请专利数量不断增多,“十一五”时期,河南省专利授权量达4.93万件,是“十五”时期的3.25倍。2010年,河南省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25149件和16539件,分别比上年增长28.4%和44.7%,获得专利金奖1项,专利优秀奖5项。同时,河南省承担国家级科技项目也逐年增多(见表1),2010年达到339项,是2006年承担项目的2.4倍。技术贸易市场繁荣,2010年河南省技术市场各类技术合同成交总数达4617项,各类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7.69亿元(见图1)。科技成果丰富,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揭晓,河南省有24项通用项目(即民口项目)获奖。其中由河南省主持

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参与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4项。

### 5. 政府推动科技发展的服务功能持续强化

为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河南省人民政府把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工程作为“五大工程”之一予以推进,专门设立了“自主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加强对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同时,围绕着加强科技创新活动,政府不断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机制,进行服务型政府的有益探索。“十一五”期间,针对科技计划管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抵扣、科技成果奖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先后公布了《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河南的决定》《河南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企业研发中心建设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河南省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2009—2020年)》和《河南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形成了良好的科技发展软环境。

## 二、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河南省科技快速转化为强劲生产力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但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总体来讲,河南省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全社会缺乏创新意识,推动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进技术后消化再创新的能力薄弱,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

### 1. 全社会研发投入较低

河南省目前还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科技投入还十分有限,严重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2010年河南省全社会研发费用占本省GDP的比重为

表1 河南省承担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情况(2006—2010年)

年份	基础研究计划	863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火炬计划	星火计划	合计
2006	1	22	34	65	10	5	6	143
2007	7	45	56	71	8	8	8	203
2008	10	61	65	70	7	5	11	229
2009	12	61	66	142	26	33	13	353
2010	19	37	42	166	26	34	15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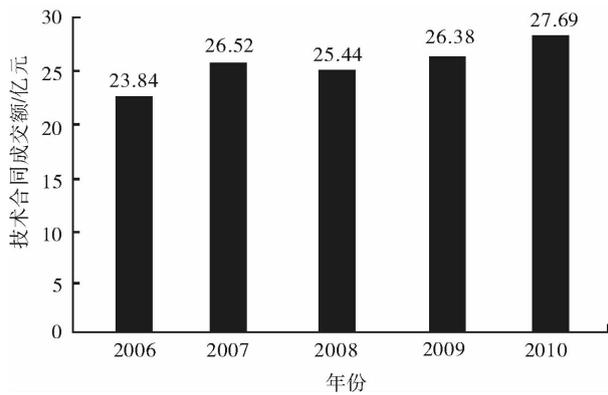


图1 河南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006—2010年)

0.92%,仍低于全国1.7%的平均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在1%以下的企业是难以长期生存的,比例为2%左右的企业仅可以简单维持,只有比例达到5%的企业才有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目前河南省大部分企业仍在通过引进技术、购买现成技术成果、合作开发与简单模仿的方式获得生产技术。据统计,只有27.54%企业采用了国内其他企业和国内独立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大多数企业自主创新走的仍然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路子,只有一部分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 2. 科技人员总量不足,结构失衡

科技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省,科研人员数量与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严重制约了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截至2011年底,河南省共有科技人员26.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比率为0.2%。全省仅有“两院”院士18人,能够解决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关键问题的高新技术和自主创新成果较少。科技人员的分布也不均衡,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南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在人才知识结构上,基础性、传统产业、单一性人才较多,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复合型高技术人才较少。同时,河南省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每年都有大批重点院校的河南籍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选择在省外就业。

## 3. 全社会创新意识薄弱

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薄弱。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抓经济发展时,仍然只注重GDP的增长,铺摊子、扩规模,不注重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和集约型发展,缺乏依靠自主创新、科技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多数企业虽然知道回避创

新并非长远发展之计,但仍然把资金投入再生产当中,哪怕只能获取短期低额利润,也不愿投入到企业的自主创新中去,单纯追求数量和速度,缺乏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动力。社会也尚未形成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意识和氛围,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

## 4. 推动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河南省各项支持创新的体制还未能建立起来,致使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动力不足,严重束缚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动性,企业还未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脱离企业实际需要,成果转化率低,如河南省高校专利的转化率不足5%;另一方面,企业面临巨大的产业升级压力,许多技术难题无法攻克。科技创新管理的统筹协调不够,有限的科技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

此外,河南省还缺乏有效的企业筹资融资机制,企业无法通过社会筹措资金进行创新;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针对外来优秀技术人才的户籍政策、子女教育政策、医疗保障政策等都没有建立起来,严重降低了河南省对人才的吸引力。

## 三、提升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的主体主要路径

目前,河南省的自主创新能力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有许多因素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从微观主体——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制度的构建者——政府三方出发,寻求提升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的路径。我们既要重视发挥微观主体的作用,同样也要积极推动政府管理创新,营造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加速河南自主创新进程,共同建设“创新型河南”。

### 1. 充分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自主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区域产业的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如浙江省拥有数目庞大的创新能力强的中小型企业,广东省拥有众多的创新能力强的合资、独资企业,而北京中关村周围的企业以及留学归国人员创办的企业也大多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目前河南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较差,发明专利的授权量虽然有了显著提升,但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不多,自主创新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

自主创新并不要求企业完成所有技术的开发,

但核心技术必须依靠企业自身力量独自攻克,这就需要企业在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创新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企业自身积累的知识和能力的支持,要求企业要不断地学习、储备知识,构建学习型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因此,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技术的突破和市场的开拓,更要加强自主创新过程中的组织学习,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树立“学习为本”和“终身学习”的理念,鼓励和倡导职工学习,构建完善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将“干中学”与“研究开发中学”结合起来,创新学习模式,使学习制度化、普遍化和经常化。企业通过成为学习型企业,不断地学习、积累和整合知识,从而使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创造能力上升到新的台阶,进而准确把握和预测市场需求变化的趋势,形成新的知识和技术体系,成就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由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成为自主研发型企业。此外,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面对技术本身、技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其内部激励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决策者和参与者的行为选择,也就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因而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创新的内部激励机制,如产权激励、创新收益分成等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员工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凝聚和吸引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投身到科技创新。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还需要强调企业间技术创新的合作,形成企业创新联盟,充分利用和集成河南省内的各种要素和资源,解决河南省支柱产业中的重大技术性问题。

## 2. 调动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动区域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具有人才、学科、知识、信息和技术优势,很多科技人才都出自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他们是基础性理论研究的主体。相关资料显示,美国和日本的很多大学承担基础研发的数量,已经分别占到了全国基础研发数量的62%和46.5%。目前,河南省共拥有161个科研院所和99所高校。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这些院所具备良好的科研基础和人才资源,拥有强大的开发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他们正逐渐成为河南省知识创新的主体。2010年这些院校申请专利的数量比2003年增长了十几倍,但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移效率并不高。据河南省知识产权局统计,河南省高等院校中各种专利的转化率普遍低于5%。对于绝大多数高校专利项目来说,由于缺乏信息传播、技

术交易平台,缺乏实验资金和实践检验而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造成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重大浪费。

要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动区域自主创新的作用,首先,要加快重点学科建设,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重点学科一般是高校的优势学科,集聚着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创新团队,是培养高层次、高质量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要引导各重点学科大力发展服务于我省的特色学科方向,充分利用其博士、硕士及专业学位点以及博士流动站,加快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以满足河南省对不同层次创新人才的需要。其次,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具有公信力的沟通体制,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利用中介组织的信息网络,使得中介在企业 and 高校间建立起通畅的信息通道,一方面使得高校的科研成果可以顺利地转化成产品,另一方面也使企业能得到急需的技术,从而使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可以进行深入、全面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的研发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优势,真正在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最后,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对现有的考核和奖励政策进行改革,提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人员的待遇,在住房、晋升和职称评定中给予适当的倾斜。

## 3. 推进有利于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政府管理创新

随着自主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在区域自主创新中起主导作用。世界民营化大师E. S. 萨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各级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为区域自主创新服务的机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促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充分、高效地促成创新主体的创造行为。

一要解放思想,建立学习型政府。地方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只有不断学习、提高,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好地推动区域自主创新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了解公众的心声,制定切实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应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有效运用自身的资源和力量,通过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不断推动企业和公众

参与实施自主创新。二要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平等竞争,其实质是企业拥有平等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机会。一是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行业准入门槛,增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企业更加专注于科研,提高自身竞争力,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力。二是大力支持、鼓励和规范诸如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市场调查、法律咨询、会计与审计、人才交流与培训、技术与信息交流、项目咨询、无形资产评估、专利代理与专利战略研究咨询等服务类中介机构的发展,使其成为社会服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三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增强可操作性,提高执法水平,提升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三要营造勇于创新的社会氛围。促进创新活动发展需要弘扬崇尚创新、宽容失败、激励成功、善待挫折的创新文化与创新精神。只有在良好的创新

文化氛围下,广大民间创新工作者的创新智慧才能得到挖掘、创新热情得到激发、创新才能得到支持、创新成果得到肯定。建立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建设创新国家的一个重要部分,建立有利于创新活动发展的文化氛围是推动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 [参 考 文 献]

- [1] 赵东初. 自主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云南社会科学, 2009(2): 94.
- [2] 林汉川, 王分棉, 管鸣东. 我国民间的创新现状与支持体系[J]. 经济管理 2009(1): 133.
- [3] 谷健全. 加快构建中原经济区自主创新支撑体系[J]. 中州学刊, 2011(2): 69.
- [4] 河南省“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EB/OL]. [2011-08-24](2012-06-01). <http://www.hnkjt.gov.cn>.

(上接第 35 页)

出一定的异质性,但这里更主要、更丰富的思想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较高级别的同质性。从《手稿》中马克思解决的哲学问题的性质、质量、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思想系统性等方面来看,《手稿》的主要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是次要的。若主次不分,主次颠倒,必然导致错误定位。《手稿》中科学的劳动观就与后来马克思的实践观保持了较高级别的一致,与后来解决哲学问题的路径和结论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手稿》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质性的内容之后得到重大发展和充分展现,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异质性的东西则逐步消亡。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成果,面对庞大、复杂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运用自己的哲学来把握和批判是必要的,否则,这样的研究就无法进行。在《手稿》中初步形成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虽然此时马克思

的哲学思想尚不成体系,需要使用费尔巴哈的概念体系,甚至在研究中常常发生跳跃现象,但都无法改变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框架的事实,因为它包含着成熟时期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观点的萌芽。因此,《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这一观点既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也是对《手稿》更加准确、更加合理、更加恰当的历史定位。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90.
- [2] 王东. 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0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7.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69-04

# 论生态补偿模式的合理选择

——以美国土地休耕计划的经验为视角

王晓丽

(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生态补偿有政府补偿、社会补偿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补偿等模式,选择适宜的生态补偿模式是生态补偿计划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美国以国家、州和土地所有者为三个实施层次的生态补偿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借鉴美国土地休耕计划生态补偿模式,我国在选择补偿模式时应考虑被补偿主体的参与意愿,确立并尊重生态效益的产权,适时调整补偿评价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补偿计划。

**[关键词]**生态补偿;土地休耕;环境效益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3

## 一、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

国际上生态补偿比较通用的概念是“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s),是指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基础,通过经济的手段,调整保护者与受益者在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利益关系的机制。在国内环境政策领域,一般认为生态补偿是调动各类主体实施生态保护活动积极性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则的集合。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通过采用各种政策、市场以及经济刺激等方法,解决特定区域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达到促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保证环境资源持续利用,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制定有效的生态补偿计划首先要选择一个合理、适宜的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已经实施的生态补偿计划的实践经验,生态补偿存在不同的模式,其模式的划分标准各有不同。如,以空间尺度大小为标准可将生态补偿分为生态环境要素补偿、流域补偿、区域补偿和国际补偿等<sup>[1]</sup>;以补偿方式为标准可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以补偿原则为标准可分为内部补偿、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等模式<sup>[2]</sup>。此外,根据生态补偿主导力量的不同,可分为政府补偿、社会补偿

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补偿三种模式,本文主要以此种划分方式作为分析的依据。补偿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绩效和长远效益。

### 1. 政府补偿

政府补偿也称为国家补偿,其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制定生态补偿的具体政策,并负责实施和监督生态补偿计划。这种补偿模式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由中央政府或受补偿区域的上级政府制定生态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通过采取财政补贴、税费优惠、特别项目和发展政策等方法,对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了发展机会的受损者进行补偿。这种生态补偿制度的核心是由政府作为补偿主体(大多数时候是唯一主体)对生态保护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费用和直接损失给予经济补偿。

这种模式的补偿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1)支付补偿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生态保护者支付其为保护生态环境而付出的成本费用和所受损失。如我国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即规定由政府补偿退耕还林的农户,每年每亩补偿10元。(2)实物补偿。政府部门通过向生态保护者发放一定的实物,包括粮食、经济林木苗、农业生产

[收稿日期] 2012-06-1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820087)

[作者简介] 王晓丽(1975—),女,河南省漯河市人,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法、国际法。

工具等,以补偿其实施生态保护活动的成本费用。(3)政策支持。政府部门通过给予生态保护者一定的优惠贷款、税费减免、技术培训、就业帮助等,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助力。(4)生态移民安置。在一些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途径就是进行生态移民。但生态移民所涉事项庞多,此时就需政府全面规划,为移民的异地安置提供援助,包括搬迁费用、住房建设、就业安排等。我国的三峡水利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均需首先解决生态移民问题。

## 2. 社会补偿

社会补偿的主要特征是补偿主体多元,包括生态建设受益地区、部门、行业及个人。社会补偿的原因是生态建设活动往往会带来外部经济性,为了使外部经济性内部化,由受益人补偿生态建设的成本与费用及因生态环境保护丧失发展机会者遭受的损失。<sup>[3]</sup>在补偿方式上,包括经济手段和投资、技术以及人才培养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补偿模式中的补偿人本应包括破坏生态环境的排污者,但根据环境法和民法的相关规定,排污者因排放污染物损害环境,造成其他主体损失的,应承担环境民事责任或其他责任。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包括停止污染行为、支付民事赔偿、恢复原状等。若涉及到环境行政责任,排污者还应向政府缴纳排污费、自然资源费等。这些费用可视为是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的补偿,也可视为是对国家的补偿。因此,在社会补偿模式中,一般排除了此类补偿人。

同政府补偿的具体方式相似,社会补偿也主要采用货币或实物的方式进行。但不同于政府补偿中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社会补偿中的货币补偿方式因其资金来源渠道多元,故多采用基金形式,由社会各方筹集资金形成生态补偿基金,根据设定的章程对生态保护活动中的受损方予以补偿。当然,补偿的形式也可以是投资项目、技术援助、人才培养、就业帮扶等。实行这些补偿的主体包括企业、个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等。该模式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补偿途径——环境产权交易,主要内容是通过生态保护活动的受益者和生态保护活动中的受损者之间进行环境交易达成。目前我国试点的主要是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需以政府部门对特定地区的最大污染物容量先行界定为条件,在此基础上,对排污权进行分配。通过市场定价,排污权形成一定价格。生态保护活动的受益者可以一定价格购买生态保护活动中的受损者手中的排污权(现实生活中往往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通过这种交易,实现对受损者的补偿。环境产权交易是社会补偿模式中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补偿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政府补偿的单一和僵化缺陷,显现了市场机制在生态补偿中的灵活力量,更能贴近交易双方的真实需求。虽然在试点中也发现该模式有不足之处,但经过完善之后,仍是社会补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3.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生态补偿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生态补偿一般是指以保护和生态保护为主旨的非政府组织制定生态补偿计划,提供资金、技术或人员支持进行的补偿活动。近些年来,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生态保护领域非常活跃,但囿于资金或制度支持乏力,主导或直接参与的生态补偿的案例不是太多。同时,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出色的行动力和充裕的资金支持参与了一些生态补偿的具体实践。这种补偿模式与政府补偿和社会补偿相比,虽未制度化,但它的出现弥补了政府补偿和社会补偿的不足,丰富了生态补偿的模式。随着我国生态保护政策和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生态补偿必将不断增多。

## 二、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模式选择之分析

美国独立后,由于人口的快速增加而大肆开发土地,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农业机械技术和更先进的农业设备的出现,采用密集机械化方式耕种的农田面积不断扩展。广袤的中西部大平原由于强力耕作而未考虑到足够的水土保持措施,爆发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史上称为美国“黑风暴”。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美国国会于1929年授权美国农业部进行土壤侵蚀研究,并建立了专门基金。在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和监测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计划。这些生态补偿计划包括保护储备计划、湿地储备计划、保护储备加强计划以及上述计划的替代政策,如支付成本费用和保护遵守规则等。这一系列措施被统称为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计划。

### 1. 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模式选择的法律依据

土地休耕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农业政策后,美国制订了一系列专项法规作为执行和规范该政策的立法依据。其中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规定,采取对特定农作物征税来补偿那些农业生产受限制的土地所有者以此减少耕作农田面积和控制农产品供给。但是该法案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是否具有合宪性的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就此问题作出裁定:由于《农业调整法案》没有为农民提供绝对的财产保障而不符合美国宪法的规定。此裁定的出台直接导致了另外两个相关法案的颁布:一是《保护调整法

案》,二是《农业保护计划》。这两个法案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参与土地休耕的农民提供及时的保障措施。为了加强土地休耕计划及其补偿,美国还在1965年通过了《食品和农业法案》,该法案设计了一个鼓励农田长期休耕达到一个适度数量的计划。

## 2. 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模式的核心内容

土地休耕计划具有志愿性的特征。政府农业部门制定土地休耕的规划,农户可提出加入申请。申请获批后农户可获得政府提供的年度租金、特定活动的激励金。除此之外,政府还为农户种植保护土壤层的特定植被提供成本补贴。从实施层次上看,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模式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州和土地所有者<sup>[4]</sup>。

(1) 国家层次。土地休耕计划设定了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农民为有利于资源长期保护而在农地上种植永久性植被,如草原、灌木丛、森林、矮树林等,以防止水土流失,同时为野生动物建立栖息资源。美国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了商品信用公司,其功能主要是每年为参加休耕计划的农民提供资金,资金包括土地租金和种植被批准的植被保护层的一半成本。在休耕土地上种植什么样的植被保护层由农场经营者和政府自然资源保护官员协商确定,双方同时签订10~15年期限的土地休耕合同,合同中一般会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植被保护层的验收标准。后者是农民获取生态补偿金需满足的必要条件。

(2) 州层次。参与休耕的土地大多位于大平原的北部和南部,包括爱荷华州和伊利诺斯州,还有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等。美国农业部的农业服务局和自然资源保护服务机构都设有与各州和地方对口的办公室,负责实施有关土地休耕保护计划。县农业委员会和水土保持机构(由地方选举产生)以其人力和技术资源支持休耕计划在本县的实施,甚至会雇佣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休耕计划的工作。

(3) 土地所有者或经营者层次。土地所有者和农场经营者参与土地休耕计划的主要方式是提供可供休耕的特定土地。参与美国土地休耕计划的土地应满足以下条件:在最近5个粮食生产季度中已经种植过至少两季农作物的土地;以前登记在其他保护计划中的非重要牧场;属于河流或水体的缓冲地带。除了满足上述条件中的某一项外,参与休耕的土地客观上还应具有下列某种属性或资源:一是有一个等于或大于8的侵蚀指数(EI),或被认为是侵蚀严重的土地;二是可耕种的湿地;三是具有环境保护的惠益,如属于河流缓冲带、草场排水道、保护地带、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类似的功能;四是易遭受冲刷;五是位于美国联邦或州的土地休耕计划的优先

保护区域;六是与非农耕湿地有关或环绕非农耕湿地的农田。凡是符合上述要求或标准的土地,其所有者或农场经营者均可依程序申请加入土地休耕计划,申请获批后,与联邦政府农业部或所属各州农业服务局签订土地休耕合同,并领取年度租金和种植植被保护层的成本补偿费用。

## 3. 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模式的实施绩效

美国的土地休耕计划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部大平原严重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时期(“黑风暴”时期),当时的土地环境状况糟糕,农作物单位产值低,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对农田获益的期望值也不高,对农业生产消极、漠视。无论是从环境保护的生态价值还是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保障,甚至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优势来看,均处于亟需改善的状态。美国国会和政府实施土地休耕计划,并选择政府补偿为主的模式激励参与休耕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sup>[4]</sup>在土地休耕计划实施的前10年,人们最关心的是是否能通过休耕计划控制土壤侵蚀,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其经济影响。但随着土地休耕计划的逐年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对其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感到惊喜。通过观察和研究表明,土壤侵蚀所致的对农作物及其经济的影响远远轻于其所导致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包括对水质、鱼类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公共设施如大坝、沟渠、运河等的侵蚀和沉降的影响。通过实施土地休耕,上述环境效益和公共设施的社会效益均得到较大改善。有鉴于此,1990年后,为了达到多重环境目标并强化成本最大效益化,美国农业部发展并制定了一个环境收益指数,用以评估所申报的每块休耕土地的环境属性,包括下列标准:表面水质的改进;地下水水质的改进;土壤生产力的持续性;对参与休耕计划的生产者潜在问题的援助等。其目标是力争使政府支付的每一美元生态补偿都能获得最高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 三、美国土地休耕经验对我国生态补偿模式选择的启示

### 1. 政府补偿应考虑被补偿主体的参与意愿

政府补偿通常具有强制性,但从美国土地休耕补偿的经验看,在选择政府补偿的模式后,并非就完全排除了被补偿主体参与的自愿性,二者可以在实施过程中有机结合。首先,在美国土地休耕计划中,参与农户的意愿和利益受到充分尊重和考虑,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协调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具体来说,农户可根据自己所有或经营土地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申请加入土地休耕计划,即公民的自主性与利益是政府制定土地休耕计划要考虑的第一要务。

其次,农户申请获批后,会获得政府提供的租金补偿和植被种植补贴。反观我国已经实施的生态补偿计划,大多政府补偿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强制性“一刀切”,在制定生态补偿计划时忽视参与者的诉求,实施方式粗暴,以“命令式”为主。我国幅原辽阔,制定出一个适用于全国的生态补偿计划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地的现实情况,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设计人性的生态补偿制度,才能及时合理合法地处理好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之间的关系。<sup>[5]</sup>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不仅要在国内实行碳排放交易机制,以解决生态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应该考虑参与全球生态效益交易市场,拓展外部效益内部化的市场渠道,逐步健全生态效益的市场补偿机制。<sup>[6]</sup>

## 2. 产权清晰有利于生态补偿取得积极成效

无论选择何种生态补偿模式,一个生态补偿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就是确定并尊重生态效益的产权。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的责、权、利的明确也离不开明晰的生态效益产权。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计划实施多年绵延不绝,并取得良好实施绩效,与美国清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产权不无关系。在土地休耕计划的运作过程中,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明确规定:私人产权应得到尊重,哪怕是政府制定的重要规划,若要限制私人产权,必须取得产权所有人同意并给予相应补偿,否则就是违宪。而我国的情形与此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我国的环境资源是公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均不具有生态环境的所有权,除了国家。这种产权形式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生态环境产权主体模糊或者缺失,从而影响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的确定。要完善生态补偿模式,需明确自然资源产权关系。从长远来看,只有用法律的形式将生态补偿区域居民的自然资源经营权、收益权确定下来,才能充分激发生态保护活动参与主体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积极性,生态补偿计划方能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

在美国土地休耕计划中,政府并非只关注计划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还很注重保障生态补偿对象的权利。以补偿期限为例,最初硬性规定为10~15年,其后就调整为动态的补偿期限;补偿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始终是政府与参与计划的农户之间的充分协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土地进行休养生息谋求长期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农户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也实现了,公民的环境权也实现了,真正做到了多方共赢。然而从我国实施的若干生态补偿计划的实践来看,发展权、生存权与环境权“撞

车”的情形并不少见,无法达成多方共赢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清晰的环境资源产权。

## 3. 补偿评价指标应根据实践适时调整

美国土地休耕生态补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科学的补偿评价指标。在土地休耕生态补偿计划实施之初,美国农业部门就建立了环境效益指数(EBI),即以土壤数据库、各地地形图、各区域分布图等为依托而形成的一个综合评价体系,用来评价参与计划地块的生态效益。同时也充分采用市场机制,根据全美各地的土地交易信息,确定不同地区、不同生态效益地块的补偿标准。哪些自然资源处于濒危状态就进行重点保护,加大补偿力度,提高补偿标准,吸引该地块农户放弃农业耕作,参与补偿计划。联邦政府制定土地休耕计划,但各个州拥有对补偿资金的一定支配权,兼顾了计划的效率与公平。补偿评价指标确定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定周期内,根据国际农产品交易价格、美国农业发展趋势、生态资源的恢复状况、通货膨胀率、居民实际购买力等因素进行调整,引导生态补偿计划实现既定目标。因此,一个优秀的生态补偿计划离不开合理模式的选择,选定这种模式后也并非一劳永逸,而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生态补偿计划实施中,补偿标准由政府确定,且一经确定,往往实行多年而不作任何调整。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这种补偿已经无法达到当初计划制定者的补偿目标,有违计划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应积极改进。

另外,在美国生态修复工程中还运用了加权平均侵蚀指数、土地相对生产率等定量指标。对中国来说更应该重视这种效益评价体系,通过对生态补偿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前评估,确定项目是否值得、可行,使资金得到更合理的分配。<sup>[7]</sup>

## [参 考 文 献]

- [1] 王蓓蓓,王燕,葛颜祥,等.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及其选择研究[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1.
- [2] 陈尉,刘玉龙,杨丽. 我国生态补偿分类及实施案例[J].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2010(1):52.
- [3] 毛显强,钟瑜,张胜. 生态补偿理论探讨[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4):38.
- [4] [美]Ralph E Heimlich. 美国以自然资源保护为旨的土地休耕经验[J]. 杜群,译. 林业经济,2008(5):72.
- [5] 刘嘉亮,吕志祥. 美国土地休耕保护计划及借鉴[J]. 商业研究,2009(8):134.
- [6] 李爱年. 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225.
- [7] 邢祥娟,王焕良,刘璨. 美国生态修复政策及其对我国林业重点工程的借鉴[J]. 林业经济,2008(7):2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73-04

#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理框架的构建及政策建议

陈要立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通过对国内外创意指数及理论模型的考察,发现:创意指数由创意产业的形成条件和发展结果两个方面构成,在此基础上可借助“钻石模型”构建出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机理框架。依据该模型,建议我国政府在制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时要依据当地经济 and 市场需求,加强文化创意氛围的构建,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含量,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创意指数;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 F026.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4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会发生更深层度的变化,居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将会进一步增加。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会更加重要,大量的产业要素会加速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形成强大的供给能力。<sup>[1]</sup>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准确界定,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在美国称“版权产业”,在英国叫“创意产业”,而日本、德国、荷兰等国家称之为“文化产业”。不论如何称谓,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从目前来看,我国各个地区政府已经或正在制定出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但相关政策缺乏针对性,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原因固然有产业发展初期缺乏实践支持,以及我国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因素,但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缺乏一套能够有效评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整体绩效的指标体系,以反映产业发展实际,并进行检验和政策调整。因此,有必要针对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指标框架体系<sup>[2]</sup>,并依托该框架体系进行科学的政策建议研究。

## 一、国内外创意指数研究述评

文化创意指数是指近年西方一些文化创意产业

成熟的国家或地区衡量创意产业成效的指标体系,他们力图通过建立全新的、旨在衡量地区创意状况和决定创意发展因素的统计性框架,评估和督察创意城市竞争力。由此引发的如何衡量一国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问题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目前研究的热点。<sup>[4]</sup>

国外对于创意指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已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各种指标模型也应运而生。其中值得关注的有:199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的《针对文化和发展的全球性报告:建立文化数据和指数》,2002年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地区文化发展的衡量和指数》,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2002年的先驱性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及他2004年与艾琳·泰内格莉合著的《创意时代的欧洲》等<sup>[5]</sup>。这些研究运用众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来建立文化指数系统,多样性、创造力、全球化、参与度都是这些指数系统的重要指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理查德·佛罗里达的3Ts指数及其创造的美国创意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以及被国际认可和接受的全球创意指数。3Ts指数是指一个创意产业必须具备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宽容度

[收稿日期] 2012-0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BJY010);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0A630085)

[作者简介] 陈要立(1977—),男,河南省鄢陵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技术创新。

(tolerance)3个关键要素。

此外,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以人员质量、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7个因素作为基底,分析了创意城市发展规模经历从停滞、萌芽、起飞阶段到活跃、普及再到形成创意中心、创意城市等10个等级。<sup>[7]</sup>

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开展并发表的《香港创意指数研究》,参考了国际上具有前沿性的创意衡量基准,创造性地吸纳了理查德·佛罗里达创立的3Ts指数模型及其应用成果欧洲创意指数的精华,结合本地状况建立了5C模型,该框架包含结构与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创意成果,强调4种资本形态的互动是影响创意增长的决定因素,它包含88个指标。<sup>[8]</sup>

2006年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在借鉴美国、欧洲和香港创意指数体系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和上海市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出发,建立起来一套创意指数体系,设立了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社会环境5个方面共35个分指标。<sup>[9]</sup>2007年经过重新修订的创意指数,更加关注科技发展对文化、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强调文化、技术和经济三者的深度融合。但上海创意指数涉及文化创意产业城市环境指标不够。此外,该指标体系主要是立足于上海市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不适合其他城市生搬硬套。<sup>[10]</sup>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创意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3Ts指数或香港的5C模型,或是二者的综合。由于5C要素的特征体系基本能够概括中国各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许多特征,所以国内更多的是采用5C模型同时参考3Ts指数。在评价和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有很多重叠和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替换,尤其是国内创意指数的研究都是依托国情和文化背景,在指标的设计上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其中包括为形成和发展创意产业的创意产业人才资本、独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制度/结构资本、科技资本等指标;另一部分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包括创意成果、产业规模以及产业效益等。

## 二、基于创意指数的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与发展机理框架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

克尔·波特提出了国家或地区取得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sup>[11]</sup>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说到底,是产业的竞争优势问题,分析问题应从产业入手。“钻石模型”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4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竞争的表现。这4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4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政府政策同样是一大变数,它不是决定性的,其作用的发挥需要以4要素(4要素的相互作用及配合)为基础。

“钻石模型”这个产业竞争优势分析模型同样也适用于当今的文化创意产业。将“钻石模型”和文化创意指数的构成要素进行合并分析,就可构建出如图1所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机理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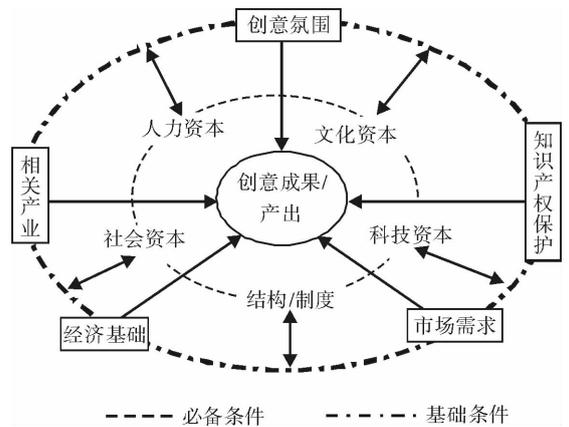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与发展机理框架

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实现竞争优势的获得,需要创意氛围、经济基础、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保护和相关产业5个方面形成的基础条件圈,还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科技资本和结构/制度5个方面形成的必备条件圈,进而通过基础条件圈与必备条件圈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这些因素彼此协同、相互促进,让文化创意产业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单一分散走向园区发展和集群发展,产生一定的创意成果进而促进创意产业发展,实现规模、效益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的良好发展等目标。

基础条件圈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宏观影响因素,这5个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提供创意产业形成、发展的养分。创意氛围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温床;科技等产业的支撑是关键;经济基础和市场需求是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市场环

境;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基本法律制度保障。必备条件圈是核心要素资源条件,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一个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人力资本态势和潜力、文化资本态势和潜力、科技资本态势和潜力以及产业内企业的制度结构安排设计与该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源泉和可持续动力;文化资本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

### 三、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与发展机理框架的政策建议

依托众多创意指数构建的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与发展机理框架,清晰地表达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内在机理及一般规律。基于此,提出如下具有针对性的务实政策建议。

#### 1. 制定政策要依托当地经济水平和市场需求状况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英国、瑞典和芬兰等,都是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而在亚洲地区文化创意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主要是发达国家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和新加坡。在我国,文化创意发展较快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其经济发展水平也都相对较高。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前提,其主要原因在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了市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物质保障。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 1 000~3 000美元之间,是一个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此阶段恩格尔系数急剧下降,家庭文化娱乐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会有明显上升。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才开始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此时,对于文化创意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才开始大量增加。<sup>[12]</sup>

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分析当地的消费结构特征和趋势,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消费指数等合理规划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要盲目追求规模化、效益化,相关政策的出台要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状况,避免搞重复性建设,要分阶段分步骤,通过合理的政策制度来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 2. 加大文化创意氛围的构建

吴予敏<sup>[13]</sup>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不是要简单地发展规模的大众消费文化,而是要培育对人类多元文

化的尊重和分享的伦理态度,把这种伦理态度与对人类的关怀、健康的审美趣味结合起来,过度的商业化绝对不是我们应有的取向。考察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会发现,他们在国际文化产业上的领先不是偶然的,越是文化创意产业非常集中、非常发达的地方,博物馆、艺术展会就越是发达,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也越发活跃。我们如果只重视知识的教育,而社会整体的文化创意环境缺失,就会失去原创的源头<sup>[13]</sup>。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我国“十二五”规划,出台相关政策积极营造当地良好的文化氛围,依托博物馆、文艺馆,通过先进的媒体手段等弘扬本地区的优秀特色文化。

#### 3. 知识产权保护贯穿始终

文化创意产业的真正核心在于创新和创造力,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保护,开发与运用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意转换的关键。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没有相关法律制度作为保护,将出现无序竞争的局面,这势必极大地打击新创意设计,形成“剽窃抄袭—恶性压价—无力创新—继续抄袭”的恶性循环,其后果是“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制约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实现产权保护需要增强社会公众和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创意方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广泛采用防伪标签、数字加密等技术措施对创作成果进行保护,对新技术和新产品及时进行商业秘密保护或申请专利。政府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力度,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生动案例,针对企业和个人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创新精神、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sup>[14]</sup>

要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知识产权涉及保障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执法及资讯自由流通等多个层面。例如,英国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多方面的知识产权,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网站,提供使用者和创作者关于版权、商标、专利及设计等信息,以促进资讯的自由流通。我国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低,盗版现象严重,若不加以控制将会严重削弱创新的积极性。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空间<sup>[15]</sup>。

#### 4. 加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的智慧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资源,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要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人才培养不仅要重视职业技能,更要关注其思想认识的提

高。要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使其充分认识文化创意产业,了解文化创意人群。因为文化创意阶层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创意人本身,更直接受制于社会大众的认可 and 接受程度。整个社会应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多元文化氛围。

其次,相关政府部门要推进高等院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促使高校培养出更多与市场接轨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同时,政府和行业协会还要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人才资格认证系统。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兴产业,会产生很多的职业门类,对于新职位的涌现,政府部门要对其进行资格认证,规范文化创意人员的素质标准和创意人才市场。

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性、开放性的特点使其发展不仅需要内部资源的支持,更需要外部资源不断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增加新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相关人才,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合理流动。抓好住房、子女入学、落户等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的完善与落实,以适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硬件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来集聚文化创意人才,从而形成一支由国内外优秀文化创意类人才组成的创业团队。<sup>[16]</sup>

### 5. 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含量

文化创意产业与高科技是互动共生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经济社会更好地将科学技术融入到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并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经济保障和智力支持。科学技术除了直接促进部分创意产业的诞生和发展之外,还通过通讯技术、媒体展示等功能为许多创意经济提供良好的交流和传播平台,间接地促进创意经济整体发展。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首先要抓住重点,以科技创新引领广电、通讯、信息等产业突进,以内容生产为纽带,推动产业格局重组,使网络文化产业走向前台。要打造网络内容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产生的产业链条,使文化创意产业真正成为信息产业的高端。其次,要开发应用文化传媒领域最尖端、最前沿的技术业务。另外,还要利用新技术,形成文化科技优势,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升级。<sup>[18]</sup>

### [参 考 文 献]

- [1] 陈要立. 后金融危机时期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02.
- [2] 罗欣. 创意产业发展指数研究初探[C]//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农学通报期刊社,2006.
- [3] 于启武. 北京文化创意指数的框架和指标体系探讨[J]. 艺术与投资,2008(12):67.
- [4] 冯根宪. 城市创意指数测度指标体系设计[J]. 商业时代,2009(10):114.
- [5] Richard Florida, Irene Tinagli. Europe in the Creative Age, Pittsburgh, Carnegie Mellon Software Industry Center [M]. London: Demos, 2004.
- [6] 陈颖, 高长春, 张科静. 浙江省创意指数及指标体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2):116.
- [7] 张科静, 仓平, 高长春. 基于TOPSIS与熵值法的城市创意指数评价研究[J]. 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1):81.
- [8]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 香港创意产业基线报告[EB/OL]. (2003-09-16) [2012-06-15]. <http://sc.info.gov.hk>.
- [9]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 2006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 [10] 黄娟, 王玉帅. 北京创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探析[J]. 特区经济, 2010(9):66.
- [11] [美]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 [12] 蔡荣生, 王勇. 国内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9(8):77.
- [13] 吴予敏. 高等教育的滞后制约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4):65.
- [14] 王海燕. 创意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J]. 特区经济, 2007(11):250.
- [15] 刘荣. 基于体验经济的我国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0(4):45.
- [16] 汤华杰. 加快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J]. 杭州科技, 2010(5):42.
- [17] 冯琪. 城市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 2010.
- [18] 李一森.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中的公共政策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 2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77-05

# 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周春巧

(郑州轻工业学院 财务处,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理论框架,利用2002—2011年度我国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分析出口退税率、汇率和国内原材料价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提高出口退税率有助于促进国内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增大国内社会福利水平;汇率和国内原材料价格水平与国内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呈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出口贸易;古诺数量竞争模型;汇率;出口退税率;原材料价格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增长迅速,201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9倍。其中,出口总额18986亿美元,增长4.8倍;进口总额17435亿美元,增长4.9倍。2003—2011年,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1.7%,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进口年均增长21.8%。2011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5%,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并且连续3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攀升,2002年外贸依存度为58.6%,2011年上升到65.9%。由于外贸依存度过高,加之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需求减少,以石油、铁矿石为代表的国内外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我国经济增长受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十分明显。

鉴于目前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出口贸易的增长问题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内众多学者也对影响出口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从汇率和出口退税两方面来研究影响出口的因素,原材料价格对出口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

综观国内有关文献,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是否成立及汇率的波动对出口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两个

方面,所采用的模型主要有向量自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等。由于采用的计量方法、模型和样本数据不同,所得结论也不一致。厉以宁等<sup>[1-3]</sup>的研究认为,我国进出口价格弹性大于1,人民币贬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状况。邹吉华<sup>[4]</sup>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的影响有正有负,对我国总出口、工业品出口及矿物燃料出口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对食品、烟草及饮料出口具有正面影响。陈华<sup>[5]</sup>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影响,对进口的影响小于国家进口政策的影响程度。姚允柱等<sup>[6]</sup>利用1981—200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中国及28个省际间进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商品出口影响不大,对不同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现象。

国内对出口退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退税政策的效应分析,所采用分析方法大多是定性的分析方法。张阳<sup>[7]</sup>就出口退税对财政、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定性分析。杨旖旎<sup>[8]</sup>对出口退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定性的正负两方面分析。实证研究基本采用的是隆国强替代分析法,运用退税率与汇率对出口产品成本的某种替代作用,推论出退税率的出口效应。隆国强<sup>[9]</sup>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与汇率贬值1%所带

[收稿日期] 2012-08-20

[作者简介] 周春巧(1977—),女,河南省泌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会计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来的经济效应是一致的,间接测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出口总额、GDP增长、国内税收总额的积极作用。采用隆国强的方法,刘军、牛锐等<sup>[10-11]</sup>分别建立了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模拟出口退税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得出的结果基本类似。

本文拟从成本论的角度,将微观理论分析与实证相结合,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就汇率、出口退税和原材料价格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 二、汇率、出口退税率和原材料价格对出口的影响分析

James A. Brander等<sup>[12]</sup>把国际古诺寡头模型引入第三市场模型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有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两个寡头生产同质商品,共同在第三国市场竞争。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出口补贴可以使国外企业的利润部分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基于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利用汇率、出口退税率和原材料价格来构建一个模型,以考察这三个因素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 1. 理论模型

假设存在国内和国外两个下游生产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国内企业用国外半成品和本国其他的生产要素生产最终产品,最终产品一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另一部分出口到第三方市场。国外企业同样使用国外的中间品和本国的其他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假设国内企业的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通过出口退税鼓励出口。假设在国内企业的原材料需求弹性为无穷大,国内要素市场基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同时假设汇率和中间品价格为外生变量,国内企业的进出口对汇率的影响趋近于0。

国内企业在国内销售的最终产品量记为  $D$ ,出口到第三方市场的部分记为  $E$ 。假设国外企业的全部最终产品用于出口到第三方市场,记为  $Y$ 。同时假定国内和第三方市场的需求函数为线性需求函数。反需求函数如下:

$$P_1 = a - bD \tag{①}$$

$$P_2 = \alpha - \beta(E + Y) \tag{②}$$

其中  $a, b, \alpha, \beta$  均大于0,  $P_1, P_2$  分别代表国内市场和第三方市场的价格。为简化分析,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里昂惕夫型一次奇次生产函数,1单位要素生产1单位的最终产品,国内和第三方市场是被有效分割的,则生产函数和国内企业的利润函数可以被表达成如下形式:

$$F = \min(M_f, M_d) \tag{③}$$

$$\pi^d = [(a - bD) - p_m - \varepsilon_d p_d]D - t p_m D + [\alpha - \beta(E + Y) - \varepsilon_d p_d] \times E -$$

$$(1 + t)p_m E + \gamma t p_m E \tag{④}$$

其中,  $M_f, M_d$  分别为进口的中间品和国内的原材料,  $\varepsilon_d, p_d, p_m$  为国内货币对第三国货币的汇率、进口中间品价格和国内原材料价格,  $t$  和  $\gamma$  分别为进口产品税率和出口退税率。在国内企业利润函数④中  $\varepsilon_d p_d$  表示把进口中间品的价格表示为第三国货币价格。国外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pi^f = [\alpha - \beta(E + Y) - p_m - \varepsilon_f p_f]Y \tag{⑤}$$

其中,  $\varepsilon_f, p_f$  为国外企业所在国的货币对第三方市场所在国货币的汇率和国外企业所在国的原材料价格。

基于以上假设,政府的行为目标是利用出口退税来补贴企业从而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对国内生产企业来说,它一方面以  $D$  单位的最终产品来供给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出口  $E$  单位的最终产品和国外企业在第三方市场进行古诺产量竞争。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求解国内企业的最优行为。

### 2. 比较静态分析

为求出国内生产企业的最优国内销售量  $D$  和出口量  $E$  及国外企业的最优产量  $Y$ ,运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从④⑤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 a - 2bD - (1 + t)P_m - \varepsilon_d p_d = 0 \tag{⑥}$$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 \alpha - \beta(2E + Y) - \varepsilon_d p_d -$$

$$P_m(1 + t - \gamma t) = 0 \tag{⑦}$$

$$\frac{\partial \pi^f}{\partial Y} = \alpha - \beta(E + 2Y) - \varepsilon_f - P_m = 0 \tag{⑧}$$

二阶必要条件: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D^2} = -2b < 0 \tag{⑨}$$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E^2} = -2\beta < 0 \tag{⑩}$$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Y^2} = -2\beta < 0 \tag{⑪}$$

稳定性条件: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E \partial Y} = -\beta < 0 \quad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Y \partial E} = -\beta < 0 \tag{⑫}$$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D^2}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Y \partial D} \quad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E^2}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Y \partial E}$$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Y^2} <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D \partial Y} \quad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Y^2} <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E \partial Y} \tag{⑬}$$

$$H = \begin{vmatrix}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D^2}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E \partial D}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Y \partial D}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D \partial E}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E^2} & \frac{\partial^2 \pi^d}{\partial Y \partial E} \\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D \partial Y} &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E \partial Y} & \frac{\partial^2 \pi^f}{\partial Y^2} \end{vmatrix} = \begin{vmatrix} -2b & 0 & 0 \\ 0 & -2\beta & -\beta \\ 0 & -\beta & -2\beta \end{vmatrix}$$

$$= -6b\beta < 0 \quad (14)$$

从稳定性条件⑫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企业其边际利润随着另一个国家企业产量的上升而下降。式⑬表明自身产量的变化对企业边际利润的影响小于其他企业产量变化对自身边际利润的影响。式⑭是海赛矩阵的行列式,该行列式小于0,加之 $-2b < 0$ ,表明海赛矩阵是负定的,符合利润最大化条件。

从式⑨⑩⑪可以得出  $D, E, Y$  的最优值:

$$D^* = \frac{a - \varepsilon_d p_d - (1+t)P_m}{2b} \quad (15)$$

$$E^* = \frac{\alpha + p_m(2\gamma t - 2t - 1) - 2\varepsilon_d p_d + \varepsilon_f p_f}{3\beta} \quad (16)$$

$$Y^* = \frac{\alpha + p_m(t - \gamma t - 1) + \varepsilon_d p_d - 2p_f \varepsilon_f}{3\beta} \quad (17)$$

在最优产量条件下,做比较静态分析,将式⑮⑯⑰对  $r, p_d, p_f, \varepsilon_d, \varepsilon_f$  分别求导: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D^*}{\partial \gamma} &= 0 & \frac{\partial D^*}{\partial p_d} &= -\frac{\varepsilon_d}{2b} & \frac{\partial D^*}{\partial p_f} &= 0 \\ \frac{\partial D^*}{\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p_d}{2b} & \frac{\partial D^*}{\partial \varepsilon_f} &= 0 \end{aligned} \quad (18)$$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E^*}{\partial \gamma} &= \frac{2tp_m}{3\beta} & \frac{\partial E^*}{\partial p_d} &= -\frac{2\varepsilon_d}{3\beta} & \frac{\partial E^*}{\partial p_f} &= -\frac{\varepsilon_f}{3\beta} \\ \frac{\partial E^*}{\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2p_d}{3\beta} & \frac{\partial E^*}{\partial \varepsilon_f} &= \frac{p_f}{3\beta} \end{aligned} \quad (19)$$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Y^*}{\partial \gamma} &= -\frac{tp_m}{3\beta} & \frac{\partial Y^*}{\partial p_d} &= \frac{\varepsilon_d}{3\beta} & \frac{\partial Y^*}{\partial p_f} &= -\frac{2\varepsilon_f}{3\beta} \\ \frac{\partial Y^*}{\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p_d}{3\beta} & \frac{\partial Y^*}{\partial \varepsilon_f} &= -\frac{2p_f}{3\beta} \end{aligned} \quad (20)$$

基于式⑱⑲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出口退税税率的高低与国内企业在国内的销售量无关。原因在于生产函数的假设是边际成本不变。出口退税有助于增加国内企业的出口量。国内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与国内企业的最终产品产出呈负相关关系。

(2) 提高出口退税率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最终产品的出口量,减少国外企业最终产品出口量。一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与另一国家企业的最终产品的出口呈正相关关系,与本国最终产品出口呈负相关关系。国外企业所在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和原材料价格与国内企业销售到国内的最终产品数量无关。

从式⑮⑯⑰可以看出,在最优化条件下,  $D^*, E^*, Y^*$  都是  $\gamma, \varepsilon_d, \varepsilon_f, p_d, p_f$  的函数。把⑮⑯⑰代入国内企业利润函数中,  $\pi^d$  就是  $D^*, E^*, Y^*, \gamma, \varepsilon_d, \varepsilon_f, p_d, p_f$  的函数,即  $\pi^d = \pi^d(D^*, E^*, Y^*, \gamma, p_d, p_f, \varepsilon_d, \varepsilon_f)$ 。将国内企业利润函数  $\pi^d$  对  $\gamma, \varepsilon_d, \varepsilon_f, p_d, p_f$

分别求偏微分可得

$$\frac{\partial \pi^d}{\partial p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cdot \frac{\partial D^*}{\partial p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cdot \frac{\partial E^*}{\partial p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Y^*} \cdot \frac{\partial Y^*}{\partial p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p_d} = -\frac{4\varepsilon_d}{3}E^* - \varepsilon_d D^* < 0 \quad (21)$$

$$\frac{\partial \pi^d}{\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cdot \frac{\partial D^*}{\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cdot \frac{\partial E^*}{\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Y^*} \cdot \frac{\partial Y^*}{\partial \gamma} +$$

$$\frac{d\pi^d}{d\gamma} = \frac{4}{3}tp_m E^* > 0 \quad (22)$$

$$\frac{\partial \pi^d}{\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cdot \frac{\partial D^*}{\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cdot \frac{\partial E^*}{\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Y^*} \cdot \frac{\partial Y^*}{\partial \varepsilon_d} +$$

$$\frac{d\pi^d}{d\varepsilon_d} = -\frac{4p_d E^*}{3} - p_d D^* < 0 \quad (23)$$

$$\frac{\partial \pi^d}{\partial \varepsilon_f}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cdot \frac{\partial D^*}{\partial \varepsilon_f}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cdot \frac{\partial E^*}{\partial \varepsilon_f}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Y^*} \cdot \frac{\partial Y^*}{\partial \varepsilon_f} +$$

$$\frac{d\pi^d}{d\varepsilon_f} = \frac{2p_f E^*}{3} > 0 \quad (24)$$

$$\frac{\partial \pi^d}{\partial p_f}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D^*} \cdot \frac{\partial D^*}{\partial p_f}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E^*} \cdot \frac{\partial E^*}{\partial p_f}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Y^*} \cdot \frac{\partial Y^*}{\partial p_f} +$$

$$\frac{d\pi^d}{dp_f} = \frac{2\varepsilon_f E^*}{3} > 0 \quad (25)$$

可见,对国外企业的分析正好与对国内企业的分析相反,随国外竞争企业的利润随着出口退税率、所在国要素价格、所在国货币汇率的上升而下降,随国内要素价格和汇率的上升而上升。

(3) 提高出口退税率可以增加国内企业的利润额,减少国外竞争企业的利润额。

### 3. 福利最大化时的变量分析

如果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包括消费者剩余(CS)、生产者剩余(以生产者利润表示)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可分别表示为

$$CS = \frac{b}{2}D^{*2} \quad (26)$$

$$\begin{aligned} \pi^d &= [(a - bD^*) - p_m - \varepsilon_d p_d]D^* - tp_m D^* + \\ &[\alpha - \beta(E^* + Y^*) - \varepsilon_d p_d]E^* - \\ &(1+t)p_m E^* + \gamma tp_m E^* \end{aligned} \quad (27)$$

$$TR = tp_m D^* + t(1 - \gamma)p_m E^* \quad (28)$$

则社会福利函数可表示为

$$\begin{aligned} W &= CS + \pi^d + TR = (a - \frac{b}{2}D^* - p_m - \varepsilon_d p_d) \times \\ &D^* + [\alpha - \beta(E^* + Y^*) - p_m - \varepsilon_d p_d]E^* \end{aligned} \quad (29)$$

对于政府而言,可控制的变量有  $\varepsilon_d, p_d, \gamma$ ,在这3个变量中只有  $\gamma$  政府容易控制,  $\varepsilon_d$  和  $p_d$  政府不易控制。原因在于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汇率是浮动汇率制度,为了改善出口结构,恶意改变本国货币的汇率会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同时由于国际贸易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要素价格的联

动性越来越强,为了增加出口而压低国内要素价格也是不现实的,况且还可能引起出口目的国的反倾销调查。在WTO框架下,调整出口退税率才是政府改变出口产品结构、改善贸易环境的有效手段。

以出口退税率为变量,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 W}{\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CS}{\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pi^d}{\partial \gamma} + \frac{\partial TR}{\partial \gamma} = \frac{tp_m E^*}{3} + \frac{2t^2 p_m^2 (1-\gamma)}{3\beta} = \frac{tp_m}{3\beta} [2tp_m(1-\gamma) + \beta E^*] = 0 \quad (30)$$

二阶条件为

$$W(\gamma\gamma) = \frac{\partial^2 W}{\partial \gamma^2} = -\frac{2(tp_m)^2}{9\beta} < 0 \quad (31)$$

从③①式可以得出

$$\gamma^* = 1 + \frac{\beta E^*}{2tp_m} > 1 \quad (32)$$

考虑到 $\gamma$ 是出口退税率,如果 $\gamma < 0$ ,则意味着政府对出口最终产品征收出口税;如果 $0 < \gamma < 1$ ,说明政府对出口的最终产品征收部分出口税;如果 $\gamma > 1$ ,则意味着政府对出口最终产品进行补贴。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根据式③②,政府必须使 $\gamma > 1$ ,即不但要对出口最终产品征收的税额全部返还,同时还要进行补贴。

### 三、实证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出口退税率与国内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原材料价格和汇率变动与国内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为了验证该结论,我们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X_t = \beta_1 + \beta_2 P_t + \beta_3 NCR_t + \beta_4 TR_t + \varepsilon_t \quad (33)$$

其中, $EX_t$ 、 $P_t$ 、 $NCR_t$ 、 $TR_t$ 、 $\varepsilon_t$ 分别代表出口额、出口产品相对价格、名义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率和误差项。

#### 1. 数据来源

国内出口退税率的变动不是连续性的,本文用

表1 2002—2011年中国出口额EX、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R、出口退税率TR、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NER变动情况

年份	EX	RER	TR	NER	lnTR	lnRER	lnNER	lnEX
2002	3 255.700	102.640 00	1 259.200	827.700 0	7.138 232	4.631 228	6.718 651	8.088 163
2003	4 383.700	97.290 00	2 039.000	827.700 0	7.620 215	4.577 696	6.718 651	8.385 648
2004	5 933.700	96.920 00	3 700.300	827.680 0	8.216 169	4.573 886	6.718 627	8.688 403
2005	7 620.000	97.070 00	3 371.600	819.170 0	8.123 143	4.575 432	6.708 292	8.938 532
2006	9 690.700	86.790 00	4 284.900	797.180 0	8.362 852	4.463 491	6.681 081	9.178 922
2007	12 180.100	99.000 00	5 273.300	760.400 0	8.570 412	4.595 120	6.633 845	9.407 559
2008	12 330.500	98.700 00	5 230.400	686.200 0	8.636 169	4.593 586	6.613 589	9.410 523
2009	12 017.900	99.100 00	5 060.800	683.630 0	8.163 153	4.591 120	6.105 623	9.468 556
2010	13 948.100	98.900 00	5 680.600	682.750 0	8.862 552	4.587 396	6.721 456	9.468 796
2011	18 986.200	99.300 00	6 100.300	622.680 0	8.960 412	4.595 320	6.836 521	9.478 962

国家出口退税额进行代替。出口额和出口退税额数据采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当期价格数据。相关数据见表1。

#### 2. 平稳性检验

为了减少异方差性,降低自相关性,本文计量模型采用对数数据形式。为防止伪回归,首先对变量EX、RER、TR、NER进行平稳性检验。运用软件Eviews5.1对4个变量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检验结果表明,4个变量的P值都大于0.1,其T统计量(ADF值)均大于10%置信水平时的临界值,说明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4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对4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滞后项取0,发现P值均小于0.01,各个变量的T统计量均小于在1%置信水平下的值,说明即使在1%的置信水平下,4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并且都是一阶单整的。

#### 3. 协整分析

为检验变量lnEX、lnNER、lnRER、lnTR在长期是否具有稳定关系,本文对模型③③式进行协整分析。由于4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对其进行OLS回归,结果如下:

$$\begin{aligned} \ln EX = & -4.9 + 0.771 \ln TR(-1) + 1.02 \times \\ & \ln RER(-2) + 0.46 \times \ln NER \quad (34) \\ & (19.038 70) \quad (4.432 361) \quad (2.203 224) \\ & 0.039 798 \quad 0.223 980 \quad 0.209 215 \\ R^2 = & 0.984 798 \quad \text{调整 } R^2 = 0.981 938 \\ DW = & 1.621 086 \quad F = 345.074 1 \end{aligned}$$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明显大于2,DW值大于5%置信水平临界值1.669,说明不存在自相关。调整拟合优度为0.981 938,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残差进行ADF检验,其T统计量为-4.931 047,小于1%置信水平临界值-3.829 511,说明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进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2 数据平稳性检验

变量	(C,L,T)	1% 置信水平	5% 置信水平	10% 置信水平	T 统计量	P 值
lnEX	C,0,0	-3.779 597	-3.004 861	-2.650 413	-1.354 449	0.999 0
D(lnEX)	C,0,0	-3.789 130	-3.020 686	-2.646 119	-3.861 138	0.008 3
lnTR	C,0,0	-3.759 597	-3.012 363	-2.642 242	-1.897 258	0.317 3
D(lnTR)	C,0,0	-3.789 030	-3.004 861	-2.646 119	-4.358 735	0.002 9
lnRER	C,0,0	-3.810 346	-3.012 363	2.634 222	-2.310 287	0.178 4
D(lnRER)	C,0,0	-3.978 030	-3.012 363	-2.646 119	-4.027 102	0.005 8
lnNER	C,0,0	-3.869 597	-3.004 861	-2.632 242	-2.595 548	0.107 8
D(lnNER)	C,0,0	-3.736 030	-3.012 363	-2.646 119	-4.130 528	0.004 6
e <sup>1</sup>	C,1,0	-3.829 511	-3.029 970	-2.655 194	-4.931 047	0.001 0

从式子⑭可以看出,出口退税额和名义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出口量变化的影响明显存在着滞后性。这是由于企业出口合同的签订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不能够完全同步,加上出口退税办理有时滞,企业产品出口之后不能立即获得相应的出口退税,这就导致当期的出口退税对应的是前2期的企业出口额。本文用实际有效汇率来代替出口相对价格。企业对当期实际有效汇率反应不敏感,往往使得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无法在出口合同签订时立即体现出来。从式⑭还可以看出,出口退税额与出口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系数表明贸易出口对出口退税的弹性为0.77,出口退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出口增加0.77个百分点。由于汇率数据采用的是用人民币标价的汇率,表明美元的升值与我国出口正相关。由于采用的是对数形式,系数的相反数即为用美元表示的人民币汇率系数,也就是说汇率的变动与出口额的变动负相关,其弹性系数为0.46,说明人民币每贬值1个百分点,出口将增加0.46个百分点。

#### 四、结论

本文在对古诺模型拓展的基础上,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验证了出口退税率、汇率、国内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推导出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下,政府应通过出口退税与补贴来促进国内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运用我国2002—2011年相关数据分析汇率、出口退税率、相对价格水平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提高出口退税率有助于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大国内企业

的利润量,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国内原材料价格的相对上涨不利于企业扩大产品出口,国内货币的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

#### [参 考 文 献]

- [1] 厉以宁. 论汇率调整时机的选择[J]. 经济学家, 1991(1):33.
- [2] 陈华. 人民币汇率对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 1998(5):34.
- [3] 王世文, 张明华. 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进出口的稳定性[J]. 生产力研究, 2001(4):77.
- [4] 邹吉华. 人民币汇率波动及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0(5):16.
- [5] 陈华.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 甘肃社会科学, 2003(4):80.
- [6] 姚允柱, 张国强.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区域间贸易收支的影响[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6(4):51.
- [7] 张阳.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效应分析[J]. 税务与经济, 2006(1):23.
- [8] 杨旖旎.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 商场现代化, 2005(15):179.
- [9] 隆国强.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效应分析[J]. 国际贸易, 1998(7):22.
- [10] 刘军, 张志忠. 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1):25.
- [11] 牛锐. 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J]. 西安金融, 2002(3):28.
- [12] James A Brander, Barbara J 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1):8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82-05

# 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区域化品牌建设

——从竞争优势理论的视角切入

张志坚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有重要价值,但其性质、处境特殊,生存状况堪忧,其发展策略的制定颇为不易。区域化品牌建设可帮助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取得成本优先、标歧立异、目标聚集的竞争优势。这一策略要求它以区域化作为总的发展方向,发掘区域资源,找准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区别点,做好品牌定位,还要求它应通过有特色的内容、有个性的表现形式来打造高品质新闻节目,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独特的品牌个性。

**[关键词]** 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区域化品牌;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 G229.2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6

近年来,省级卫视改革改版搞得轰轰烈烈,省级卫视总体上取得了较大发展,其影响日隆,收视份额和广告收入逐年增加,然而其新闻节目始终未能走上发展的正轨,其生存和发展有内忧外患之虞:内部环境,省级卫视的发展策略以娱乐节目为主,新闻节目被边缘化;外部竞争环境也不容乐观,它要面对央视新闻节目的巨大竞争压力,要应对地面频道新闻节目在地方市场的挤入,一旁还有海外新闻传媒的虎视眈眈。但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有其重要价值:它是我国电视新闻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发展既是政治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公共利益和受众权益,对省级卫视自身发展亦有积极意义。2011年底,广电总局下发了被人们俗称为“限娱令”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该意见除了限制上星频道娱乐节目播出量外,还强调了新闻节目的重要地位,要求上星频道增加新闻节目播出量。意见重申“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是以新闻宣传为主的综合频道”,要求“从2012年1月1日起,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日6:00—24:00新闻类节目不得少于2小时;18:00—23:30必须有两档以上自办新闻类节目”<sup>[1]</sup>。这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省

级卫视新闻节目的重视,并重新引发了关于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发展策略的思考。

面对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发展难题,本文引入竞争优势理论,结合品牌学、新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省级卫视的属性、职能、生存环境、发展机遇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分析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竞争优势生成和优化的机制,探讨其发展策略。竞争优势的概念于1939年由英国学者张伯伦引入经济学领域,1980年代中期,美国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使它开始大行其道。波特认为:“竞争优势归根结底产生于企业为客户所能创造的价值:或者在提供同等效益时采取相对的低价格,或者其不同寻常的效益用于补偿溢价而有余。”<sup>[2](P1)</sup>其代表作“竞争三部曲”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阐述企业如何制订和实施竞争战略,并将其转化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具体实施步骤。鉴于竞争优势理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被广泛地证明了其有效性,1990年代初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1997年前后,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波特的“竞争三部曲”,使得该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隆,在各学术领域的运用全面铺开,从宏观的国家竞争战略、区

[收稿日期] 2012-07-16

[作者简介] 张志坚(1976—),男,福建省泉州市人,华侨大学讲师,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视新闻、新闻传播法。

域经济发展策略、产业发展规划的探讨,到微观的企业运营、地方旅游业发展对策甚至幼儿园管理的研究都可见到该理论的运用。在媒介管理领域,有不少探讨媒介竞争优势的论文,但真正使用该理论的并不多,更多的研究成果只是在日常熟语的层面来运用这一概念。电视新闻节目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对该理论运用则更少,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战略管理研究领域运用这一理论的至今未见报道。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以期在方法论和实际操作上有所贡献。

## 一、竞争景框中的省级卫视新闻节目透视

在电视新闻竞争中,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况。在全国性新闻节目方面,省级卫视同央视相比,在新闻采编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例如2011年1—8月,央视新闻时事类节目占据全国67.6%的市场份额<sup>[3]</sup>,其他几十个上星频道的市场份额不到35%。除了东方卫视等少数省级卫视外,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在全国市场上存在成本高、市场基础差、目标涣散等不足,难以取得竞争优势。然而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又不能单纯走区域新闻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还有通过上星而产生的可以覆盖全国的渠道优势,存在着发展成全国性节目的可能。如果只做区域新闻,则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浪费覆盖优势,背离了其上星的初衷。二是地面频道的区域性更强,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在这样的竞争中难以有多少优势。如2010年,在广东省,广东卫视的《广东新闻联播》市场份额只有0.255%,而同时段珠江台的《630新闻》市场份额有1.501%;在上海市,东方卫视的《东方新闻》市场份额为0.688%,而上海新闻综合频道的《新闻透视》市场份额为2.326%。<sup>[4]</sup>三是无法完成向全国宣传本省这一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既定的传播任务。这样看来,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发展战略的制订的确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况。而我们看到的事实状况也是多数省级卫视没能制订恰当的新闻节目发展战略,使得其新闻节目处于一种被央视、地方频道和凤凰卫视“夹在中间”的状况。那么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有哪些可利用的资源,应该如何界定自己的市场位置,如何制订恰当的发展策略,如何在这种上挤下压的新闻竞争中取得优势呢?竞争优势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

基本战略,即成本领先、标歧立异、目标聚集,并将这三种战略的基本关系以竞争景框表示出来(见图1)。<sup>[2](P11)</sup>

		竞争优势	
		相对低成本	标歧立异
竞争景框	广景目标	1.成本领先	2.标歧立异
	狭景目标	3A.成本集聚	3B.歧异集聚

图1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基本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要求生产者“发现和开发所有成本优势的资源”;标歧立异战略是企业选择一种或者多种特质,并“因其独特的地位而获得溢价的报酬”;而目标聚集战略则是指企业并不拥有全面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致力于寻求目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sup>[2](P12,P24,P15)</sup>如果企业不能获得成本领先,又没有特质,则会陷入“夹在中间”的状况,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当然这三种战略有时是可以兼而得之的,例如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取得较高的生产率,生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占领某一细分市场,便可同时获得目标聚集、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的竞争优势。各种竞争优势的聚集会带来收益的累加,企业将会获得巨额的回报,使得它成为产业中的佼佼者。波特将同时获得多种竞争优势视为战略管理的高境界,他认为企业“应该一直积极探索所有不牺牲经营歧异性的节约成本的机会……也应该追求不以付出高昂成本为代价的标歧立异的机会”<sup>[2](P21)</sup>。

从竞争理论的视角审视,分析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属性、资源优势及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寻找可能同时获得目标聚集、成本领先、标歧立异三种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帮助它成为产业中的佼佼者,是制订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在本省区域内,省级卫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重要宣传机构,是各省政府、党委领导的事业单位,是各省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属性虽然在某些方面束缚了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发展,但也将省级卫视送上了所在省“第一电视媒体”的位置,帮助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形成一定的区域优势,使得它在本省新闻的采、编、播等方面拥有其他电视媒体所不具备的资源优势。这就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新闻资源,也可通过其在本省的独特地位,排他性地获得竞争对手难

以获取的信息,这就使得它获得了“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的优势。因此在制订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发展策略时,它的这一优势是不可忽略的要素。然而如上文所述,它又不能单纯走区域新闻的发展道路,否则它无法完成向全国宣传本省的既定任务,也浪费上星的优势,还会在与地面频道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在这种状况下,区域化品牌建设成为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既能深耕区域资源、又能突破区域限制而获得多种竞争优势的发展策略。

## 二、区域化品牌建设:省级卫视新闻节目获得多种竞争优势的可行战略

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区域化品牌建设指的是,省级卫视通过充分发掘所在区域的新闻资源,深入探索所在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特色,做好品牌定位,并将这些区域特色融入节目中,通过有特色的内容、有个性的表现形式来打造高品质新闻节目,塑造独特的品牌个性,从而提高受众的忠诚度和传播效果,稳固在区域市场中的位置,并逐步扩大传播范围,向全国性新闻节目发展的策略。这一策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区域化,它“是相对本地化和全国化而言,它是本地化的延伸,是全国化的过渡,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化”<sup>[5]</sup>。第二个层面是品牌建设,它要求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立足于区域,塑造品牌个性,打造名牌节目,以尽量避免惨烈的同质化竞争,在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实现市场、文化价值最大化。区域化品牌建设可让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发现和开发区域资源”这一最大的成本优势,让其处于成本领先地位;而立足于区域的差异化品牌定位将有助于其标歧立异;稳固区域市场后,再瞄准全国市场的策略,又将使得其获得目标聚集的优势。因此区域化品牌建设将有利于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同时取得低成本、歧异性和聚集性三种竞争优势,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具体而言,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区域化品牌建设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1. 做好品牌定位,塑造鲜明品牌个性,保障新闻节目的标歧立异。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应该在对自身性质、功能、资源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对受众和市场进行调查的基础之上,设定发展的方向,并与消费者积极沟通,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牢固占据受众心中新闻需求的某个位置,从而成功进行品牌定位。如上文分析,区域化应当是品牌定位的主要方向,区域化既体现在省级卫视对目标市场和新闻活动范围的定位,也体现在新闻节目的内容、风格上。

这就要求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在市场范围和新闻活动范围的大小、内容选择的普适性和区域性、风格的大众化和特色化等问题上把握好度,作出精准判断和定位,避免“夹在中间”的境况。此外,还要求设计口号、标识、色彩等品牌符号系统,强化其品牌形象,提高受众的品牌忠诚,最终取得“标歧立异”的竞争优势。例如福建的东南卫视根据自身区域优势,主打台湾牌,创办《海峡新干线》等涉台新闻栏目,这些栏目在主持风格、镜头运用等方面着力突出浓浓的台湾味,内容和风格富有特色,终于从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富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

2. 实行目标聚集战略。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在发展初期可将市场范围聚集于本区域,品牌形象塑造上宜集中单一,品牌个性应鲜明,以利于受众对品牌的认知,在选择内容和确定报道形式时,应当让它们指向集中,以利于获得成本聚集和歧异聚集的竞争优势。旅游卫视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该频道突破了多数卫视所走的综合频道路线,将发展目标集中于旅游休闲领域,新闻节目主打旅游和时尚牌,这一策略使得新闻实力相对弱小的旅游卫视,也能以其鲜明的专业化特色和集中的指向,聚拢数量不少的中高端受众。

3. 深入发掘自身资源,以成本领先为导向塑造品牌形象。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可以围绕以下几点来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品牌个性:权威、特色、亲和、深度。首先,权威指的是省级卫视应当树立自己作为所在区域新闻权威发布者的品牌形象。省级卫视是其所在省电视的旗舰,它在所处区域内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是其重要资源,塑造权威形象正是在成本分析后的理性选择。其次,特色包括内容的特色和表现形式的特色。打造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特色可从区域文化寻找源泉,如北京卫视新闻节目的重时政、好评论,广东卫视的重实利、尚开放,东南卫视的闽台风味,东方卫视的国际视野,都是发现和开发成本优势资源取得成本领先的成功例证。再次,亲和指的是通过内容的贴近、态度的平易、形式的灵活,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进一步发挥区域成本优势。最后,深度是对新闻的深加工,它可弥补省级卫视全国性新闻采集能力不足、时效性无法与央视相比的缺陷,是一种低成本的塑造高品质、高品位品牌形象的方法。

## 三、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打造区域化品牌的新闻业务变革

迈克尔·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

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这些活动的每一种都对企业的相对成本地位有所贡献,并且奠定了标歧立异的基础。”<sup>[2](P33)</sup>他将这一系列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活动称为“价值链”,他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和优化最终都必须落实到这些价值链中的具体活动环节。<sup>[2](P36)</sup>要做好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区域化品牌建设,使它获得多种竞争优势,成为产业佼佼者,除了做好宏观规划外,同样必须落实具体新闻活动环节,采取积极有效的新闻业务措施,精心打造新闻节目,通过一批名牌节目形成品牌效应,赢得受众和市场。具体而言,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可通过以下新闻业务举措,来打造区域化品牌。

### 1. 塑造“大区域新闻”品牌形象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力量的强势影响,在多数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视界中,区域主要是行政区域,其新闻传播活动范围(新闻采集和有效传播范围)主要局限在本行政区域内,这就背离了信息传播和市场运行的规律。传播区域关注的是信息在整个意义共享空间的流动,而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求各种资源要素能自由配置,这都要求突破行政区域的局限。所以区域化品牌建设要求省级卫视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大区域”做新闻。一些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东南卫视地处福建,它抓住毗邻台湾的区位优势,深入挖掘所在区域(闽台区域)内最有价值的新闻资源——涉台新闻,创办了涉台新闻栏目,聘请台湾当地记者,并与台港澳媒体合作,较为成功地打造了“闽台大区域”传媒的品牌形象。广西卫视抓住广西是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流最前沿这一区位优势,深耕东盟话语,与东盟国家的媒体合作,在东盟十国设立记者站,创办多档报道东盟的新闻栏目,让广西卫视的传播腹地大大扩张。“大区域新闻”传播策略让广西卫视“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打造浓郁地域特色”<sup>[6]</sup>。

### 2. 打造品牌个性鲜明的分类新闻节目

央视的综合新闻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如2006年,其综合新闻制播量占据了全国的50%以上<sup>[7]</sup>,但是在各种分类新闻市场,除了财经新闻、体育新闻央视优势较大外,其他领域尚留下不少空间,省级卫视如果能根据受众的需要,把某一种分类新闻做足、做深、做透,则可以避开实力强劲的央视新闻节目的锋芒,又可以从内容角度塑造自己的品牌个性,使自己同竞争对手区别开。当然,省级卫视做什么样的分类新闻,要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来确定。1997年,山东卫视抓住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的区位优势,创

办了农业新闻栏目《乡村季风》,2001年该栏目获得第二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1998—2005年,它连续7年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全国优秀对农节目一等奖,在这档栏目的基础上甚至发展壮大出了一个频道——山东农科频道,其成功可见一斑。此外如湖南卫视的娱乐新闻、宁夏卫视的证券新闻、旅游卫视的旅游资讯等也都已经形成了品牌,在分类新闻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 3. 以个性化、风格化表现形式塑造新闻节目品牌个性

通过个性化表现形式来塑造新闻节目品牌个性,是成本较低、相对比较容易执行的策略,所以近几年省级新闻节目对这一办法多有采用。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自创办以来,该栏目就一直是全国同类节目的“领军人”,收视率高且稳定。除眼光独具的选材外,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个性化、风格化的语言表达。《传奇故事》使用的是带有较强文学色彩的口语,其语言蕴典雅优美于朴素真实之中,做到了深与浅、雅与俗的完美结合,如主持人金飞比喻的那样“像是南昌特色的砂钵汤,外表不起眼,但品起来,醇味悠长”<sup>[8]</sup>。胡智锋评价道,“《传奇故事》通过打造自己的优质性、独特性”,实现了“品牌的不可替代性”<sup>[9]</sup>。安徽卫视的《超级新闻场》、辽宁卫视的《说天下》、北京卫视的《第七日》、四川卫视的《新闻连连看》、湖南卫视的《晚间》、吉林卫视的《午间道》等深受人们欢迎的栏目,或从报道方式,或从新闻语态,或从镜头运用,或从色彩运用等方面尝试了新闻表现形式的个性化、风格化,使得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呈现多姿多彩的景象。

### 4. 以深度报道和批评性报道塑造高品质新闻节目品牌形象

在全国性新闻和国际新闻节目领域,央视和凤凰卫视拥有巨大优势,省级卫视在新闻的第一落点上难以与它们竞争,但省级卫视可在新闻的解释权上下工夫,以深度报道和批评性报道这两枚新闻节目的“深水炸弹”和“重磅炸弹”突入,扩大节目的影响力,在受众心目中建立高品位的品牌形象。这方面的典型是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该栏目于1989年开播(当时名为《社会聚焦》),至今已活跃于中国电视荧屏20多年,栏目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与它20多年来坚持“聚焦舆论监督,揭开新闻幕后”的方针、做好深度报道和批评性报道密不可分。这种难能可贵的坚持为它赢得了声誉和尊重,其报道的深度和批评的力度使它“纵横南粤大地,成为

广东新闻舆论监督的排头兵”<sup>[10]</sup>,成为当之无愧的广东电视新闻第一品牌和全国著名的新闻栏目。此外,东方卫视的《深度105》、浙江卫视的《新闻深一度》、北京卫视的《特别关注》、云南卫视的《今日话题》、江西卫视《社会传真》等也都是优秀的深度新闻或批评性新闻节目。它们对提高省级卫视的品位、提升公信力、打造高端新闻节目品牌、汇聚高端受众、增加收入等,都很有意义。

#### 5. 做好重大新闻报道,迅速提升品牌价值

对重大新闻(特别是对发生于所在区域的)的报道,是省级卫视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这类新闻曝光率、关注度高,如果省级卫视能做好相关报道,客观上也是其跨出“省门”,在受众心目中迅速确立地位、占据市场的极好途径。四川卫视的新闻实力并不强,但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它倾尽全台力量,连续18天直播,“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纪录的新奇迹”<sup>[11]</sup>,出色的表现让它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也让它得到了回报,那段时间,四川卫视在省级卫视的收视排名从原来的第11名上升到第1名<sup>[12]</sup>,其品牌价值得到了提升。2008年湖南卫视在雨雪冰冻灾害报道中的表现也颇为典型。当时湖南卫视果断调整频道节目播出计划,集中力量进行抗灾抢险报道。报道所体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报道的能力,多少改变了人们对湖南卫视“只会做娱乐节目”的印象。可以说,重大事件的报道,是检验省级卫视新闻素质、社会责任感和频道整体水平的一块试金石,客观上,也是省级卫视新闻节目扩大影响、跨出“省门”、提升品牌价值并获得竞争优势的好时机。

## 四、结语

省级卫视是中国电视的重要力量和承接上下之关节点,它对中国电视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在我国特殊的体制下,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作用尚无可替代。它对一省的宣传工作,对所在区域公众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的保障,对新闻事业的整体勃兴,对维护文化多样性等方面,有重要意义。所以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如果整体凋零、全线退却,其消极影响恐怕将是深远的。中国的大众媒体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而新闻作为最敏感的领域,有很多问题尚未明朗,省级卫视新闻节目之“难”就是这一状况的映射,这个难题不是一时一日

用某种方案便可解决的。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将走向何方还很难预言,但其重要价值、作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它不应该在停滞和放任中衰微,而应该在积极有效的作为中迎来局势明朗的未来。引入包括竞争优势在内的各种理论,深入剖析省级卫视的属性、职能、市场环境、资源优势,以求新、求实的态度积极探索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发展战略,寻找恰当的发展路径,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笔者之所以不揣浅陋、置喙其中,亦是希望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和讨论,最终解决好这一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EB/OL]. (2011-11-09) [2012-01-05]. <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11/10/25/20111025170755801010.html>.
- [2] [美]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陈小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 [3] 丁明豪. 央视广告招标传达积极经济信号[EB/OL]. (2011-11-17) [2012-01-05]. <http://business.sohu.com/20111028/n323769731.shtml>.
- [4] 张莉. 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竞争策略分析[J]. 电视研究,2011(4):56.
- [5] 李新民. 差异化·区域化·品牌化——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台强台之路[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12):13.
- [6] 黄著诚. 依托地缘发挥优势 以东盟宣传促发展[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10):31.
- [7] 新浪娱乐. 白玉兰论坛之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报告实录[EB/OL]. (2011-11-15) [2012-01-05]. <http://ent.sina.com.cn/v/m/2007-06-13/ba1596203.shtml>.
- [8] 江西卫视官网.《传奇故事》主播金飞[EB/OL]. (2011-11-17) [2012-01-05]. <http://www.jxgdw.com/jxgd/jxtv/huodong/cqgs/zbjf/userobject1ai647607.html>.
- [9] 胡智锋,顾亚奇.《传奇故事》的成功之道[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2):46.
- [10] 王今,张步中. 纵横南粤大地 激荡民情民意——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舆论监督谈[J]. 中国电视,2007(3):61.
- [11] 俞杭英. 从抗震救灾报道看省级卫视的竞争格局[J]. 新闻实践,2008(7):14.
- [12] 岳森.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8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87-05

# 数字环境下电信、广电和出版 三大产业的融合与发展

麻娜娜

(北京印刷学院 新闻出版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 由于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在所提供的具体的信息产品或服务、使用的技术、市场领域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存在明显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和市场边界,1990年代之前,它们在产业分类上被区分为电信业、广电业和出版业三大类,形成三大产业分立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相关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迎来了产业融合浪潮,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数字环境下,电信业、广电业和出版业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产生了新的信息产品或服务。电信业的手机阅读发展势头良好,并以3G技术为依托,全面开发3G业务;广电业的电视节目数字化制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媒体集团渐成规模;出版业积极拓展数字出版领域,颠覆传统图书出版产业的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营销方式,利用新技术打造全媒体出版。这三大产业正在打破传统产业运作模式,呈现出一种新的产业经济形态。

**[关键词]** 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产业分立;产业融合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7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已成为现代传媒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者多从理论框架、路径选择、某一产业面临的困境及发展对策等方面对这一融合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拟在综合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成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业界发展动态,揭示这三大产业在数字环境下的产业融合趋势。

## 一、传统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的分立

机械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业时代(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生产与消费相分离,分工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固定边界的产业部门。这些固定化的产业边界与工业化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使工业技术的每一步发展都在生产上扩大了分工,并对这种固定化的产业边界起到进一步强

化作用,从而使产业边界越来越清晰。这种具有固定化边界的产业分工被称为产业分立。

产业边界是对产业分立进行分析的一个必要理论基础,然而产业边界这一概念在传统产业经济理论中并未明确提出。鉴于其对于研究产业分立的重要性,周振华<sup>[1]</sup>从理论抽象角度,确定产业边界的4种基本类型为: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和市场边界。技术边界,即每一个产业是用一种特定的技术手段及装备和与此相适应的工艺流程来生产某一种产品;业务边界,即每一个产业通过不同的投入产出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产品或服务,并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链;运作边界,即每一个产业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基础平台及其配套条件;市场边界,即每一个产业的交易是在一个特定的市场(包括其规模、区域等)通过不同的环节与流转方式进行。由于笔者认为运作边界和技术边界存在交叉之处,因此,本文着重就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和市场边界进行分析。

[收稿日期] 2012-09-09

[作者简介] 麻娜娜(1986—),女,回族,山西省晋城市人,北京印刷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学、书刊编辑。

据此,尽管电信、广电和出版三大产业提供的产品都可划归为信息产品或服务,但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使用的技术、市场领域等有很大差异,存在明显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运作边界和市场边界。因此,像其他产业部门一样,1990年代之前,它们在产业分类上通常被区分为电信业、广电业(广播电视业)和出版业三大类。

就技术边界而言,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分立集中表现在信息传送平台、信息接收终端的差异性。在信息传送平台方面,这三个产业拥有各自独立的传递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网络平台。如电信业的电信网、广电业的广播电视网、出版业的有形分发网。在信息接收终端方面,这三个产业提供信息产品的终端设备均为专用设备,用户只能使用特定的设备接收特定的信息。例如,接收双向语音信息需要使用电话机;接收单向声音和图像需要分别使用收音机和电视机;接收单向的文字信息需要文本资料。尽管信息产品和传送网络会存在交叉现象,如传送双向文件和数据既可通过电信业的电信网,也可通过出版业的有形分发网,但从总体上来看,不同的信息产品与其传输网络和接收终端基本上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就业务边界而言,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分立表现在分别提供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电信业提供的是点对点的信息传递,通常指电话、电报、传真等,信息在特定用户——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进行相互交换;广播电视业提供的是声音、图像等信息服务;出版业提供的是书、报、刊、CD等产品。这些信息产品或服务针对的是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不具有替代性。

就市场边界而言,传统独立性媒介产业之间往往是一种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有各自分割的市场领地。<sup>[2]</sup>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各自在市场中相对独立,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 二、数字环境下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的成因

### 1. 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的内部条件

早在197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葛洛教授就用三个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电视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相交处将会成为发展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随着产业融合发生的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界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及其概念的界定也在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后,哈

佛大学的欧丁格和法国作家罗尔与敏斯试图用创造的新词 Compunctions 和 Telemetriqu 来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sup>[3]</sup>欧洲委员会绿皮书、美国学者 Yoffie、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以及中国学者周振华、马健等<sup>[4-7]</sup>都对产业融合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无论怎样定义,产业融合都是对产业分立的否定,标志着原有固定化产业边界(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市场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以及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实现。

(1)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前提条件。技术是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技术的迅速发展,就不会出现技术融合,而没有技术融合,产业融合也就无从谈起。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在信息领域主要采用的是模拟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1990年代后期,数字技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它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使媒介传输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融合为一种传输方式,并导致在线报刊、在线视频等数字产品的大量涌现。此外,网络技术尤其是IP技术,以一种共同的地址界定方式和开放而非独家专用的标准,不仅将计算机联在一起,并采用分散式结构处理多媒体,而且使不同网络之间只需增加网络智能即可相联通,独立的各网络联网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信息交换。<sup>[8]</sup>随着IP技术的发展,以IP协议为基础的网络(互联网)正成为各种环境中的主流网络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在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之间扩散并广泛渗透,为这三大产业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外,信息接收终端也不断趋于融合。例如,近些年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完善,手机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阅读终端,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上网、读书、看报、看电视……可见,信息化使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之间有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原有的技术边界正在被打破。

(2)业务融合与技术融合是相关联的。打破技术壁垒,实现技术融合后,原有的核心技能和知识基础、产品生产流程、业务结构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产业分立阶段,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各不相同,但随着技术融合的不断推进,三大产业间的业务融合也进一步扩大。如手机增值业务使得手机电视、手机阅读等产品出现。与此相对应的服务融合同样使信息传播的方式及内容的选择具有了可替代性,为用户的生活方式和工

作方式带来了很大程度的便利。

(3)市场融合是技术融合与业务融合的最终结果。业务融合后,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间的业务联系日渐紧密,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替代性很强的信息产品或服务。在共同的技术基础上,使用同一接收终端设备的用户由一种产品的消费者变成了多种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趋向统一,进而导致消费市场趋向统一。产品融合后,原来呈线性的市场结构相互交叉,呈复杂的网状结构,并出现相互竞争-合作的关系。因此,市场融合只有做到技术与业务的融合,才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应以市场融合为导向,才能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

## 2. 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的外部原因

我们在讨论技术、业务、市场融合的同时,不能忽视相关产业政策的变化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制度就是产业融合的外部推动力。

由于我国电信和广电所属部门不同、体制不同、追求的效益也不同,一直以来,国家对电信、广电控制严格,严禁二者之间出现任何业务上的融合。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对电信、广电之间产业融合的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2008年,在国办发[2008]1号文中明确提出推进“三网融合”,要“在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适应‘三网融合’发展要求的运营服务机制。鼓励广播电视机构利用国家公用通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提供数字电视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在符合国家有关投融资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业在内的国有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sup>[9]</sup>。国家广电总局在2009年4月14日发布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要求,“落实数字电视产业政策,推进‘三网融合’”<sup>[10]</sup>。2009年5月25日,国发[2009]26号文明确指出:“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改委、财政部负责)”<sup>[11]</sup>国家对电信、广电等产业融合的相关政策贯穿始终,这对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三、数字环境下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发展趋势

在数字环境下,电信业、广电业和出版业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利用新的生产模式,产生新的信息产

品,从而形成三大产业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

### 1. 电信业的新发展

(1)电信业中的手机阅读发展势头良好。通过技术融合,网络运营商、软件开发者和电信公司不断渗透到出版行业中,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网络出版物和手机出版物的出现。作为便携式手持终端,手机是最被看好的新媒体。2008年底,中国移动在杭州建立了阅读基地,该基地意在依托中国移动的用户规模,集中各方资源来推广新的图书发行模式,推进G3电子阅读器的开发和推广。截至目前,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开展战略合作的共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等79家单位,入库图书30万册。<sup>[13]</sup>数据显示,2011年此举带来中国移动手机阅读信息费收入15亿元。<sup>[13]</sup>同样,中国联通“沃阅读”也有很好的发展,2011年访问量接近40亿次,与多家出版集团和内容提供商合作引入图书15万册。<sup>[14]</sup>

随着手机用户数量的激增及其自身功能的不断完善,手机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阅读终端,人们通过手机上网、读书、看报、娱乐等。因此,手机报、手机出版物的发展势头迅猛,其前景被多家出版机构看好。《扬州晚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上海日报》等纷纷推出了手机报业务。

(2)电信业正以3G技术为依托,全面开发3G业务。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产业融合。3G(第三代通讯技术),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sup>[15]</sup>与2G相比较,其传输声音、数据的速度极大提高。未来的3G不仅能提供手机办公、视频通话、手机电视、手机网游等服务,还将和社区网站相结合,目前流行的微信、微博等已采取了此应用。

### 2. 广电业的新发展

(1)广播电视数字化。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猛,新技术使有线电视网络从原来的传输模拟节目向数字化业务领域扩展。广播电视数字化使电视机变成一个集公共传播、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交流互动等多功能于一身的信息接收终端,可以向电信业和互联网领域提供具有可替代性的数字产品,实现业务融合。2004—2008年,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分别为97万、397万、1266万、2686万、4528万户,增长势头明显。<sup>[16]</sup>截至2009年3月,全国已

经有 229 个城市进行了数字化整体转换,其中 106 个城市已经完成转换,广西、宁夏等地基本实现数字化,北京、天津、青海、海南、贵州、吉林等地的城市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比例超过了 50%。<sup>[16]</sup>电视节目数字化制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大媒体集团渐成规模。基于技术融合与业务融合,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之间出现融合,它们之间打破了原有的产业分工的限制,实现了资源在大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在产业重组、融合过程中,信息产业之间的联盟不仅是实现产业融合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还可以使企业做大做强。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整合了中央级广播电视、电影及广电网络公司的资源和力量,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成为综合性传媒集团,经营广播、电视、电影、传输网络、互联网站、报刊出版、影视艺术、科技开发、广告经营等业务,这使我国传媒集团跨行业整合成为可能。而在国际上,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维旺迪环球公司、迪士尼公司、维亚康姆公司、贝塔斯曼公司等纷纷进军电影和出版业,形成横跨出版业、影视业的大媒体集团。

### 3. 出版业的新发展

(1)出版业正积极拓展数字出版领域。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内容——出版产品的重要因素——在担任传统出版的重要投入要素这一角色的同时,成为新兴出版物的生产要素。它们通过技术融合,实现影视书刊互动、报网互动,逐渐形成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态势。网络运营商、技术提供商、电信运营商通过技术渗透到传统出版业中,通过开发电子书、网络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新产品,改变传统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一些硬件厂商,如汉王科技,通过研发“汉王阅读器”创造出新的阅读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电子阅读器直接在电子书上进行批注、修改和编辑。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发光电子书、可以卷起来的电子书相继出现,带给人们真实阅读的感觉。同时,一些数字出版企业,如龙源期刊、万方数据、中国知网、中文在线、盛大文学等,将大量的学术论文、文学作品、个人原创作品放到互联网上供人们下载阅读并广泛传播。除了这些新兴的数字出版企业外,传统出版社也积极向数字出版领域迈进。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93年开始研发《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截至2011年已出版了10多个版本;2011年出版了《中国

大百科全书数据库》,开发了手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同时,与iPad合作的“掌上百科”也在积极研发过程中。再如,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的商务印书馆开发的“商务印书馆·精品工具书数据库”,将传统的内容与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完美结合,打造出我国首个权威性的工具书查检学习数字平台。这就逐渐打破了出版业和电信业、广电业的技术边界,实现了技术融合,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前提条件。

(2)出版业正在颠覆传统图书出版产业的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营销方式。为了应对出版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它们进一步打破原有的业务边界,实现业务融合。传统出版社纷纷利用信息技术建立新的图书宣传和发行渠道。如利用网上书店、专业性的团购网站进行图书销售,解决了物流配送和库存问题;还通过网上书店中各类图书的销售排行榜、书评等影响读者的消费选择;利用微博对图书信息进行发布,开展作者与读者、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线上线下活动,开创一种新的媒体营销模式。此外,产业融合还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节约了运营成本。据《纽约时报》报道,亚马逊开始和作者直接签约,并准备向他们开放部分后台数据。这样,过去是作者—经纪人—出版社—亚马逊—读者的产业链条,缩短为作者—亚马逊—读者。

(3)出版业积极利用新技术打造全媒体出版。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标志着全媒体出版时代的来临。全媒体出版,又称作“复合出版”或“跨媒体出版”,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先生认为:“全媒体出版就是同一种内容通过多种媒体同步出版。包括纸质媒体,也包括互联网、手机、阅读器。”<sup>[12]</sup>这样,一方面将图书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出版的方式将图书进行出版。在全媒体出版时代,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影视传播实现产品服务一体化,2008年,冯小刚的影视作品《非诚勿扰》就是全媒体出版的首次尝试。

随着科技的发展,MPR出版物(多媒体印刷读物)成为全媒体出版的新成员。MPR是一种专有创新技术,它将二维条码编码解码技术、微距数码摄像技术、语音压缩及播放技术和现代出版印刷技术进行了整合,是集纸质印刷出版、音像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为一体的全媒体出版,使用这种技术可以实现读者闻听看读的同时进行。目前MPR技术拥有方深圳天朗时代公司已推出多种应用成果,包括MPR版本的《诗经》《楚辞》,与书法家合作的MPR书法、国画作品,以及可以消除阅读障碍的MPR盲

人读物等。

#### 四、结语

信息产业的融合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动态过程,需要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及市场融合,它摧毁了传统产业经济运行的基础,呈现出一种新的产业经济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相关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电信业、广电业、出版业之间的产业融合会迸发出更大的生命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而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电信、广电、出版三大产业也将会加强资源整合的力度,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在新一轮产业经济的发展中崭露头角。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振华. 产业融合: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标志——兼析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案例[J]. 产业经济研究,2003(1):2.
- [2] 邓向阳. 媒介经济学[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223.
- [3] 汤文仙. 技术融合的理论内涵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06(4):31.
- [4] 李美云. 国外产业融合研究新进展[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12):12.
- [5] 刘宇青. 对旅游产业发展融合化的认识[J]. 商场现代化,2009(25):124.
- [6] 周振华. 信息化与产业融合[M]. 上海:三联书店,2003.
- [7] 马健. 产业融合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 许道友. 信息通讯产业融合下的产业边界和市场结构分析[J]. 科技和产业,2007(9):11.
- [9]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8]1号)[DB/OL]. (2008-01-18)[2012-08-26]. <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8/01/18/20080119004411200481.html>.
- [10]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DB/OL]. (2009-04-15)[2012-08-26]. [http://www.gov.cn/zwgk/2009-04/15/content\\_1282430.htm](http://www.gov.cn/zwgk/2009-04/15/content_1282430.htm).
- [11]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26号)[DB/OL]. (2009-05-25)[2012-08-26]. [http://www.gov.cn/zwgk/2009-05/25/content\\_1323641.htm](http://www.gov.cn/zwgk/2009-05/25/content_1323641.htm).
- [12] 童之磊. 全媒体出版[DB/OL]. (2009-07-07)[2011-08-26]. [http://www.chuban.cc/rdjj/szcb3/zlt/200907/t20090707\\_50647.html](http://www.chuban.cc/rdjj/szcb3/zlt/200907/t20090707_50647.html).
- [13] 网易. 中国移动阅读信息费收入去年达15亿元[EB/OL]. (2012-04-06)[2012-08-26]. <http://mobile.163.com/12/0406/19/7UE9D8EG00130A1.html>.
- [14] 王鹏. 联通沃阅读去年访问量40亿 已引入15万册图书资源[EB/OL]. (2012-07-25)[2012-08-26]. [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2\\_07/02/15712937\\_0.shtml](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2_07/02/15712937_0.shtml).
- [15] 李军林. 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44.
- [16] 新华网. 广播电视数字化发展空间广阔[EB/OL]. (2009-11-12)[2012-08-26].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1/12/content\\_12438556.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1/12/content_12438556.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092-14

# 明代木刻书籍版画艺术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是对国画中线描和水墨的复制。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大多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插图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明代木刻书籍版画大量出现,题材广泛,刻印精湛,争奇斗艳,达到了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的巅峰。其中,福建建阳版画多出自民间工匠,镌刻质朴;南京金陵版画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采迥异;杭州武林版画题材开阔,刻制精美;安徽徽州版画富丽精工,典雅静穆。对于明代木刻版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关注以梓行地来划分区域性的版画风格,并特别强调徽派艺术风格在晚明时期的大一统格局,使得几乎全部晚明时期江浙地区的版画,无论是怎样的面貌,都可以被认定是徽派版画。而版画风格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绘图者师承的风格,还是雕版者在雕刻时所创出的风格,都可能对版画的呈现有所影响。作为版画创作者的画师与刻工,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绘画者的画风决定着版画风格。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以艺术特征之不同将晚明时期版画插图归类为质朴派、雄劲派、婉约派的新方法,有利于对中国古版画插图史的梳理与研究。明代木刻版画的构图沿用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法,与西方的铜版画在形式风格和绘刻技艺方面都不一样。晚明时期,一些画家开始学习西方绘画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掌握了透视和明暗画法,于是在明代木刻版画领域也出现了西方艺术的透视和投影技巧,这可能是用中国古代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而留下的。因为,在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要分发大量的圣像、纪念章和带有插图的书籍,由于从欧洲运来的数量不多,只能找当地刻工用木版印制。当时用于传教的木版画印刷品已不可得见,只留存下为数极少的用中国古代传统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的作品。西方艺术的透视法对我国传统版画的影响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关键词] 明代木刻书籍版画;区域性风格;中外交流;出版

[中图分类号] J21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8

## 一、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

版画(print)在英语中不仅指从近代创作版画发展起来的绘、制、印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具有表现力的平面作品,还泛指一般的印刷。作为绘画艺术一个门类的版画,1960年的维也纳国际造型美术协会会议曾加以定义:(1)为了版画作品的创作,美术家曾亲自利用石、木、金属、绢等材质,参与制版,使

自己心中的意象借此版转印于画面之上;(2)美术家亲手、或在其本人监督指导下,以其原版直接印刷而得的作品;(3)在这些完成的版画原图上,美术家负有签名的责任。<sup>[1](P170)</sup>这个定义来自于创作版画,显然是欧洲版画创作的理论总结。“欧洲人将中国古代的复制版画发展成创作版画,将画与刻分开,形成了画与刻均由艺术家独立完成的艺术”<sup>[2](P331)</sup>,在时间上大约为18世纪中叶。对于版画的定义,中国现代新兴版画的推动者鲁迅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

[收稿日期] 2012-10-11

[作者简介] 章宏伟(1964—),男,浙江省温岭县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故宫学、历史学、文献学。

“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因为是创作底，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sup>[3] (P336)</sup>为了与新兴版画加以区分，鲁迅还提出了传统木刻版画、传统版画、复制版画等名称。

对照国际造型美术协会的版画标准，由于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画稿、雕版、印刷由一人完成的木刻版画，所以，将中国古代复制木刻画视为版画创作来研究是不全面的。但是，中国古代版画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大概只有郑振铎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他慎重地定名《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sup>[4-5]</sup>，可知他对于频繁使用的“版画”一词还是颇有几分保留的。在中国本没有“版画”的提法，与其相对应的，在古代大致有“刻本”、“印本”、“雕版”、“设色套印本”、“刻图”、“修梓”等说法，从这些名称可知，中国古代传统版画大多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周芜<sup>[6]</sup>曾说过：“中国版画史就数量来讲，实际上是中国书籍插图史”。实质上中国古代传统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它是对国画中线描和水墨的复制。虽然凌君武<sup>[7]</sup>对传统版画的价值和意义做了一些探讨，王永亮<sup>[8]</sup>也试图对“传统木刻等于复制版画”这一概念提出质疑，提出明代人们观念的更新、画家与刻匠的亲密合作，使得传统版画在技法、材料、画稿和印制上得到不断创新。若以此来“充分肯定传统版画中包含着创作因素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但由此说传统版画不再是对中国画的复制，而是开始具有了自身的刀刻语言和艺术特点，并将之视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版画萌芽的开始，则可能需要进一步论证。因为凌君武和王永亮两人实际上都没有否定中国传统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而只是证明了传统木刻版画在明代有创新。

作为复制技术的中国古代传统版画，在绘画风格上受到中国画的影响，秉承中国画的线条传统，以单线造型的表现形式，人物的结构、山水景物的塑造样式等都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相同，都是一味地模仿画稿，画师画出画稿后，由技艺相对高超的技师通过刻工、印工分阶段制作完成，与原稿不能有一点偏差。印刷制版是复制笔意，而不是创造刀法，它纯粹是对一般绘画原作的模仿，作品中边线的整齐刻划、线条的流畅平直，以及转折处略为生硬的刀痕，正是印刷制版中对原作最大限度的忠实，对于刀味的追求没有能够成为自觉的行为，刀味在整个过程中消失殆尽。《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运用木版水印的拱花、短版技术，将中国画的水墨韵味体现得微妙至极。拱花、短版技术虽然高超，但只在

技术的层面对版味、刀味的讲究，仍是对原稿的模拟。艺术创作需要原创的个体意识，它要表现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并从构思到完成具有完整的统一性，至少是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贯彻图形样式制作始终。中国古代版画传统表现形式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艺术传统形式，它只是模仿复制，没有去除功利因素。呈现的样式虽是版画艺术的表现样式，但也仅仅是技术层面，是印刷范畴内的技术，只是中国绘画的复制方式。欧洲版画艺术具有复制的特质，但它不是复制。如果说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具备了艺术作品表现形式，但也只是民间艺人师徒之间的传承，它有先入为主的图式，不过是怎样刻、怎么印的问题。<sup>[9]</sup>中国古代版画基本上都是复制版画而不是创作版画，它是根据画稿镌刻的，是绘画的再生品。中国古代传统版画的图形样式不是以个人化的思想情感直接面对社会，画家无须直接面对雕版以刀代笔直述情怀，表现题材和内容形式大多是小说戏曲内容的再现。刻版需要镌刻作者准确把握画稿的风格，再与自己的镌刻风格相结合，产生出珠联璧合的佳作。图绘作者与镌刻作者一般都是分离的，独立的版画意识并没有真正实现，版画的语言被模仿笔墨线条的效果所取代，不能被列入“纯艺术”的范畴，称之为“复制型版画”或“古代版画”可能更合适。

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插图史中承前启后的时代，学界对明代版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且给予其很高的艺术地位评价。确实，明代的木版画已经极度繁荣，达到了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的巅峰，除了细致工整的阳刻版画外，还出现了阴刻、多版套色、短版、拱花等一些新的制作技法，经过文人画家与刻工的密切合作，版画的艺术价值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传统版画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重要依据。

## 二、争奇斗艳的明代木刻书籍版画

明代雕版刻书发达，书籍数量猛增，明中期的叶盛对当时小说和戏曲作品出版的盛况曾有一番描述：“今书坊相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

馥”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sup>[10]</sup>为了招徕读者,出版刊行各类书籍往往附以精美的插图,如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金台岳家书铺刊行的《西厢记》末尾就有说明:“本坊谨以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本,皆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sup>[11]</sup>明代出版的戏曲、小说常常会有许多刊本,如《西厢记》就有弘治本、乔山堂刘龙田刻本、起凤馆刻本、张深之刻本、香雪居刻本、闵刻朱墨套印本、凌刻朱墨套印本、刘李明刻朱墨套印本、李延谟刻本等十余种之多。为了在销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书商们往往延请有名的画家绘制插图,像唐寅、仇英、陈洪绶、丁云鹏、汪耕、郑千里、赵文度、刘叔宪及蓝田叔等知名文人画家的参与,无疑有利于书籍版画向艺术化的方向发展。晚明时期几乎到了无图不成书的局面,木刻版画大量出现,题材广泛、数量惊人、刻印精湛、艺术水准高妙,是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的巅峰时期。

明代前期,因为统治者的推崇,佛教典籍的版画插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刻版画兴盛,数量多,刊刻精美,气魄宏大庄严,风格活泼,有很高的成就。明初佛教典籍以外的版画,虽有佳作,数量极少。明代洪武初年福建坊刻《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每诗一图,上图下文,似坊间所刻童蒙读物。明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是最早的戏曲连环画插图本,有文字86面,每面配单面方式图一幅,左图右文,把原置版面上部、占版面1/4左右的图版移至左面,极大地扩大了版刻插图的表现空间,与元刊《西厢记》残页图像不同的是没有榜题。明正统九年(1444年)刻《圣迹图》,以连续性的版画表现孔子的一生,刀法简洁有力,线条如铁线般刚劲,虽然画面上人物、背景、器具繁多,却井井有条,毫不繁乱。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刊印的《老子道德经》扉画《老子出关图》,两面连式,图中老子端坐牛背,衣袂飘举,紫气裹身,神情淡雅,骨法奇古,一派仙风道骨的气象,须发以直刀削刻,是全图的点睛之笔,背景的山岚关隘,用线洒脱。

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宣姓墓中,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说唱词话,其中讲史类3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新刊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公案类6种(《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糶米记》《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全相说唱师官

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传奇类2种(《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另有南戏1种(《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这批本子插图丰富,艺术手法趋向多样化。其中《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为上图下文,沿用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的形式风格;其他诸本皆为整版图,其中《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等,版框中间用直线或云纹等花饰隔开,上下各一图,是将整版图一分为二进行处理的新手法。镌刻手法上阴刻与阳刻相结合,古拙粗疏,人物突出,背景不加修饰,线条粗壮有力,雄浑劲健。明成化六年(1470年)刊本《天神灵鬼册》,广罗天堂诸神和地狱诸鬼的图像,相当于一本大规模的神鬼谱。鬼神们的神态千变万化、惟妙惟肖,刊刻也极为精致,是明初木刻画集里的大创作。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刊本《历代古人像赞》,所绘人物上起伏羲下迄黄山谷,是存世最早的版画人物图像集。

明弘治元年(1488年)刊本《吴江志》是较早附有版画的方志书,其中有乡贤诸公像,虽粗疏稚拙,但别有意趣;另有山水版画如《思鲈返棹图》《雷泽别业图》等,很有诗情画意;还有《顾侍郎著玉篇图》一幅,继承了元代的古朴风味,浑沌厚重、朴实无华,是弘治版画中的上乘之作。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京师书肆金台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分5卷,每卷前冠单面整版图一幅,存“西厢步月”等3图。书内插图皆为上图下文式,每页一图,以戏文标目为单元分段,一段内或二三图、或六七图,图与图之间在画面上前后相连,段与段之间则契合剧情发展在情节上首尾相接,展开来看,就是一幅“唱与图合”的连环画长卷。元鹏飞<sup>[12-13]</sup>因该刻本牌记中有“唱与图合”4字,认为这种戏曲刊本插图可能不仅有看图讲故事的意义,还有展示演出场景的含义;他还认为“早期的戏曲插图并不像小说插图那样,一开始就明确服务于看图讲故事的目的,而是有一段时期曾包含了将这些内容在舞台上表现的情形以‘唱与图合’的方式予以展示的目的。不过,受小说插图形式的影响,这种情形很快就被改变了”。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可能与事实并不相符。图版绘刻粗中有细,刀法活脱而有生气,人物造型生动,配景以典型布置,大致殿阁楼台、庭院书斋、古道长堤,小及一几一案、一石一木、一花一草,选取无不合宜。该刻本插图共150幅,有单

页、双页、多页相连等不同形式,非常灵活,把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淋漓尽致地绘写于画面上,出色地渲染了原作的情感基调。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苏州刻、邝璠撰《便民图纂》,第一卷有版画《耕织图》,描写明代吴地的耕织风俗,用的是上文下图形式。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重刊宋绍定本《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20卷。后集无插图,前集不仅内容丰富,且武器与阵营部分附有大量插图,有的是单页一图,有的扩为双页大幅。图的后面有说明文字,如“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空束于腋下,人浮以渡”。所刻粗率草简,艺术性不强,但它把南北朝至北宋的武器形状记录下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吴郡沈津原刊《欣赏编》,包括集古考图、汉晋印章图谱、文房图赞、茶具图赞、古局象棋图、谱双、打马图等几十集。大食、真腊、阉婆等人物形象,始见于“谱双”集中,颇为珍贵。福建建阳、崇安地区刊刻小说图书时间早,明代万历以前还是刻印小说最多的地区,规模较大,延续时间也长。建阳、崇安相距不远,版画插图风格基本相同,被统称为“建安派”。自明初到万历年间,建安书坊刊印的小说占全国一半数量<sup>[14]</sup>,并且绝大多数都插有版画。其中,刊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的杨氏清江堂《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是建安插图本书籍趋于兴盛的标志,张光启所刊,上图下文式,图刻朴素生动。明正德十年(1515年)山西刊有医学书《铜人针灸图》《西子明堂灸经》等。《新刊校正安骥集》是一本关于马病论断及治疗方法的兽医书,上图下文式,无论章法结构、线描刀锋,都非常简净。

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版画艺苑逐渐趋向繁荣,不仅作品的种类数量有较大增加,绘刻也渐趋工丽细致。嘉靖刊本《鼎新图像虫经》,所绘昆虫千姿百态,灵巧跃动。古人以为草虫养人怡情,故所刻往往不以图解为目的,而成为成就非凡的艺术作品。嘉靖十四年(1535年)刊《醴泉县志》有《昭陵六骏图》,以极简古的线,表现出六骏不同的神形姿态和“气誓三川、威凌八阵”的气概。嘉靖十六年(1537年)刊《太岳志略》为方升所辑,共5卷,其中第3卷为宫观图,附图甚多,刻绘也极详实,是明刊志书中的珍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阳熊大木刊《日记故事》,在图版形式上,沿用了上图下文的狭工式插图,图中人物形象都是小型的、粗线条的,但由于构图巧妙和镌刻精细,很是活泼生动,具“咫尺寻丈”之概,为后继的版画趋向于繁密工致

开了先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熊大木编辑、闽建书林清白堂杨涌泉刻《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书岳飞抗金事,图为全幅大版,双面连式,图版绘刻粗豪而有气势,颇为壮观。在以上图下文为主要形式的建本小说版画中显得十分夺目。郑振铎<sup>[5]</sup>、周芜<sup>[6]</sup>都认为,自刘龙田乔山堂于万历元年刊《新镌考正绘图注释古文大全》,不久又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皆为整幅插图,是对建版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革新,从而为建安派版画开辟了新路。在郑振铎、周芜关于古版画的论著中,未见提及《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依笔者愚见,可能囿于客观条件,两先生并未见到此本,从而才有刘龙田的革新一说。刊印于南方的两部最早的南戏插图剧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枝记》与《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的插图也都是连环画形式。刊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荔枝记》末尾曾记,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所以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枝记》。而现存明万历九年(1581年)刊印的《荔枝记》其实并非上本《荔枝记》的底本,这由它们的刊印年代便可知晓。但同样是敷演陈三五娘故事的这两个剧本,除了情节的改动外,图版与文字的配合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在版式上,较早的《荔枝记》分为3层,第一层为诗词北曲,第二层为戏曲版画插图,但图像左右有与剧情内容相配合的4句诗句。第一、第二层合占1/2版面,余第三层为《荔枝记》。《乡谈荔枝记》则上1/3的版面为戏曲插图,下2/3为《荔枝记》,图版左右是一句榜题式的文字,以概括图版内容。《荔枝记》左右的4句诗和榜题的意义还有一定距离,而《荔枝记》左右的一句话则是榜题文字。戏曲刊本插图很快就由含糊不清的定位确定为小说插图那种看图讲故事式的作用了。

刊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雪舟诗集》卷首有《雪舟图》,利用墨色版衬托出雪天景色,很似墨拓的本子,乃版画中所仅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刊《筹海图编》,13卷,胡宗宪辑,郑若曾编,是一本与抗倭有关的海防著作。书中有海防图、各式船图、武器图等。卷八题“苏州府画士薛察、定海县画士王岳绘图”。刻工来自徽州、杭州、苏州各地。徽州黄氏题名者有瑚、瑄、瑜、璵及铖、钺、钱、铉等20多人。

明代万历时期(1573—1619年),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日益壮大,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许多文人学士开始经营书

坊,镌刻也不惜工本,福建建安、徽州(安徽歙县)、武林(今杭州)、金陵(今南京)和苏州等地成为明代最具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的刻书中心,几乎所有地区的书坊都重视图像的作用,刻印了大量的木刻版画插图,形成了生动的地域风格特色。当时插图书籍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远迈前代。各地版刻艺苑出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从童蒙读物到农技医药等各类实用性出版物都配上了插图,各种题材版画方兴未艾,特别是为了满足愉悦和轻松的阅读要求,作为市民阶层精神消费品的小说戏曲版画取代宗教版画,不仅品种数量剧增,而且大多采用了丰富多彩的版画插图。其中的插图往往有著名画家署名,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故多有精品,涌现出大量的名作佳构。董捷<sup>[15-16]</sup>曾专门就《西厢记》版画的绘刻者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调查了22个版本的《西厢记》,对题署的绘图者和实际的绘图者作了区别,发现冒署著名画家的姓名,从宋代的陈居中、元代的盛懋,到明代的唐寅、仇英、钱穀、董其昌、蓝瑛,都被纳入其内。而那些真实绘刻者的姓名却往往湮没无闻了,即使留有姓名,也多无法在其他史料中找到记载,以致难以详加考察。董捷认为,对于版画插图中署有知名画家姓名的,除了画史上有明确记载者(如陈洪绶等)以外,一般应以伪托论。时人对于书籍插图的功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夫简策有图,非徒工绘事也。盖记未备者,可按图而穷其胜;记所已备者,可因图而索其精。图为贡幽阐邃之具也。”<sup>[17]</sup>郑振铎曾说,明万历年间是中国古版画史上的黄金时代。该说法虽然不符合实际,但也是看到了万历年间版画的勃兴之势<sup>[18]</sup>。

### 1. 建阳版画

福建刻书历史悠久,宋代就已经盛名远扬,但历代的雕印中心并不在一地,宋、元时书坊多聚集于建安县,入明后建阳县取而代之,成为书坊林立之处,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麻沙、崇化两地印书业也非常兴盛。麻沙在建阳县城西去约35 km的永忠里麻沙街,宋代即为全国印书中心之一,以印刷麻沙版书著称于世,元代毁于火,明代又兴。崇化在麻沙镇东北10 km,“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sup>[19]</sup>,印书规模之大不难想象。现今可考的书坊近百家,刻书题材极为丰富,举凡经史图书、诗词文集、方志类书、军事海防、佛典道经、医卜杂著无所不包,而尤以小说为大宗。历来论建本图书,颇多贬词,贬多于褒。时人胡应麟就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

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sup>[20]</sup>谢肇淛直斥:“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sup>[21]</sup>建阳所刊,无论是用材、校讎,都较为粗糙,但由于价格低廉,使得建本书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畅销不衰,传播广泛。

建阳余氏是刻书世家,自宋时余靖庵摹刻《列女传》,兹后递代相承,子孙世业。万历时开肆业书者不下20余家,成为建阳版画的主将,而以双峰堂所刻版画品种最多、数量最大、成就也最高,通俗小说插图本是双峰堂所刊版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双峰堂主人名余象斗,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双峰堂所刻书或有刊署余象乌、余世腾者。郑振铎认为:“所谓双峰堂指的是兄弟二人,一名余象乌,字仰止;一名余象斗,字文台。均是双峰堂书铺的主人。”<sup>[5](P58)</sup>王伯敏也说:“余氏的双峰堂,是余氏兄弟二人的刻书堂名,兄余象乌,弟余象斗,都是刻书经营得力的能人。”<sup>[22]</sup>张秀民认为:“文台余象斗子高父,字仰止,号仰止山人,又号三台山人,又称双峰堂余文台。”<sup>[23]</sup>孙楷第提出疑问说:“字仰止之余象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sup>[24]</sup>刘修业认为:“作批评的人,卷七卷八作‘仰止余世腾’,卷十二作‘仰止余象乌’。孙楷第先生疑‘字仰止之余象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我则疑余象乌也是余象斗的化名。”<sup>[25]</sup>柳存仁认为:“现在再加上世腾和象乌之名又可互易,刘女士所猜测的这些名字都是出于一个人可以说有很强的理由。”<sup>[26]</sup>原方也说:“通过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的刻本比照和分析可知:文台、仰止山人、三台山人均为余象斗的字和号,世腾、乌、君召、宗云、元素可能都是他的别字、别名或别号。”<sup>[27]</sup>余象斗还自编自刻了大量公案、志怪小说等,如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刊《新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等。余彰德、余酒泉父子经营的萃庆堂,也刻印了不少带有版画插图的书籍,以整版图居多,如《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楔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楔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皆为双面连式;所镌《一见赏心编》则为单面方式;所刊邓志谟编撰的《七种争奇》则为单面方式或双面连式。《七种争奇》属于杂纂类书籍,汇录有关的传奇、曲本、韵语等作品为一编,体例芜杂,但其中的插图绘刻精丽。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朱一是跋《七种争奇》云:“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佳人出游,手捧绣像,于舟车中如拱壁;医人有术,检阅篇章,索图以示病家。凡此诸百事,正雕工

得刮鬣之力。万载积德,岂逊于圣贤之传道授经也。”首次把版画的作用与圣贤立言相提并论,在当时着实有些骇人听闻。余氏坊肆中的余成章、克勤斋、勤有堂、余少江、余文龙、存庆堂等,也都刻过附有版画的书籍。

刘氏是建阳书坊中仅次于余氏的第二大姓,共有书坊10家<sup>[23]</sup>,著名的有刘氏翠岩精舍、刘氏安正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洪慎独斋、刘志千归仁斋、刘氏忠贤堂等。刘龙田,名大易,字龙田,为建阳豪富,认为名教内自有乐地,于是大量收藏并刊行书籍。明万历初年刘龙田乔山堂《重刻题评音释元本西厢记》变上图下文式插图为一面文字一面图版、左右映衬对比的单页式,以合于所谓“左图右书”的传统,图像中的文字除了左右联语,还有每一折的题目,是同类型插图的最早者,后来的金陵版画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一风格的影响。谭邑刘氏明德堂《详刑公案》变方框式图像为花纹边框,对后来出现的月光式插图具有启示意义。

其他如熊氏熊龙峰的忠正堂、熊清波诚德堂、熊宗立种德堂、熊鹿台忠贤堂、熊氏宏远堂等,杨氏清白堂、书林杨居案等,郑氏联辉堂、郑少垣联辉堂,宗文书堂等,可谓举不胜举。书林杨居案刊《红梨花记》,图双面连式,纤丽秀劲,绘刻甚精。

建阳刻书较多图文并茂,有着比较鲜明的特色,并且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明代继承宋元“纂图互注”的特点,频频使用“全像”、“全相”、“出像”、“出相”、“图像”等名词在书籍封面上。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刘龙田乔山堂所刊《出像搜神记》、万历三十四年署“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的《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题“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的《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宏远堂熊体忠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等,都用醒目的“全像”、“出像”字眼标于封面,表明书中附有插图。

明代建阳插图本的版式主要是上图下文的狭长型,如万历十六年(1588年)刊《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上图下文;万历二十年(1592年)《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上评中图下文,是现存较早的《三国演义》插图本;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刊《京本增补校正演义全像忠义水浒传传评林》,亦为上评中图下文形式,上方的评论文字还有3个字的小标题,叫做“评”,具体由图像内容决定。“评林”本小说插图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形式特征的变化对于戏曲小说插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与当时其他地方插图大多采用大图形式相比,有着鲜明

的地方特色。但也有些书肆开始采用全版插图,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闽建书林郑世豪刊刻《鼎镌校增详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的插图,就是满面的大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宏远堂熊氏刊本《列仙降凡传》的插图采用了双面连页的形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福建崇安孙世昌刻《武夷志略》的插图摹宋代高文举画,采用单面或合页连式。这些都一改建阳刊本小图的风格。

建阳刻本的图刻古朴稚拙,绘镌手法往往阴刻与阳刻结合,层次清楚,简单明了;线条运用略显滞重,但粗犷有力;人物造型简略,图像也较小,但人物动作活泼,姿态逼真,质朴生动。万历年间书林杨美生刻《新刊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和书林熊冲宇刊刻的《新镌京本校正按鉴演义三国志传》,两书插图均简单朴实,且大同小异。类似情况在建阳刻书中绝不是孤例,是市场竞争状态下跟风的必然结果。建阳本插图,总的来说造型构图显得拙朴稚气,缺乏章法,显然是工匠自己画稿、自己刻印的作品较多。

## 2. 金陵版画

明代万历年间金陵的刻书业十分发达,现今有牌记可考的书坊不下五六十家,多集中在三山街及太学前。所刻书以大众化的小说、戏曲为主,一些有名的书肆如唐氏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陈氏继志斋,汪氏环翠堂,都镌刻了大量的版画。

富春堂主人唐富春,字对溪。富春堂刻书版面多单面方式,上方通栏标题,版心署“出相××记”,下署“富春堂”,行格字体清朗隽秀。文字页版四周均装饰有回文图案,称为“花栏”,中间标有书名。常见的题记有“金陵唐对溪富春堂”、“三山街书林唐富春”、“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富春堂”等。富春堂刻书以戏曲为多,相传曾刻传奇百种,遗存至今的有30余种,多附有大量版刻插图,如《玉玦记》图31幅,《何文秀玉钗记》图38幅,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其艺术风格明显受到了建安派的影响,并有所创新,如《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与刘龙田《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多有雷同之处,刀刻运用也颇为相似,只是在版式上去掉了刘氏的左右所嵌联语,使画面有所扩展。插图已不再是上图下文式,而改为整版半幅或前后页合并成一大幅的形式。以人物为主体,饰物、背景绘刻大多很简单。人物在画面上所占比例很大,往往超过画面2/3强,形象大而突出,注重人物动作与表情的刻画,脸部表情很深刻,人物动作有强烈的舞台演出意味。用笔粗壮,刀刻放纵而稍嫌粗率,却不失简约大方,线条简朴有

力,线纹转折较硬,喜用大块黑底阴刻来描绘冠帽、山石、发髻、衣缘等背景和装饰,大片的墨底衬托出铁划银钩的刻线,明暗对比强烈、层次分明、疏朗醒目,表现出庄重、雄健、粗毫的作风。富春堂版画在粗犷、直率之余,也刻得很精致,这是对各家之长的不断汲取,是对时代风尚的顺适。富春堂版画特色非常鲜明,很容易认定是金陵版画,如《新刻出像音注范睢绌袍记》中的插图“窥妻祝香”。

世德堂大约是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由富春堂分立出来的书肆,题记常称“金陵唐绣谷世德堂”、“绣谷唐氏世德堂”。《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琵琶记》署唐晟刊,或即为世德堂主人。与富春堂相比,世德堂所刊小说较多。其中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据考为现存《西游记》一书的最早刊本。《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首图署“上元王少淮写”,即是刻工或画家名。所刊《南北两宋志传题评》等书,插图宏富,亦颇可观。世德堂本几乎全为双面连图,其描绘战争场面的版画,场面宏阔、气势磅礴,人物造型生动,风格与富春堂大同小异,略显工细一些。

周曰校万卷楼和周如山大业堂两家的绘刻风格接近于富春堂、世德堂,形式以单面图版以至于双面连式为主,图刻粗豪雄健,线条粗劲有力,人物在图画中比例较大,注重表情的刻画,疏朗醒目,在经营布置上很有自己的特点,场景绘写颇有气势,体现出了金陵本土的风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周如山大业堂所刊《新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周曰校万卷楼所刊《新刻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以及署“魏少峰刻”的《新镌全像通俗演义续三国志传》,都体现出如上特点。周曰校万卷楼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署“上元王少淮写”,与世德堂本《唐书志传》同,说明王少淮可能是专为金陵坊肆做版画的专业刻工或画家。

唐锦池文林阁、唐振吾广庆堂、陈大来继志斋,所刊戏曲版画数量亦多,绘镌皆工致,风格已与富春堂、世德堂大异,多采用双面连式大版图,并注意背景的描绘,画面上也不使用大字标题。其艺术风格趋于工整、秀丽、细致,不再用大片墨底来作近景衬托,重背景描绘,人物位置已不突出,人物动态已少舞台演出意味,比较接近现实生活,整体布置追求一种澹静娴雅的风格,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继志斋刊《重校玉簪记》的“茶叙芳心”插图,书籍插图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品。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继志斋刊《新镌古今大雅南北宫词记》,

图仅双面连式一幅,绘刻绵密清丽,给人以细腻缠绵而又清纯典雅的美感,绘镌较文林阁、广庆堂更为婉秀。郑振铎称许该插图“有潇洒飘逸的风致,线条如屈铁盘丝,刚劲而又柔软异常,转折如意。凡衣褶、飘带乃至柳枝、荷叶无不如此。实是金陵派作品里最高的成就之一”<sup>[5](P63)</sup>。

金陵版画绘镌最为精美,成就最高的,当推环翠堂所刊诸本。环翠堂主人汪廷讷,字昌朝(一作昌期)、无如,号坐隐、无无居士、全一真人、清痴叟,安徽休宁人,明万历年间官任盐运使,因以致富,寄寓金陵,以著书、刻书自娱。其本人也是出色当行的戏曲作家,自编《义烈记》《彩舟记》《狮吼记》等传奇,并《西厢记》等传世名篇汇为《环翠堂乐府》。环翠堂所刊书中插图多采双面连式,图皆繁复精工,图版空白处以细密的图案花纹相补充,屋宇地面的花砖、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帷幕、桌帔绣帘,无不浓丽精细,甚至连花草树木也富有图案气息,画面富丽堂皇,绘镌讲究精美,婉丽遒劲,场景表现绵密富丽,人物表情纤细入微,刀刻繁简适宜,线条细腻,纤不伤雅,显示出非凡的功力。郑振铎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环翠堂刊的《人镜阳秋》为“古典美的作品的一个最标准的范本”<sup>[28]</sup>。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602—1605年)由汪氏环翠堂书坊用白绵纸初印成本的《环翠堂园景图》,以及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坐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的卷首画《坐隐图》,都是中国版画中罕见的宏幅巨制。环翠堂版画由著名画家汪耕、钱贡为之绘稿,徽籍名手操刀,历来被认为是徽派版画的典范。

### 3. 徽州版画

明天顺六年(1462年)程孟刊本《黄山图经》已显示出徽州版画自早期所走的就是较为工细的路子。刻印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目莲救母劝善戏文》,黄链、黄钊刻,总100出,分为上、中、下3卷,有图版57幅,图版形式分单面方式、双面及多面连式不等,人物都为大型,表现粗豪简厚,在背景、饰物上并不多做雕琢,风格粗豪有力、劲整疏朗,绘刻古朴浑厚,线条粗旷劲挺,构图生动活泼,富于变化,部分图版阳刻和阴刻交叉运用,利用大片墨版、以线描写刻画人物面貌。技巧似来自金陵富春堂与世德堂所刊诸本。王伯敏在《中国美术通史》中说:“现在似可证明刻于万历十年的目莲戏文,只是一种偶然的风格,可能与受建安派影响有关。”<sup>[29]</sup>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歙县方于鲁美荫堂刊《方氏墨谱》,绘刻墨之形制、图案,刊署丁云鹏、吴左千、俞仲康绘,黄德时、黄德懋刻,美国国会图书馆

藏本题“歙黄守言刻”。其刀刻精细流畅、线纹匀洁,已是徽州版画趋于成熟时的风范。

汪云鹏玩虎轩为徽州一家十分有名的书肆。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玩虎轩刻《有像列仙全传》,是一部插图宏富的徽版名作。图版绘刻精致,但人物动态变化少,书署黄一木刻。查《虬川黄氏重修宗谱》,黄一木,字二水,生于公元1586年。其父黄守言,亦为徽版名手,曾为《方氏墨谱》《文昌化书》《古杂剧》等书刻过插图,皆传世名作。黄正位刊本《剪灯新话》亦有刊署黄守言的佳作。黄一木刻《有像列仙全传》时,年仅15岁,以弱冠之龄,技精而至于斯,当得益于其父的言传身教,黄氏刻工授业之有方,于此可见。黄一木另刻有《剪灯新话》版图,穷精极丽,人物造型流畅生动,比之《有像列仙全传》已有颇大进步。黄氏一族执晚明、清初版画艺苑牛耳数十年,当非偶然。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徽州书肆观化轩刊本《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黄镛(字近阳,子黄桂芳等三人,皆为徽版名手)刻,图刻澹静娴雅,动静得宜,颇具观赏性。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浣月轩刊《新镌蓝桥玉杵记》,署汪樵云绘,未署镌刻人,也是徽州本地刻本。剧共36出,配图36幅,皆双面连式。前序称“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可见戏曲版画的功用,并不仅仅在于从审美角度来提高图书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也是梨园搬演的图释指南。这样就更易理解不少早期的戏曲版画,在人物造型上为什么宛若舞台演出的逼真,身段、动作无不毕肖了。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刊《状元图考》,4卷,顾鼎臣编,黄应澄绘,黄应缙书,刻工有黄应瑞、黄元吉、黄德修、黄应泰、王玉生等。该书收录自正统丙辰(1436年)周旋至正德辛巳(1521年)杨维聪共29名状元。在构图上,注重故事情节的描写和人物情态的表现。绘刻均很精工,善于运用黑白对照的手法来描绘事物景致。线条非常细腻,兼用重笔,如山石、花树等都有用重笔渲染的地方,比起一味运用单线条,更具表现力。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程大宪滋菽馆刊《程氏竹谱》,所画图式如朔风、映日、照水、拂云、翳月、倚石、丛风等,均着重于对物象之外意境的追求,而不像民间画师那样更看重对物象本身的摹写。其中《雪竹》一图,以大面积的黑墨底色衬托白雪皑皑,这种方法在古代版画中极为罕见。图中丛竹,被大雪覆压,枝斜叶倾,犹自刚劲。尹迥在该书叙文中说:“大宪此谱,所绘诸图,出姿媚于遒劲之中,见洒落于纵横之外,偃直浓疏,动合矩度。”

徽州并不是当时刻书业最兴盛的地区,无法比拟传统的刻书中心。目前论者特别强调徽州的黄氏刻工是徽派版画绝对的中坚力量。仅以徽州黄氏家族为例,据《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记载,从明代正统至清代道光年间,就有400多人从事这一行业,其中不乏名家。如汪氏《环翠堂园景图》《人镜阳秋》《程氏墨苑》,金陵刊之《养正图解》,杭州刊之《海内奇观》,苏州刊之《吴骚》无不出于歙县虬村黄氏父子昆仲之手。黄氏家族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此外还有汪忠信、汪成甫、王玉生、蔡鸣凤、刘炤、姜体乾、洪国良、谢茂阳等镌图名手。这些刻工往往带有世代相传的家族行业性质,阵容庞大、水平精良。这些刻工大多流寓苏州、吴兴、杭州等出版业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输出的刻工迅速在各地书肆坊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以家族相传的形式将娴熟的工艺流传下来并影响到武林和金陵版画。

徽州黄氏刻工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黄应光、黄诚之、黄启先、黄君倩、黄肇初等都曾刻过《水浒传》图像。如黄应光的容与堂本《水浒传》、黄诚之和刘启先的《忠义水浒传》、黄君倩和黄肇初二人分别刻的《水浒叶子》等,都是《水浒》图像史上的重要代表,同样亦是徽派版画风格的代表作。黄氏刻工不仅人数众多,其中不少人的技艺也达到了巧夺天工、炉火纯青的化境。他们的作品,一改建安派简朴草率,金陵派粗豪雄劲的作风,而形成了繁缛细致、绵密工丽的艺术特征。这既是对虬村黄氏作品,也是对徽派艺术风格的概括总结。以往学界认为:“徽派版画的崛起,是明代版画艺苑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古版画史、古小说版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分水岭意义的一大标志。”<sup>[30](P44)</sup>他们特别强调新安派(徽派)技法并不拘守于当地,而是在汲取此前诸家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婉约的风格特点<sup>[30](P45)</sup>,绵密富丽、精工细致。代表作品有明万历十五年(1597年)玩虎轩刊《元本出相南琵琶记》,图双面连式,黄一楷、黄一凤刻,图版格调清新,绘人写事图景抒情无不已臻化境,刀笔细腻圆润与劲挺流利兼得,是徽派版画史的代表作之一。玩虎轩另刊有《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亦双面连式,汪耕绘,黄镛、黄应岳刻,图版凝丽明净、极富巧思,是和《琵琶记》难分轩轻的版画名作。汪耕,字于田,歙县人,是一位多产的版画艺术家,画风富丽堂皇,地面、窗棂多用装饰性界格铺满,显得极有特色,极富韵味。

#### 4. 武林版画

明代杭州刻书业繁盛<sup>[31-32]</sup>,万历以后,不仅是当时重要的出版地区,也是全国四大图书聚散地之

一。这个时期,杭州书籍插图的内容非常丰富。杭州所刊版画,习惯上被称为武林版画。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杭州双桂堂刊《顾氏画谱》,又名《历代名公画谱》,是顾炳采辑晋代至明代顾恺之、张僧繇、阎立本等106位画家的106图,后又增加王若水和刘节2人,实为108幅作品,缩小尺幅,细摹精刻,前图后传,实为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绘画史。所摹唐代阎立本《斗茶图》、五代黄筌《雀棘图》、宋代郭熙《行旅图》,相当逼真传神。刻工刘光信以疏朗明晰、厚重而不失流利的刀锋,表现不同的勾线、皴法和不同的风格、气韵,使这些历代名作虽施之枣梨而不失神韵。其中释氏画有七八幅,刻印皆极精致。所摹李公麟的《洗象图》,用大片墨底刻象身,阴刻刀法表示轮廓结构,人物则全用阳刻,明暗相映成趣,镌刻刀锋厚重流畅,不失原作神韵。《顾氏画谱》集历代画法之大成,堪称“中国古代名画集”。万历年间杭州金氏清绘斋刊有张成龙摹辑的《名公扇谱》(又名《张白云选名公扇谱》),陈继儒序文称此谱所选扇图“山水则气韵嘘吸,人物则神情洒落,花卉则展转生动”,“旨趣都入化境,所谓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又刊有《古今画谱》(又名《唐六如画谱》),虽然所谓“唐解元仿古画谱”乃伪托,但版画刀法谨严,当系名手所刻。万历至天启年间刊刻的画谱丛书《集雅斋画谱》,主要由蔡元勋(字汝佐,号冲寰)画,刘次泉刻镌,是一部版面很大、图文并茂的画谱。一般正面是图版,反面刊印唐诗题句。画工在山水花鸟各方面,传神地摹写了古人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刻工们的刀锋泼辣大胆,而又不失缜密细致,可谓绘刻双精。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杨尔曾夷白堂刊印的《海内奇观》是一部山水版画图集。由当地画家陈一贯绘图,徽州刻工汪忠信雕镌。书中所附版画的表现形式多样,就印刷装订形式而言有单面式、合页连式、多页连式,多页连式出现有长达27页的大型山水版画。该书标举“卧游”,但是书中使用图绘的来源众多且复杂,我们搜寻这些图像的来源,至少能看到3种不同的志书为杨尔曾所用。第一种是《齐云山志》(1599年),原绘图者为丁云鹏,杨尔曾将山志中的长达20个半页的图绘,加到《海内奇观》的第一卷,以“白岳”为题,就放在五岳之后。第二种是长达27个半页的普陀山图,这张长卷被放在《海内奇观》的第五卷,如果加上前面的普陀寺殿图(半页)、镇海寺殿图(半页),共有29个半页。这29个半页,实际上都是取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太监张随所刊《重修普陀山志》中所刊之图。第三种

则是收入《海内奇观》第三卷的与西湖相关的图像,均来自《西湖游览志》。《海内奇观》将原来《西湖游览志》中“西湖十景”2个半页合看组成一个景致的做法,改成单个半页即表现一景的构图方式,在对看的另外半页则刊出题咏的诗文。《海内奇观》的编者收罗了许多来自志书的图像,图像的处理方式有几乎直接的摹绘(只有些微的更动,如放入较多的点景人物),也有组合式或是较为剧烈的图像变动。而图像的风格,既有来自地图的摹绘系统,又有较为接近山水绘画的传统,因而在风格上呈现极多不同与复杂的面向。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起凤馆刊刻的《王李合评北西厢记》,插图21幅,卷首有莺莺遗照一幅,汪耕绘,黄一彬、黄一楷刻。版式为对开合版。版面布置富丽堂皇,背景繁复,除人物外,又精心布置了假山竹木、罗帏珠帘等配景,图中的窗格和地面都作界画图案,钩勒精细,描摹工致,几与界画无二,画面精细准确,刀刻细腻圆润而又劲挺流利,图中人物已不是传统习见的头面略大的造型,已变为长身玉立、苗条俊秀的体态,形象玉立修长,是汪耕作品人物造型的典型特点,刀刻一丝不苟,为《西厢记》版画中最脍炙人口的名作之一。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刊《青楼韵语》,张梦徵绘图,其中5幅有刻工姓名,分别为黄端甫、桂芳、一彬。郑应台序称:“梦徵少年,胸次何似,所以晋、唐、宋、元师法无不具;山形水性,禾态乔枝,人群物类无不该。淋漓笔下,绝于古而尚于今也。”《凡例》又称:“图像仿龙眠松雪诸家,岂云遽工?然刻本多谬称仿笔,以诬古人,不佞所不取也。”插图中的画面布局及环境景物的安排别具匠心,颇有园林意趣。题诗句“斜阳江上烟痠疾,怎对却西风立”的一幅,用几乎接近粗犷的劲健笔锋、线条,勾勒了江水、波涛、山石、虬松等景物,劲挺的松枝、汹涌的江水几乎占满了画面,画幅上仿佛真的传来了阵阵江潮声、松涛声,吹来了使人站立不住的西风。刻工的刀锋生动流利。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七峰草堂刊《原本牡丹亭记》,版画雕刻精美,画面景物雕镂细致,门窗、地砖、簟席花纹繁密整齐工细,室内必连带表现室外。单面方式图40幅,署名刻工有鸣歧(黄一凤)、端甫、吉甫、翔甫、应淳等。刀刻纤丽而流畅自然,是《牡丹亭》版画中影响较大的本子。

虎林容与堂刊,吴凤台、黄应光刻图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不少图版全无背景,看似不事雕饰,但线条运用圆润而不失劲挺,古拙中更见秀

雅,人物益显突出,与常见武林版画隽秀清丽的风格大不相同,与黄应光所刻《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西厢记》等戏曲插图的纤巧细密,亦宛若殊途。该书有图200幅,可谓洋洋大观。而崇祯年间黄诚之、刘启先刻图本《忠义水浒传》,有图50叶100幅,构图繁复,人物性格鲜明,手法灵活多变。“斗杀西门庆”、“火烧翠云楼”等图,采用俯瞰式构图法,由近及远,层次分明,成功地弥补了线条图缺少立体感的缺点。该书中的版画为明末清初袁无涯刊本《忠义水浒全书》(卷首有杨定见序,又称“杨定见本”)、明末三多斋刊本《忠义水浒全书》、清康熙芥子园刊《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因袭翻刻。

《新刻批评绣像金瓶梅》,图100叶200幅。署名刻工有刘启先、刘应祖、黄子立、黄汝耀、洪国良等。《金瓶梅》一书,人物众多,情节曲折。镌图者在对图书内容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把豪门显贵的家庭生活场景及享用物品等,以写实的手法一一捉写在图版中。洋洋洒洒200幅图,皆是匠心独具,别出机杼的佳作,在明末小说版画中属最细密繁复而又富于变化的一部。其他如黄子和、刘启先刻《新镌绣像小说清夜钟》,未署绘镌人的《镌于少保萃忠传》《西湖二集》《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崢嶸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型世言》诸本,亦称一时之选。

明天启四年(1624年)武林刊本《彩笔情辞》,是元明时期的散曲集,刻工黄君倩,一般认为即黄一彬。编者张栩自言:“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景物灿彰。”<sup>[33]</sup>这类图像已使插图成为一种山水景物图的创作,其画注重气韵的流动,山光水色、云气雾霭、水纹衣袂皆具动感。插图版式的创新,如延阁李氏的《北西厢记》首先采用外方内圆的形式开创月光式插图,尔后在苏州地区得到了发扬光大。《绣像传奇十种》汇刻《喜逢春》《咏怀堂十错认春灯谜记》《望湖亭记》《文堂戏墨莲盟》《山水邻新镌花筵赚》《长命缕》《金印合纵记》《评点凤求凰》和《山水邻新镌四大痴传奇》为一编,皆是精美之作,为武林版画的代表作品。

武林版画以戏曲插图为多,天启、崇祯年间小说版画也出现了难以尽数的佳作,所刻人物俊秀,景色绮丽,构图别致,非常重视配景的描绘,设景布图重视对场景的烘托。以往总是强调其表现手法是徽派绵密婉丽的路子,认为武林只不过是徽派的流裔,似难以概括武林版画的艺术价值和独立的地方特色。无论是寄寓武林的徽州名手,还是刘素明、刘次泉这

样的建版巨匠,都在武林地理环境的浸润下,创作出了更为精丽完美的作品,已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

## 5. 苏州版画

苏州书籍刊刻、版画制作的中心地位,在明代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轨迹,到胡应麟生活的年代(1511—1602年),苏州刻本的水准已经超过南京和杭州,刻本之精良,已为全国之冠<sup>[20]</sup>。

明代万历之前,苏州虽然也刊行过一些版画插图本,如《便民图纂》《吴江志》《石湖志》等,但数量并不多,无法与建阳、金陵、徽州、杭州等地比肩。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刊刻的由顾正宜撰、绘的《百咏图谱》和《笔花楼新声》,为苏州版画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sup>[34]</sup>这两书绘写精致典雅,背景繁复,镌刻亦精,冯大受云:“真是诗中画,画中诗。兼右丞之二有,擅虎头之三绝。”<sup>[5](P66)</sup>

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何璧校刊本《北西厢记》,图双面连式,用笔疏阔而气韵自在,人物造型亦颇生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古吴章鏞刊《吴歛翠雅》,双面连式图16幅,刻写极为精细,即使与《青楼韵语》等版画名作相比,亦不遑多让。万历年间苏州另刊有《西厢记考》,双面连式图20幅,卷首冠唐寅绘鸳鸯像一幅,鸳鸯双手支颐,端庄凝静,极具大家闺秀风范。首图署“夏缘宗镌”。图版与黄应光刻图本《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西厢记》(别题《徐文长先生批评西厢记》)同,但镌刻细密纤巧,虽是摹刻之作,亦属上乘。旌德人鲍承勋所刊的《盛明杂剧》初、二集,插图注意环境的刻画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技艺精湛。

明天启三年(1623年)吴门萃锦堂刊本《词林逸响》,书分风、花、雪、月4集,图双面连式,清新明快,刀刻线纹匀洁,神腴澹远,颇值得玩味。散曲选集《太霞新奏》传为冯梦龙辑,图双面连式,插图重视环境描绘,山石林木、楼阁天津、碧水轻舟、秋风落叶,皆雕镂细致,点缀有情。

创于明万历年间武林山阴延阁李氏本《北西厢记》的月光式插图,在苏州大行其道,一时蔚为时尚。图版外方内圆,其形如镜取影,画面虽小,却颇隽秀典雅。金闾叶敬池刊《墨憨斋评点石点头》,即为明末小说版画中月光式插图的代表作品。狭长型的插图使画面更为紧凑,为许多版本所采用,如陈长卿存诚堂所刊《琵琶记》《西厢记》《投笔记》等、忠贤堂崇祯版《唾红记》、崇祯本《樱桃记》《续西厢升仙记》《珠玑联》等,都采用了这种插图版式。

苏州版画兴起稍晚,但到明天启、崇祯年间则有后来居上之势,所刻既多且精,成为古版画创制极为

活跃的地区之一。苏州的出版家们对插图的作用十分重视,明崇祯四年(1631年)人瑞堂本《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凡例》中说:“兹编特息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奇妙。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木刻插图已经近于一门独立的艺术,成为可以离书去欣赏的绘画珍品。

书籍版画作为绘画的一个门类,用木版刻印书画,也是书画市场的一部分。徽人汪芝曾在苏州刻印《黄庭经》等帖,花费巨大,以至穷困而死,为人所笑。但数十年后,《黄庭经》刻版毁于火,汪本成为珍本。“好事家无处搜寻,价遂腾涌至五六千钱”,同为徽人的詹景凤搜索多年,也只得到3本。<sup>[35]</sup>

### 6. 吴兴版画

吴兴地区的版画在明泰昌、天启年间异军突起,很快就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最为著名的是以朱墨套印出名的闵、凌两家。两家刻书140余种,有插图的不过10余种,多为戏曲版画。《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收录了两氏所刻套印的书影<sup>[36]</sup>。闵、凌两家皆为吴兴望族,从事过刻书的人颇多,而其中最著名者为闵齐伋和凌濛初,他们以印制朱墨套印图书著称于出版史。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版画大多署王文衡绘。王文衡,字青城,苏州人,是一位多产的版画名家。刻工则有黄一彬、郑圣卿、汪文佐、刘杲卿等,均是徽州人。所刻《红拂记》《董西厢》《邯郸记》《西厢五剧》《幽明记》《鸳鸯缘传奇》及散曲选集《南音三籁》等,都是出色当行的版画名作。版画注意构图的变化,以背景为主,意境深远,人物在画面所占比例较小,以背景铺陈为主,但绘刻精丽,虚实处理得当,景多萧疏荒凉,图绘清丽静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闵刻《会真记》是中国古代版画的巅峰之作。

“寓五笔授”本《西厢记》仅存21图,原刊本现藏德国科隆肯斯特博物馆,序、跋、正文、牌记等皆已佚去。21图皆为彩色,在刻印中采用了笺谱、画谱已有的技法,构图造意更是匠心独运,不落俗套,如描绘张生、崔莺莺“对月联诗”一出,画面仅绘有一对蝴蝶和两片叶子,叶上分题张、崔遥对吟哦的诗句,清新别致,寓意深远。色彩运用浓淡相宜,搭配自然和谐,就如顾炳鑫所言:“艳而不俗,鲜而不火,显得典雅素洁”,从而在尺幅之内,把一曲闪烁着人性灵光的千古传颂的恋歌,用绘画的语言,流畅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此本正文不存,当然是一个遗憾,但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存世价值,因其已成为可以离书而独立的古代彩印、套印版画珍品。

## 三、对明代书籍版画区域风格的讨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地域为代表的刻书、版画研究逐渐被关注,周芜先生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武林插图选集》《徽派版画史论集》开创了地域书籍版画研究的先例。另外,以家族为代表的刻工也被关注。

学界对于明代书籍版画注意的大多是区域版画风格,认为明代中后期形成许多风格各异的版画中心。以梓行地来分,以福建建阳为中心的建安派,作品多出自民间工匠,镌刻质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派,作品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采迥异;以杭州为中心的武林派,题材开阔,刻制精美;以安徽徽州为中心的徽派,富丽精工,典雅静穆,并特别强调徽派艺术风格在晚明的大一统格局。周芜将“徽派版画”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徽派版画有两个含义:广义地说,凡是徽州人(包括书坊主人、画家、刻工及印刷者)从事刻印版画书籍的都算徽派版画;狭义地说,是指在徽州本土刻印的书籍版画,才是徽派版画。”<sup>[37]</sup>有人进一步明确“徽派版画”这一概念的两层含义:一是指徽州本土刊刻的版画;二是指徽派艺术风格的作品,而不论是否刻于徽州本土。<sup>[38-40]</sup>

在周芜的广义标准中,凡是徽州人参与刻印的版画,都是徽派版画,而且无论这个徽州人是书坊主人、画家、刻工还是印刷者,一概算在其内。后起继承者显然是注意到了周芜观点的严重缺陷,因而将该定义作了修改,这样,外地书坊翻刻或重刻现成的徽派版画插图,也就都属徽派版画了。如果把周芜的定义也包括在内,则几乎全部晚明江浙地区的版画,无论是怎样的面貌,都可以被认定是徽派版画。张国标《徽派版画》就是这种定义的积极推动者。他们特别强调,徽州刻工人才济济、名工辈出,而且晚明以后的徽州刻工是流动的,使各地刻工直接或间接接受徽刻名手技艺的熏陶,也开始采用徽刻手法制作插图或画谱,如杭州的项南洲、萧山的蔡思璜、苏州的朱圭,他们的作品,在刻板技法和版刻风格上承袭徽派版画的风格和刻法,从而使各地的版画风格向徽派靠近。甚至有学者认为,杭州等地的刻书业和版画开始为徽派风格所主宰<sup>[41]</sup>,晚明的版画艺苑成了徽派的大一统。周亮在《明末武林和苏州版画共同性初探》中例举武林和苏州版画一些作品,旨在说明两地版画从天启年间开始已逐渐摆脱徽派的造型样式,到崇祯年间两地版画风格逐渐趋于统

一,徽派那种注重近景描绘的作品以及徽派特有的“点”刻技巧已经消失,明末的版画已由以“精工”为主的徽派版画转向以“精巧”见长的苏杭版画,这是对徽派大一统说的一个修正。但周亮还认为徽州刻工带去两地的镌刻技巧,是促成武林和苏州版画风格统一的原因之一,因为徽州刻工大多往来于江浙两地,从事刻书业,为了在镌刻图版中求得风格的一致性,刻工们在技巧方面相互包容、相互靠拢。为此周亮还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徽州刻工在江浙镌刻的版画作品,未曾发现同一版本里的版画有多重风格。<sup>[42]</sup>周亮作这样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他只考察了同一版本里版画的风格,而没有考察一个刻工在不同版本里的版画有多重风格。

当然,版画风格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绘图者所师承的风格,或是雕版者在雕刻时所创出的风格,二者都可能对版画的呈现有所影响。王伯敏在写作《中国版画史》时,就已意识到以刻工籍贯为标准划分出来的“徽派版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只是没有能够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他在提到金陵版画时就说:“而以徽州一地的刻工而言,往往很难具体地指出他是徽派还是金陵派。”谈到吴兴版画时则说:“它所绘刻的,与金陵、徽州都相似,而聘请的刻工,如黄应光、郑圣卿等,也都是徽派名手。所以便不以派系相称,但也有它相当的成就。”<sup>[43]</sup>董捷首先揭示绘图者与刻工在版画创作中不同的地位,绘图者对于风格形成、演变起主导作用,“刻工所要做的,就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版刻技术将绘图者画稿的原貌尽可能不走样地传达出来。传达的准确熟练与否,是评判刻工优劣的首要标准。对于刻工的这种要求,是中国古代木刻作品作为复制版画区别于现代意义上创作版画的重要特征”<sup>[15-16]</sup>。这种揭示对于版画史研究意义十分重大。笔者赞同董捷的观点,在《胡正言十竹斋的版画艺术》中,认为都是版画创作者的画师与刻工,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从十竹斋二谱来看,是绘画者的画风决定版画风格。董捷还指出,如果把刻工作为作品风格的决定因素,就很难解释起凤馆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与凌濛初本《西厢五剧》中两种构图、笔法、趣味都大相径庭的作品,如何会出自同一刻工歙县人黄一彬之手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周芜狭义的标准来看,只有徽州本土刻印的版画才算徽派版画,那么像金陵环翠堂、武林起凤馆这些其他地区徽籍画师的作品就都排除在外了,而且徽籍画师的作品并非千人一面,风格也随时代风尚而改变。郑振铎总结过徽派版画插图的特点是隽

秀、健美、婉约。大家有一个共识,徽派版画应该具有类似汪耕绘图的《人镜阳秋》与《坐隐图》等版画作品那样人物修长、线条细腻的特色。或者如董捷所界定的:即使一定要以地域框架来界定版画流派,徽派版画也只能是指以下几种情况:(1)以汪耕等人为代表的徽籍画师绘稿的版画作品;(2)其他地区画师模仿徽籍画师风格绘稿的版画作品;(3)其他地区书坊翻刻或重刻现成的徽版插图的情况。<sup>[15-16]</sup>徽派版画自其肇始之初,走的就是较为工细的路子;至万历中叶,形成繁缛细密、工致纤丽的典型范式。纤丽、工细的艺术作风是徽派版画鲜明的特色。

周亮又提出对徽派版画重新定位的观点,焦点之一就是用什么尺度来衡量版画风格、来归类版画流派。<sup>[44-45]</sup>他认为徽派版画是一个跨地域的流派,它的影响力之深远,是其他地区版画很难相比的,徽派版画给其他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带来了对版画流派划分的复杂性。然而,如果将徽州刻工在不同时期镌刻的徽派版画全面地比较、分类,找出这些作品的同异性,对正确认识徽派版画是有所裨益的。具体来说,明万历时期和天启、崇祯时期的徽派版画总的风格就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精工和精巧这两方面。精巧的风格也不能完全算是徽派风格的延续,而是一种脱胎于徽派而产生的新样式,就这点而言,武林和苏州做得最彻底<sup>[42]</sup>。

随着研究者的增多,对明万历年间尤其是中晚期的版画插图,提出以艺术特征将其归类为质朴派、雄劲派、婉约派的新方法。因为建安版画、金陵版画也有较为工丽的作品,徽派中也有较为简朴的风格,本不好按地域一概而言。姜宇钦以万历中晚期徽州与金陵两地版画插图风格趋于统一化为证,两地现存版画插图刊本中既存在偏向于徽州工丽婉约的作品,也有注重金陵简朴风格的作品,认为若以刊刻地区称其为金陵派或者徽派版画插图确为不妥,容易造成古版画插图赏析的误区。因此较之以原有的版画插图归类方式,以艺术特征将两地作品分类研究的方法确实更具准确性和概括性,也有利于古版画插图史的梳理与研究<sup>[38]</sup>。

现藏日本的明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构图繁复而有变化,富于装饰趣味,绘刻手法古拙,与弘治刊《西厢记》除版式不同外,在人物造型、刀刻运用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以往学者认为这说明在当时交通并不便利的条件下,南北两京在戏曲版画艺术上是相互影响、有所交流、互为借鉴的,实际上这也说明明代的木刻版画

是复制版画,并没有如学界认为的有那么明显的地域特色。

#### 四、明代木刻版画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代木刻版画的构图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图式一样,沿用散点透视法。这与西方的铜版画在形式风格和绘刻技艺方面都不一样,明人顾起元就看到了这种不同,他在提到利玛窦时,对此做了如下描述和解释:“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手臂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sup>[46]</sup>到晚期,如同在绘画方面有一些画家开始学习西方绘画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掌握了透视和明暗画法,在中国古代木刻版画领域也出现了西方艺术的透视和投影技巧,可能是用中国古代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而留下的。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洋画作品,有油画、铜版画等,“利玛窦记载道,来到广州附近的肇庆参观传教团的中国人,被传教士带来的有关宇宙起源与建筑学方面的图书所吸引,这些书向人们展示了西方的王国、乡村以及欧洲美丽的城市等等”<sup>[47]</sup>。为了便于传教,传教士将一些艺术品赠与当时有威望的达官贵人,以取得他们的支持。1598年10月18日,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写信向耶稣会总会长提出要求:“如能送来一些画有教义、戒律、原罪、秘迹之类图画的书籍,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西方绘画采用了阴影画法,这在中国绘画中是没有过的。这些画会被中国人看成制作精妙,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从而受到欢迎。”<sup>[8]</sup>在传教活动中分发大量的圣像、纪念章和带有插图的书,利玛窦说:“人们争相拉拢我们,有的刻印我们的作品,有的重刻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情的书,有的在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至于《世界地图》每年都有出版,或单独印刷,或附在讨论地理的书籍中。”<sup>[49]</sup>翻刻应该是因为从欧洲运来的数量不多,不足用来分发,神父们要在中国本土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人不会铜版雕刻技术<sup>[50]</sup>,只能找当地刻工用木版印制,这大概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就已经开始了。<sup>[51]</sup>苏立文说由于书籍插图和雕

版印刷品数量众多,也易于被中国的木版改作,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sup>[52]</sup>但当时用于传教的木版画印刷品已不可得见,只留存下为数极少的用中国古代传统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的,如《程氏墨苑》中4幅《宝像图》、《诵念珠规程》和《出像经解》里的插图。明末木刻版画中已经能够看出对主体物的描绘出现了由近大远小、黑白相间、层叠遮挡的效果。如《程氏墨苑》第十四卷中的《石墨山九曲水图》,用平刀先大刀阔斧地将山和树的轮廓铲出来,再在留出来的主体物上简练地阴刻出山脊和树干,整幅画面的构图运用了西方艺术透视法近大远小的原理,层叠遮挡有致;王树村<sup>[53]</sup>在明代民间年画中所介绍的《十王图》和《三教搜神大全》,图中桌子的桌面、地板台阶、人站立的走向和墙围等都具有了西方艺术的透视效果。西方艺术的透视法对中国传统版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有哪些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孔国桥. 关于版画特性与制作的一点思考[C]//20世纪中国版画文献.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 [2] 阮荣春,顾平,杭春晓. 中国美术史[M].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拾遗[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郑振铎. 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第9册)[C].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 [5] 郑振铎.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6] 周芜. 中国古本戏曲插图选[M].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 [7] 凌君武. 承传的意义——对传统版画艺术特质的一点思考[J]. 画刊,2005(4):56.
- [8] 王永亮. 明代木刻版画中的创新价值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08.
- [9] 万脂亮. 浅谈版画艺术传统、技术与艺术及内涵表现[D].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8.
- [10] 叶盛. 水东日记[M]. 魏中平,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80:213-214.
- [11] 王实甫.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增奇妙注释西厢记[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12] 元鹏飞. 戏曲与演剧图像及其他[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3] 元鹏飞. 论明清的戏曲刊本插图[J].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3):25.
- [14] 王清原,牟仁隆,韩锡铎. 小说书坊录[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9.

- [15] 董捷. 明清刊《西厢记》版画考析[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
- [16] 董捷.《西厢记》插图的绘刻者[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6(1):82.
- [17] 汪廷讷. 坐隐奕谱[M]. 汪耕,绘. 黄应组,镌.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8] 章宏伟. 胡正言十竹斋版画艺术[C]//中国版画全集·画谱卷.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 [19]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0:9.
- [20]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9.
- [21] 谢肇淛. 五杂俎[C]//续修四库全书(第113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08.
- [22] 王伯敏. 中国版画通史[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62-64.
- [23] 张秀民. 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J]. 文物,1979(6):76.
- [24] 孙楷第.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M]. 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134.
- [25] 刘修业. 古典小说戏曲丛考[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65.
- [26] 柳存仁.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97.
- [27] 原方. 余象斗“评林体”初探[J]. 明清小说研究,2007(3):219.
- [28] 郑尔康. 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381.
- [29] 王伯敏. 中国美术通史(第5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242.
- [30] 周心慧. 中国古小说版画史略[C]//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31] 章宏伟. 论明代杭州私人出版的地位[C]//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32] 章宏伟.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J]. 浙江学刊,2012(1):31.
- [33] 王秋桂. 善本戏曲丛刊(第5辑)·彩笔情辞[C]. 台北:学生书局,1988:16.
- [34] 周心慧,王致军. 徽派、武林、苏州版画集[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24.
- [35] 詹景凤. 詹东图玄览编·跋汪芝黄庭赠陈玉叔廷尉[C]//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998.
- [36] 王荣国,王筱雯,王清原. 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C]. 扬州:广陵书社,2006.
- [37] 周芜. 徽派版画的特色[C]//徽派版画史论集.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1-12.
- [38] 姜宇钦. 万历年间徽州与金陵两地版画插图关系的研究[D]. 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09.
- [39] 周亮. 从明清金陵、苏州版画的演变观其风格的同异[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113.
- [40] 周亮. 明末徽派版画对武林版画的影响及武林版画新的风格确立[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15.
- [41] 张国标. 徽派版画[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63-165.
- [42] 周亮. 明末武林和苏州版画共同性初探[J]. 创意与设计,2010(3):65.
- [43] 王伯敏. 中国版画史[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 [44] 周亮. 徽派版画重新定位之我见[J]. 中国教育导刊,2008(11):49.
- [45] 周亮. 明清戏曲版画[M].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9.
- [46] 顾起元. 客座赘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91:194.
- [47] [英] 苏立文. 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C]//莫小也,译. 东西交流论谭(第1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48] [英] 苏立文. 东西方艺术的交流[M]. 陈瑞林,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51.
- [49] [意] 利玛窦. 1608年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RudolfoAcquiva)神父书[C]//利玛窦书信集. 罗渔,译. 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369.
- [50] [意] 利玛窦,[比]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3:498.
- [51] 戎克. 万历、乾隆期间西方美术的输入[J]. 美术研究,1959(1):51.
- [52] 张焯. “洋风姑苏版”研究[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9.
- [53] 王树村. 中国年画发展史[M].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2)06-0106-04

# 妙在精微 得于象外

——论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中的造型与观念

刘高峰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超级写实主义油画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兴起并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一方面缘于我国民众对艺术创作多样化的渴求;另一方面在于这种艺术创作方式一经引进中国便立刻融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其不同于西方超级写实主义原有的艺术特质。其中的主要体现就在于,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不仅注重对画面形象的精微刻画所给予观众极其真实的视觉冲击,还在于通过对艺术象外之意的观念表达,给予观众以心灵震撼。

**[关键词]** 超级写实主义油画;形象刻画;观念表达

**[中图分类号]** J2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9

超级写实主义又称照相写实主义,源自并兴盛于美国,其后波及世界各地。超级写实主义绘画是在现代摄影技术发明之后,欧美画家查理·克洛斯、理查德·埃斯蒂斯等人借助于照相机、幻灯机等现代科技工具,发展起来的一种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画面造型极其逼真的绘画形式。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油画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这一艺术风格留给我们最初的深刻印象莫过于1980年代初罗中立创作的《父亲》(见图1)中那种极其细致入微的形象描绘和画中主人翁感人至深的神情述说留给观众的心灵冲击。正是这种视觉上的“极其真实”和情感上的“深切感动”所给予观众的审美体验,使得超级写实主义画风在中国迅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如广廷渤、冷军、石冲、徐芒耀、艾轩等从事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杰出画家。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体现了一种艺术家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的方式,它在我国的迅速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一方面缘于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众对艺术创作多样化的渴求;另一方面是这种艺术创作方式一经引进中国便

立刻融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其不同于西方超级写实主义原有的艺术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不仅注重对画面形象的精微刻画所给予观众极其真实的视觉冲击,还在于其对艺术象外之意的观念表达,从而给予观众心灵震撼。

## 一、精细入微的形象刻画

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主要艺术特征在于艺术家利用现代摄影及投影技术等科技手段对画面形象进行极其细致的描绘。如美国画家克洛斯、埃斯蒂斯等人笔下尺度巨大的人物肖像、城市街景中的各类物象,不论是人物面部的细微褶皱或细小的毛孔,还是简单的一个瓶子、一辆汽车或一件化妆品等,经过艺术家无微不至地深入刻画,都呈现出一种极其真实的人物形象或是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城市景观。正是这种对画面形象“真实性”的极致追求,使得画面中呈现给观众的艺术形象既极度真实,又非常陌生。这种画面的极度真实往往一方面令很多观众不禁感叹“画得比真的还像”,另一方面又带给观众一种将信将疑般的好奇。所以,“当观众直面一个尺寸数

**[收稿日期]** 2012-08-10

**[作者简介]** 刘高峰(1964—),男,安徽省固镇县人,安徽财经大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倍于常态而描绘的真实形象时,随之而来的是视觉上全然的陌生感和巨大的震撼感。艺术家以全新的形式改变了人们惯常的视觉接受模式,建构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具象世界’”<sup>[1]</sup>。就如同我们用高倍显微镜观察一个我们平时都非常熟悉的物体所看到的另一个陌生的微观世界一样令我们感到万分惊奇。因此,尽管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利用了照片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极其细致的描绘,但是这种艺术创作手法并不是对照片的简单放大,其中追求细致入微的艺术价值更多地体现于画者对一个陌生世界的探索和发现,并一丝不苟地将这种探索和发现的结果用绘画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图1 《父亲》(罗中立,1980)

中国超级写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带给观众深刻的视觉冲击并迅速兴起,首先就在于其吸收并强化了西方超级写实主义画风中,对艺术形象细致入微地深入刻画造型手法,使得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作品非常写实并非常具象,很快得到观者的欣赏。作为早期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的代表作品,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是在表现方法上融入了细致入微、极其逼真的油画语言,描绘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巴蜀老农的巨幅肖像,给民众创造了一种十分亲切的语言形式,使观众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可以说,如果《父亲》不以这种超级写实主义艺术手法进行真实的描绘,它就不可能令观众产生如此大的视觉冲击和深远影响。所以,当这种极其写实的作品首次出现在中国的美术展厅时,民众和艺术家受到的

强烈感官冲击正是源于它的形式的新颖及画面的逼真。此外,像广廷渤的《钢水·汗水》、冷军的《五角星》《肖像之相——小罗》、石冲的《欣慰中的年轻人》《今日景观》等众所熟知的油画作品留给观众的强烈视觉印象,无不都是高度细致的超级写实之风。

作为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文化产物之一,油画之于中国民众的深刻印象也是在于其相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无比真实性。为了达到画面形象的真实效果,身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油画技法的先驱者之一,徐悲鸿就曾强调绘画作品要“尽精微,致广大”<sup>[2]</sup>,并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从徐悲鸿当时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油画风格在中国受到的普遍欢迎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艺术家,都对写实、具象的油画作品具有普遍的审美认同。所以,当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超级写实主义画风被中国的艺术家吸收并强化之后,它就立刻获取了我国民众的审美认同,以其无比的亲切感在艺术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画家,他们以中国式的超级写实主义艺术手法,强化并丰富了具象油画的艺术语言。

## 二、意味隽永的观念表达

虽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国家,但除了这种极其细致逼真的绘画风格带给观众难以置信的惊叹之外,超级写实主义画风在西方国家并不被当时的评论家所看好。尽管西方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中过于强调艺术家的个人情感而忽视画面造型的一种修正,但其自身又陷入了另一种矫枉过正之境地。所以,在诸如克洛斯的《肯特》《苏珊》等人物肖像作品中,尽管画面刻画得非常精致入微,但由于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自然会招来艺术批评家对其画面中造型机械、人物表情麻木、呆滞等缺陷的指责。因此,如果超级写实主义不从绘画的思想主题等内在方面下工夫,而仅仅停留在对照片机械摹写之层面,写实性绘画难免有一天会被日益发达的摄影等现代科技逼到死亡的墙角。

自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之后,绘画与摄影之间便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对话。可以说,摄影术既冲击了西方古典主义写实油画的发展,也催生了现代超级写实主义油画的形成。如今,人们可以利用数码摄影、电脑合成以及镭射投影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绘画辅助创作,可以达到前人无

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细致入微的真实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相信超级写实性绘画的绘制技术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艺术价值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艺术形象的精益求精的表面刻画上。艺术家通过写实的图式再现所表达出的各种思想内涵将慢慢成为主导观众欣赏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重要审美因素。回顾中国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超级写实主义这一绘画形式被引入中国之后,不仅强化和丰富了写实性绘画的造型语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艺术家将其融入到了中国传统艺术注重表意的文化背景之中,利用超级写实的手法赋予了作品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亦即在作品中赋予了某种观念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国家的写实性绘画在“绘画死亡论”的唱衰下日渐式微之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反而在中国扎下了根,并有了枝繁叶茂之势。

事实上,尽管在中国的古代文论或画论中并没有“观念”一词,不过中国传统艺术的诗、文、绘画都非常讲求立意。例如,早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古代美学中就有“得意忘象”“立象以尽意”之命题。其中之“意”与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言“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之“意”在内涵上相同,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之“观念”。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论中虽无“观念”一词,却有注重观念之实。可以说观念(即“意”)是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之灵魂,否则便是虚得其貌之劣作,亦如宋代文豪苏轼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回顾和总结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的发展取向,我们发现无论是罗中立的《父亲》,还是冷军的《五角星》系列、《肖像之相》系列,或是石冲的《行走的人》《欣慰中的年轻人》《物语》等,都不仅仅是对物象的简单描绘,更多的是通过具象写实的手法表达某种富含思想内涵的观念。以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金奖的冷军作品《五角星》(见图2)为例,画家所描绘的五角星原型是利用废旧的炮弹壳焊接而成的一个在现代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物象,这样其首先就已经是一个被画家注入了特殊内涵的审美观照对象,然后再经过艺术家运用超级写实的手法重新再现到画布上,所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幅简单的超级写实的静物画,而是利用这样一种审美观照的对象所表达出的一种寓意深刻的主题。

再如,石冲的油画作品大多来自他自己设计的场景的照片,其照片中的场景是经过艺术家精心构思并

注入了一个先在的观念而摆设的,然后用相机将布置好的场景拍摄下来,再通过超级写实的绘画手法进行细致的描绘。作者利用装置、化妆行为、摄影、手工绘制等一系列操作方式,将类似于表达观念的装置艺术转化为架上绘画,从而创造了一系列如《某年某月某日的肖像》《行走的人》等作品,其中充满形而上意味,蕴藏着许多难以捕捉的具有隐喻性的东西。正如石冲本人所言:“绘画能够对当代艺术予以补充并使之产生活力的因素,应是其观念上的当代性,当前卫艺术已逐渐丧失了其可供衡量的价值标准时,更是如此。我试图在不丢开架上绘画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以当代性与这种现实对抗,对抗的方式是观念形态的设置,即在以具象方式呈现‘第二现实’中,输入装置、行为艺术的创造过程和观念形态,从而创造出所谓‘非自然的艺术摹本’。”<sup>[3]</sup>



图2 《五角星》(冷军,1999)

当然,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在强调表达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形的塑造。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绘画是建立在极度具象写实的造型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传达。冷军就曾表示,“我不赞成在艺术上一味张扬自己形而上的思想观念而忽略了形而下的完整表达”,并认为“艺术不是仅凭理性知识或清晰思辨所能够把握和完成的,画面上具体的审美情结及心灵与眼、手同步,才有可能达到有效的结果”<sup>[4]</sup>。

### 三、结语

在中国的传统文艺思想中,一向注重“象”与“意”、“形”与“神”或是“画境”与“意境”等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系辞传》中

提出了“立象以尽意”之命题,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说,五代荆浩提出的“图真”说,宋人苏东坡提出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等皆是强调绘画不能局限于对物象的表面描绘,更要通过对客观物象的描绘以达到“尽意”、“传神”、“取其真”或“取其意气”之目的。所以,当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传入中国之后,创作者将类似于“尽意”、“图真”等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现代艺术中的观念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必然之果。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超级写实主义绘画给人的观感就不仅仅是对绘画本体之表层意义上的技艺上的惊叹,而是绘画本身所蕴含的观念的价值,即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传达给了我们怎样一种信息。当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中的观念表达一般都是很含蓄的。艺术家把自己对生

活、对社会、对艺术的思想见解、情感体验等用非常细腻而又含蓄的写实手法融入到作品之中,留给观众的是看似很具象、很直接的绘画形象,实则是一个个很隐秘、很含蓄的遐想艺术空间,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品味余地。

### [参 考 文 献]

- [1] 范明正. 重读超级写实主义绘画 [J]. 装饰, 2005 (2): 48.
- [2] 陈传席. 中国绘画美学史 [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586.
- [3] 石冲. 学术自述 [C] // 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画册.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6: 58.
- [4] 刘淳. 中国油画史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424.

(上接第 60 页)

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事实上,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重在教人如何顿发善心、自悔恶业、晨夕顶礼、持诵佛号,以求解婴孩恶痘之苦,与一般谈空说无的佛经有所不同,但也绝非王阳明所说“与虚无之谈异”。这部佛经与其他佛经一样,都是阐述佛教性空理论的经典,如经中有语:“缘诸众生,无始劫来,薰染真性”,“真性不坏,生生不减。缘众生心,妄起善恶”。<sup>[1](P416)</sup>这是以真常佛性为依据,认为不妄不变之真实本性是人本具之心体,而众生心“无始劫来”则是妄念所薰染。可见,这部佛经大体因循佛教一贯的主张,而非“与虚无之谈异”。这种态度不同于弘治十五年“渐悟仙释之非”时对佛教“断灭种姓”的看法。王阳明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极有可能是谪居龙场之后,逐渐接受了佛教的教义,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

通过研读《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以及《王阳明全集》中的其他资料,可以发现:弘治末年“渐

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弘治十五年的“渐悟仙释之非”的内涵。事实上,这里的“释之非”与其说是批评佛教性空理论的错误,毋宁说是指佛教中的某些做法违背儒家伦理,尤其与儒家孝亲观念不相类,而在个人感情或思想交往上,王阳明并未完全抛弃佛教,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 [参 考 文 献]

- [1] 卮新纂续藏经(第1册)[C]. 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6.
- [2]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吴光, 钱明, 董平, 等, 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3] 郭齐勇, 郑文龙. 杜维明文集(第3卷)[C].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8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2)06-0110-03

# 曲为刚用的河南民间弹弓造型审美初探

张昆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河南民间工艺弹弓别具一格。用单纯自由的线条刻画出弹弓的艺术中枢神经,用曲线曲面勾勒出强大的视觉张力,用自然含蓄的造型传达设计师的刚直品格,这种“曲为刚用”的造型技法让河南民间弹弓显现出独特的魅力。新时期河南弹弓设计以其曲与直的对立、传承与创新的碰撞、本土与时代的结合,展现出质朴的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艺术审美特征。

**[关键词]**河南民间弹弓;曲为刚用;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J52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20

弹弓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十八般兵器之一。弹弓制作是一项古老的技艺,现代弹弓已演变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以一种新颖的民间艺术文化造型走进人们的视野。天下文化出中原。河南民间工艺师在弹弓制作中采用“曲为刚用”的造型技法和表现形式,突破传统的直线造型,以线为骨、以气取势,制作出的弹弓集力量与美观于一体,有着刚柔并济之美,体现出河南民间工艺师质朴的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艺术审美特征。

## 一、民间弹弓的造型嬗变

弹弓历史悠久。在甲骨文中,“弹”的写法是一张弓在弦的中部有一个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表达人使弓上之丸弹出之意。古时弹弓参考弓的设计原理和技术,常用弹性较强的竹、木制成,以竹为胎,外贴牛筋、内裱牛角。后来出现了铁胎弓,形状与弓基本一致,弓弦中央有一小兜,用以发射弹丸,握把称为“柎”,两端悬架称为“峻”,弓臂曲处称为“渊”。似弓非弓的早期弹弓设计(见图1),注重射杀力量,以辅助狩猎等应用功能为主。

当代弹弓设计已突破我们通常印象中的一个木叉加一根皮筋的概念,羊角造型、酒杯造型等各式各样的产品不断出现,产品的材质有木材、金属、动物

骨角等。纵观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弹弓设计,风格大同小异,其外观设计大多追求简洁,产品的生产也较为简单,适合大批量生产并便于携带,售价较低,适合普通大众娱乐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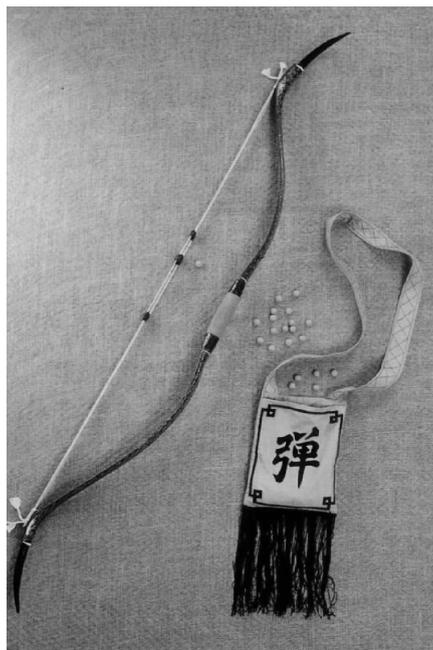


图1 早期弹弓样式

在众多的弹弓设计中,河南的工艺师另辟蹊径,

[收稿日期]2012-08-20

[作者简介]张昆(1980—),女,河南省新乡市人,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华侨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工业设计教育与产品设计。

曲为刚用,用曲线勾勒弹弓刚毅的力量,用曲面体演绎设计师刚直的性格,创造出独特的冲突与对立之美。河南省新乡、焦作等地区的弹弓设计较为典型,以收藏审美为主,其造型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整体造型坚持不用一根直线,传统的木雕技术和现实主义风格并用,追求行云流水般的外形;钟情自然的应物造型,尽物之美、得物之趣,注重材料自身的形式美感;全程坚持手工制作,一件一模,无一雷同;材质考究,细节精制。

图2所示的弹弓,其丰富的曲线将握把有机地切割成多面体,不同曲线的对比与冲突,结合主体材质的天然纹理和光泽,给人以多变的光感和立体感,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味道。自然与人工、质朴与细腻、柔美与刚毅巧妙地集合在一件作品之中,折射出含而不露、外柔内刚的造型风格。该类制品握感舒适、观赏价值高,常令人爱不释手,但其售价也较为昂贵,适合收藏。



图2 河南混合材质弹弓样式

## 二、曲为刚用的技法表达

在造型上,“曲”源于师法自然的流线型设计。笔者在对数十名河南弹弓工艺师随访和查阅其设计样稿时发现,他们的作品均引入西方现代主义的流线型设计,外部形态流畅平滑,充满跑车般的韵律感,给人一种合乎自然的有机生命体的活力,从而唤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在技法上,“曲”借力于传统意象造型技法的延续,工艺师采用传统的挫、推等手段,将传统木工雕刻技艺的投影线、轮廓线和形迹线巧妙运用,以线为

骨、以气取势,应物造型,完全摆脱了以线为纹的装饰附属性。创作灵感常以自然界中的水纹和木纹走势为基础,在弹弓把手上雕刻出独一无二的造型曲面,力求大动势的连贯流畅,体现张力。

小小的弹弓加工工艺非常复杂,单是金属抛光就需要在铸铁、合模、定型三个阶段各进行3—5次。造型过程中,工艺师还以简洁为要,大量使用减法原则,将握把处通过铣、挖、磨等多种工序雕刻成符合人机关系的造型,从不在主体上通过镗、镶、套等方法增加装饰内容。

在材质上,“曲”表现为原汁原味,返璞归真。工艺弹弓所采用的基材均使用材料的原始形态,不使用半成品和成品。木料以硬度高、纹理优雅的太行山酸枣木、赤木树根为上。在加工中,不改变树根的基本形态,尽量打磨出木材的自然纹理,不雕刻花纹和漆图纹样,最大程度地表现原材料的自然纹理,成品的肤质成色以木材纹理的透视度为要,古朴大拙、自然天成,与我国传统雕刻的“雕绘不分”有很大差异。

## 三、天、地、人合一的审美特征

弹弓的设计与制作,作为民间艺术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如今还具有强烈的商业特征。别具一格的河南弹弓设计,反映出河南民间工艺师与众不同的艺术情感。其以“曲”表“刚”的设计,折射出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工艺文化的一种新的选择与尝试。其产品承载和蕴含了中原工艺师对以设计趋势为“天”、以所在地域为“地”和以自身文化传承为“人”的设计思考,表现出独一无二的审美特征。

### 1. 对“天”的顺应,“曲”为外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产品设计思想逐渐由形式美设计转向以人为本的设计,以摆脱功能主义思想的单一化和缺乏人情味的局限性。河南弹弓设计工艺师也开始积极吸纳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重视细分市场,结合本土特色整合设计,从而使河南民间弹弓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河南弹弓在设计上,较为突出的是流线造型和人机关系的处理。寻求实现传统工艺与时俱进的“曲线”发展,寻找人一机一环境间的最佳匹配关系,成为弹弓工艺师最常深思的问题。他们常常用泥模取样,先选用身高不同的人的左右手对圆柱体泥或面团把握,再压痕拓取,最后结合自然界中的曲线纹样进行定型。

## 2. 对“地”的承载,“刚”为真本

“朴”原意为未经加工之原木,引申为事物之原本状态。《老子》有“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说法。庄子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其中“朴”与自然紧密相联,是一种纯乎自然的状态,没有任何取巧之心在其中,具有本然自在的特性,道出了人类最本能的状态。“朴”除含有“自然”之意外,还有简单、朴素、质实之意,故简约和质朴之感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体现。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历史上曾经是商业中心,具有丰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河南也是农业大省,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常为兵家必争之地。悠久的文明和战争的磨砺,塑造出河南人性格中不加粉饰的“大朴”精神,也造就了河南工艺师抛弃繁冗缚节、去末求真的风格,对自然天成的“大朴”设计钟爱有加。河南弹弓设计中的自然质朴之美,也反映了工艺师对回归质朴、自然的平静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 3. 对“人”的文化遗产,刚柔并济

艺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是艺术的灵魂和生命。中原传统文化浸染下的河南弹弓工艺师,身体力行儒的中庸、道的自然和佛的宽厚。儒道佛三种文化的交错影响,让工艺师讲气派追求艺术层次,在弹弓造型风格上追求刚直个性,而非直白的粗犷;追求表现力量,而非赤裸裸的武力。作品艺术表达的矛盾性,尽显儒为技、道为核、佛为意的审美取向,用曲线和曲面塑造虚实之境,尽释刚柔并济之道。

曲线是“文人画”风格的延续,也是传统雕刻技法的延伸。河南弹弓工艺师大多为传统木工出身,其中资深者多为佛像雕刻师或建筑装饰雕刻师,其创作手法和思维高度传承民族文化的“线意志”即在不言自喻之中。西方雕塑受建筑的制约较强,而中国雕塑则受书画的影响较大。中国的书画常被称作“线的艺术”,中国书画里对线造型极为讲究,传统艺术里丰富多彩的线描方法、异彩纷呈的线条形态和气韵生动的线条特质,堪称世界造型艺术的奇葩。因而,线条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视觉艺术最为

重要的造型手段之一。

曲面是体现传统文化的桥梁。每一款设计实际上都是观者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互相交融从自我心境产生出来的美妙感受,都是一种意境传达。弹弓设计亦不例外。为体现弹弓虚实相生的意境,工艺师在直观造型上将弓的支架作为“虚”、握把作为“实”,通过大量使用曲面形成虚实相应的效果。在“虚”部与“实”部中还要虚实结合,如在握把处雕刻产生阴阳面,做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

## 四、结语

河南弹弓之美,美在曲与直的对比之美,美在直率与含蓄的统一之美,美在继承与发展的和谐之美。河南弹弓,是民间工艺师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一种坚守,是中原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兼收并蓄的一个缩影,是中原民间艺术的一次蜕变。手工文化、手工制作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民族风貌的表征。面对21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发生的巨大转变,河南弹弓以设计的个性化和本土人文化为基础做出了大胆尝试,使传统工艺文化发散出新的风采。

### [参 考 文 献]

- [1] 冯敏. 试论中原民间艺术的当代价值[J]. 中州学刊, 2005(5):257.
- [2] 长北. 曲线旋律——中华传统艺术与文化传统之关系研究[J]. 艺术百家, 2010(4):153.
- [3] 陈炜. 略论曲线在形态设计中的情感作用[J]. 装饰, 2011(1):139.
- [4] 司宁达. 论道家、道教思想对中原汉画艺术的影响[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29.
- [5] 李晓方. 中国传统雕塑语言初探[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9):110.
- [6] 滕小松. 中国传统雕塑的线意志[J]. 雕塑, 2011(5):36.
- [7] 张锐, 谷健全. 河南文化发展报告 201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